台東縣成功鎮客家家族記事

計劃主持人：許秀霞

協同主持人：溫文龍

研究助理：朱慧貞

研究助理：曹麗華

研究助理：郭愛珍

研究助理：彭歲玲

研究助理：謝國忠

2008 年 12 月 10 日

本報告係接受行政院客家委員會獎助完成

台東縣成功鎮客家家族記事

台東縣成功鎮客家家族記事 3
摘　要 5
第一章　緒論 6
第二章　成功鎮概說 7
一、　歷史沿革 7
二、　成功史誌 8
三、　自然環境 9
四、　成功鎮經濟介紹 10
五、　成功鎮觀光資源 11
六、　人口結構 12
七、　地名釋義 12
第三章　一門三傑：宋安邦、宋子鰲、宋賢英 17
第四章　東海岸第一商店「廣恆發店鋪」創始人溫泰坤 27
第五章　柑仔山統領　宋番古先生 51
一、　原鄉----回到從前 52
二、　遷徙----從屏東到新港 65
三、　拓墾---柑仔山王國 75
四、　分家----家產分配協議書 78
五、　京兆堂——成家立業 82
六、　移民者的信仰---伯公廟 90
七、　回首來時路 91
第六章　閩客融合的見證人：王河盛先生 94
一、　對不同族群互動之演變及看法 94
二、　橫跨兩時代、話說歷史更迭 95
三、　王河盛生平事蹟 96
四、　王河盛個人生平 98
五、　家族中重要人物 102
六、　走入文史路的因緣--編寫原住民族譜 108
七、　撰寫成功鎮文史 109
八、　編纂成功鎮志 110
九、　一心為地方做事 111
十、　文史工作者的特質 116
十一、　擔任歲月的見證人，訴說成功歷史 122
十二、　演講、著作及特殊事蹟 124

第七章　其它 127
一、　在時代變遷中掘起的山頂頭家–鍾國煇 127
二、　宋欽明先生－碾米廠到米店 132
三、　張海星－只有曾經艱難才能更珍惜所有 135
四、　郭雲東－從船東到五金行老闆 137
五、　曾士華－堅正的公僕，永遠的鎮長 139
六、　鍾瓊芳－可敬的生意世家 141
七、　張順貴議員－爲民喉舌的傳奇 144
第八章　結論 147
參考文獻 148

摘　要

成功鎮位於台東縣東北部，北接長濱鄉、東爲太平洋、南鄰東河鄉、西隔海岸山脈接壤東河鄉和花蓮縣富里鄉，總面積約爲 144 平方公里。其土地面積雖不大，但因依山面海、風景壯麗，且具有海港的優勢，許多貨物以及遷徙的人們得以順利地自成功漁港進出，是以成爲漢人移居後山開發的重要據點。

成功鎮居民係由阿美族、西拉雅族及漢人的聚落組合而成。漢人的開墾則源自於清朝同治年間。當時的成功海灣是由橢圓形珊瑚礁所形成的天然港口，景觀優美，狀似「蟳管」，可以停泊船隻。漢人因海灣形狀彷如螃蟹左右的兩支箝子，相接圍繞而成，是以名爲「蟳廣澳」，後轉爲「成廣澳」，這是漢人最早開發後山的據點。

前成功鎮公所秘書王河盛先生依據民國三十五年三月的《日據日記簿》記載，說明當時遷徙而來的漢人共有 704 戶；其中註明原居地的情況分別是屏東縣：249 戶；苗栗縣：41 戶；桃園縣：29 戶；新竹縣：49 戶，花蓮縣：23 戶，這些客籍原鄉的戶數加起來已經有 391 戶，佔了成功鎮漢人一半以上的人口。且當時在成功鎮的「富人」排行榜中，客籍人士的人數爲 11 人，雖落後於閩南籍的 15 人；但 11 位客籍人士的總資產爲 42 萬元左右；而閩南籍共 15 人的總資產則爲 38 萬左右，可見當時客籍人士在成功鎮擁有相當雄厚的資源。

本研究訪談了成功鎮著名的客籍人士，並翔實記錄其家族故事。例如成功鎮最具漢學造詣、且建有唯一客式祠堂的宋安邦家族；創辦「廣恆發」店鋪的溫泰坤家族；「統領柑仔山」、供應當地客家鄉親午餐的宋番古家族等等。以及雖非客裔，但孜孜矻矻，恆以融合閩客族群、蒐集當地文史爲職志的前成功鎮公所秘書王河盛先生。希望藉著這樣的家族敘事，能爲這些胼手胝足、篳路藍縷以啓後山的客族鄉親留下歷史的見證；同時，也讓後代的人們，知所感恩與效法。

關鍵字：成功鎮、客家家族

第一章　緒論

成功鎮位於台東縣東北部，北接長濱鄉、東爲太平洋、南鄰東河鄉、西隔海岸山脈接壤東河鄉和花蓮縣富里鄉，總面積約爲 144 平方公里。其土地面積雖不大，但因依山面海、風景壯麗，且具有海港的優勢，許多貨物以及遷徙的人們得以順利地自成功漁港進出，是以成爲漢人移居後山開發的重要據點。

成功鎮居民係由阿美族、西拉雅族及漢人的聚落組合而成。2000 年底(民國 89 年)的現住人口數爲 18,687 人，佔台東縣的現住人口數 7.62%；其中原住民現住人口數爲 9,867 人，佔 52.80%，其中 99.07%爲阿美族。

阿美族早於清初就已移居本地而形成聚落，在此耕種定居。成功鎮原名爲「麻荖漏」，相傳即阿美族語音譯而來，意爲「東西在火上烤乾之意」。因爲阿美族聚落於 1850 年左右曾遭海嘯侵襲，草木皆枯死，極似被火烤乾，因有此名。

至於漢人的開墾則源自於清朝同治年間。剛開始在成廣澳定居，由於地形便利，早期便有小型的中國船在這裡交易，1874 年牡丹社事件爆發後解禁封山禁令，漢人便逐漸來此開墾定居。當時的海灣是由橢圓形珊瑚礁所形成的天然港口，景觀優美，狀似「蟳管」，可以停泊船隻。漢人因海灣形狀彷如螃蟹左右的兩支箝子，相接圍繞而成，是以名爲「蟳廣澳」，後轉爲「成廣澳」，這是漢人最早開發後山的據點。

1895 年成廣澳庄隸屬台東直隸州廣鄉轄境，商業文教風氣逐漸興起，成爲東海岸一代漢人的主要聚落，1916 年由客籍人士溫泰坤所開設的「廣恆發」商號是台東地區開發的重要據點，它不僅是花東海岸線上最大的雜貨商舖；更是當時後山的大盤商。

到了民國 9 年(西元 1920 年)日據時代日人在此建立港口，並將麻荖漏改名爲『新港』，1932 年新港漁港興建完工取代成廣澳成爲地方的中心，是東部最大的漁港。台灣光復初期，全省名爲新港的地方共有三處，因此地方仕紳群起討論更名事宜。由於新港的地勢類似安平港、且發展源自於成廣澳，並懷念鄭成功由安平登入，遂將「新港」改名爲「成功」，正式定名爲成功鎮。

漢人人口在成功鎮之比例接近一半，享有「成功鎮活字典」美譽的前成功鎮公所秘書王河盛先生依據民國三十五年三月的《日據日記簿》記載，說明當時遷徙而來的漢人共有 704 戶；其中註明原居地的情況分別是屏東縣：249 戶；苗栗縣：41 戶；桃園縣：29 戶；新竹縣：49 戶，花蓮縣：23 戶，這些客籍原鄉的戶數加起來已經有 391 戶，佔了成功鎮漢人一半以上的人口。

令人驚訝之處還不在此，王河盛先生依據登記的資料，還指出當時在成功鎮的「富人」排行榜中，客籍人士的人數爲 11 人，雖落後於閩南籍的 15 人；但 11 位客籍人士的總資產爲 42 萬元左右；而閩南籍共 15 人的總資產則爲 38 萬左右。可見當時客籍人

士在成功鎮擁有相當雄厚的資源。

以此數據來看，成功鎮的客家家族實有值得繼續探索與記錄的必要。況且，當地仕紳王河盛先生以極其熱忱的精神，持續推動地方文史的記錄，殷殷期許筆者以完成成功鎮客家族群記錄爲目標。在筆者田調過程中，其不辭辛勞，顫巍巍地騎著摩托車爲筆者帶路，引薦值得訪談、記錄的客家人士，一片赤忱，令人動容。王先生目前已高齡 75 歲，幾年前曾患大病，精神已折損大半。且當地客家耆老，亦多已屆耄耋之齡，如林慶祝、潘建松先生，目前都已九十餘高齡，雖然尚能自己行動，但耳目功能已然退化，在溝通上殊爲艱難。而宋番古先生之長子宋肇源先生，今年八月以八十高齡辭世，亦令人益發感到地方文史工作的記錄，必需及早進行，以能親炙長者，使文史記錄更爲真切可觀。本研究共記錄了成功鎮最具漢學造詣、且建有唯一客式祠堂的宋安邦家族、創辦「廣恆發」店鋪的溫泰坤家族、「統領柑仔山」供應當地客家鄉親午餐的宋番古家族等家族故事。

第二章　成功鎮概說

一、　歷史沿革

成功鎮舊名「麻荖漏」，後改名爲「新港」，戰後始更名爲「成功」，是東部最大的漁港。有關麻荖漏名稱的起源說法不一，但直到清朝末年此地仍爲阿美族人聚落與耕作的所在。1920 年日人爲了在此建港，並隨地方行政區域之調整，將麻荖漏海灣命名爲新港。到 1945 年戰爭結束初期，由於全國以「新港」爲名之鄉鎮共有三處，省府爲免混淆，分別更改名稱。本鎮賢達與行政首長認爲新港之形勢頗似安平港，且鑑於新港發展源於北郊的成廣澳，而「成功」與「成廣」之音相諧，義亦相似，因感念民族英雄鄭成功自安平登陸，驅逐荷蘭人，建立復國基地，遂命名爲「成功」，定名「成功鎮」至今。[1]

圖一：成功鎮街景。柯熙和拍攝，97/11/22。

[1]孟祥瀚、王河盛撰修《成功鎮志–歷史篇》(台東縣：成功鎮公所 2003)。

二、　成功史誌

根據考古學家調查研究，東海岸的史前文化可溯至一萬年前，如長濱文化爲舊石器時代就已存在。以成功鎮地區而言，從發現的石壁、岩棺、石斧、茅、鏃等遺址來看，約距今三千五百年，其中又以成功鎮麒麟所發現的最具代表性，故稱「麒麟文化」或「巨石文化」，因爲年代久遠，又無文字記載，詳細情形難以知曉。

根據史料記載，大約在三百多年前，由花蓮靜埔及台東卑南的阿美族人移居開墾荒野。而根據《蕃社案內》的記載，居住於新港支聽的阿美族人共有二支，計有：從花蓮來的奇萊阿美族人因與清兵作戰敗北，族人不堪清兵殘酷役使而南遷至此，此戰爭的典故則源於一八八五年時清朝開闢後山實行一連串的苛賦，普遍引起族人的怨恨，到了一八八八年時，由於收租的清撫墾委員姦辱大庄客家人之妻，引起大庄平埔族人憤怒並殺之且襲擊清營，此舉引發後山的族人共鳴亦加入抗清反叛漩渦，此戰爭如燎原之火一發不可收拾，戰敗後族人就南遷於此。另一支恆春阿美族，則因屢屢不堪卑南社強悍的襲擊，於清乾隆二十五年左右（１７６０）遷移至此。大致來說，芝田以南屬於恆春阿美，白守蓮以北屬於奇萊阿美。

圖二：三仙台回望白守蓮。　　圖三：白守蓮三仙教會。柯熙和拍攝，7/11/22。

漢人大約在清同治年間（１８６２～１８７５）前來，最初在成廣澳（後稱小湊或稱小港）一代移住，但至同治末年僅有五、六戶人家而已。小港原名「蟳廣澳」，後轉爲「成廣澳」，原指「形狀好像螃蟹的左右鉗子相接所圍成的海灣」。此地因有深水港灣，故很早便有小型的中國型船自由出入，初到此處的漢族商人利用成廣澳海運各種的民生物資經商，。１８７４年爆發牡丹社事件後，清朝官方深覺後山開發之必要性，且爲杜絕外人之覬覦，於是解除封山禁令，鼓勵漢人前往開墾居住，前來成廣澳的漢人也逐漸增多。

光緒二十一年（１８９５），台灣割讓前夕，本地已有漢人４３戶，１７４人，稱爲成廣澳庄，屬於台東直隸州廣鄉轄境，並設有成廣澳塾教導子弟唸書。當時鎮海後軍前營後哨官兵亦駐防於此。於是商業文教之風建興，蔚然成爲東海岸一代漢人的主要聚落。台東直隸州知州胡傳嘗將此地比諸爲前山之鹿耳門，認爲後山之開發當以此地始也。創建於１９１６年「廣恒發商號」可說是台東地區開發的重要據點，象徵漢人登陸後山開始經營的紀錄。當時廣恒發商號爲花東海岸線上最大的雜貨商舖，販賣米、鹽等日常生活用品，算是早期後山的大盤商，東台灣第一店。從目前僅殘存的磚拱騎樓式「亭仔腳」依稀可見當年風華面貌，無論對後山的歷史或人文而言，都彌足珍貴。

圖四、圖五：廣恒發商號。柯熙和拍攝，97/11/22。

日治初期，本鎮屬成廣澳支廳管轄，下分都歷區與成廣澳區，明治四十四年（１９１１）發生麻荖漏（成廣澳）事件，向來被日人視爲溫順的阿美族人因不堪日人壓迫，憤而襲殺日警事件，從都歷社、麻荖漏社進攻成廣澳支廳（廳治在成廣澳），日人調集宜蘭台中阿猴三地警力經月餘仍無法將阿美族人屈服，後來在馬蘭社頭目勸說下才交出武器平息事端，事後日人爲免激起更大事端，並未擴大追究，大正１０年（１９２１）行政中心由成廣澳遷至麻荖漏，將麻荖漏改稱新港，都歷區改稱新港區。昭和６年（１９３１）取消成廣澳區，將成廣澳與沙汝灣區編入新港區，現今成功鎮轄區境於此成形。次年新港漁港興建完成，成爲東部最大的漁港，此地政經商機能更形完整，取代成廣澳成爲地方的中心。光復後，民國３５年（１９46）改名爲成功鎮，各項建設更爲進步可觀。

三、　自然環境

由於受板塊作用影響，使得成功鎮地形較複雜、崎嶇。南北狹長　，東瀕太平洋，西側爲草木鬱蒼，峻岳連立的海岸山脈，地勢向東傾斜，大部分屬於山地或丘陵地。海岸平原狹小，僅成功一帶較寬廣，爲花東海岸三大海階之一。東部海岸地區在地形上可分爲海岸及山嶺等二個地區：在海岸部分，有海灣、海岬、海灘、海崖之外，另有海岸階地、壺穴、隆起珊瑚礁及隆起岩石等特殊地形景觀；區域內最有名的自然景觀區爲三仙台及石雨傘。在山嶺部分，地質上，海岸山脈稜線一帶爲高聳堅硬的都巒山層，東側爲富含火山岩質之巨石厚碎屑岩系的大港口層，形成低緩的丘陵區。

成功附近的山稜屬於新港山稜，主要的山有白守蓮山、新港山、麒麟山，最高峰爲新港山（１６８２公尺）也是海岸山脈的最高點。成功鎮高溫多雨，溪流多但均流短水急，水量不穩，由西側的海岸山脈向東注入太平洋，其丘陵山區日治時代曾有許多西部移民入墾，現因台灣經濟型態改變及交通不便，多成荒蕪山林。2

四、　成功鎮經濟介紹

成功鎮經濟結構以農、漁爲主，工商業所佔比例仍低，主要聚集在新港一帶。

１、農業方面：

本鎮耕地面積三四一一•四九公頃，主要農產品爲水稻、玉米、蔬菜、柑桔、竹筍、椰子。目前正積極推廣經濟作物，如臍柑、晚崙西亞等水果，以幫助農民生活之改善。

２、漁業方面：

新港漁港爲東部地區最大漁港，面臨太平洋，又是黑潮、親潮兩股暖流及其寒流必經之海域，故水產資源豐富。主要魚類爲鰹、旗、鬼頭刀、鮪、鰭魚，柴魚爲本鎮的特產。沿岸因受天然環境及經費限制缺乏優良漁港，現有的漁港計有小港漁港、基翬港、石雨傘澳港。另值得一提的是，養殖漁業成長快速，以九孔爲主。

圖六：新港漁業大樓。

圖七：成功港。柯熙和拍攝，97/11/22。

[2]李玉芬等合撰，《成功鎮志・地理篇》，(台東縣，成功鎮公所，2003)

圖八：基翬漁港。　　圖九：基翬港老伯公廟。

柯熙和拍攝，97/11/22。

3、成功特產：

柴魚片、海產、九孔、桶柑、晚崙西亞、梅、李、臍橙。

五、　成功鎮觀光資源

本鎮靠山臨海，融合了海岸礁石、奇山峻嶺之自然景觀，而豐富的動植物生態資源，使得成功不僅兼具山光海色之美，更蘊含著知性深度之旅。除了自然生態景觀的欣賞外，成功也是台東縣海釣最盛行的地方，漁獲、地理條件優越佳，人口多也是一個主要原因。鎮內的旅社林立、餐飲飯店、加油站、汽機車修理店、釣具店等一應俱全，爲東台灣觀光船（海）釣的重鎮。[3]

圖十：成功港漁市。　　圖十一：成功港漁市攤販。

柯熙和拍攝，97/11/22。

[3] 參考成功鎮公所全球資訊網—成功簡介，網址：http://www.changkang.gov.tw/ 97.11.20

六、　人口結構

隨著台灣區經濟型態的轉變，成功鎮人口外流亦十分普遍，民國 70 年人口 24070 人；民國 85 年人口 20250 人，成長率約負 16%，尤其是三仙溪、新港溪及八邊溪上游的丘陵區，日治以後由西部移來的墾民，多已離散，是人口外流最嚴重的地區。

交通方面，有台汽客運、鼎東客運及花蓮客運，溝通花蓮、台東及高雄等地，並可利用東富公路通往縱谷，但路途遙遠，出入不便。

隨著台灣區觀光事業的興起，民國 77 年又設置「交通部觀光局東部海岸風景特定區管理處」，對於成功鎮觀光業的發展十分有利。主要觀光名勝計有三仙台、石雨傘等風景區，此外，濱海沿線的礁岩及海灘，自然景色優美，都十分受遊客歡迎。

七、　地名釋義

1、宜灣(沙汝灣)

位於成功鎮最北端，原爲阿美族沙汝灣社(Sa'aniwan)，也記作「沙里灣」；昭和 12 年更名大濱；戰後更名宜灣。「沙汝灣」一名由來有二：此地阿美族原於花蓮大港口附近，清光緒 16 年左右與清兵作戰敗北，不堪役使欺凌而南下遷此。到達此地時，首先感到的是周圍山林有無數貓頭鷹棲息，傍晚時分，周圍都能聽到其叫聲，故擬其叫聲 'agiw'aiw 稱呼此地爲 Sa'agiwan，後來轉爲 Sa'aniwan 作爲社名，清政府譯其音寫成「沙汝」，又因地形彎曲，而叫「沙汝灣」。 流經本社的沙汝灣溪上游溪谷很深，要涉溪到對岸的話，視線會被遮住，看不見海洋，此種情形叫作 mianiwan。社名 Sa'aniwan 是由此而起，是「遮住」之意。昭和 12 年沙汝灣因附近廣大的海灣而更名「大濱」；戰後因其海灣美景，更名「宜灣」。沙汝灣社初建於現址上方斜地，日治時才遷至現址。現有居民百餘戶，人數約 600，百分之八十信奉天主教，部落內的羅馬型圓形天主堂，完成於民國 49 年。

圖十二：宜灣部落。柯熙和拍攝，97/11/22。

2、重安(都威、都滅)

位於都威溪北岸，原為阿美族 tomyatsu(或 tomiac)社，漢人俗稱之為「都滅仔」，也記為「都威」，戰後更名「重安」。此一部落，原有兩小社，即都威社及其南側緊鄰的阿龜堳社，日治時為便於治理，將位於稍高台地上都威溪南岸的兩社同時遷於現址，成一大社，取名「都威」。tomyatsu(或 tomiac)(「都滅」或「都威」)名稱由來有三：原居於秀姑巒溪河岸的阿美族，因為不堪高山番的迫害，於清光緒 16 年左右開始移來二、三戶，此後漸次增加而成一社。當時移住者想引南邊的溪水灌溉，但因上游一帶，河岸岩石屹立，無法開鑿水路，而感嘆有水不能用(嘆氣的阿美語是 tomeyatsu)，此遂成為社名。部落北端有瀑布，叫作 tomiac(一記 tomiyac、tamiatsu)，社名由此而來，為「瀑布」之意，漢人擬其音稱為「都滅仔」或「都威」。tametsu 是指踏在石頭上跌倒之意。由於附近海岸有許多圓石子，通行時滑倒的人很多，所以稱 tametsu，後來轉成 tomiatsu。

戰後此一部落流行腦炎、民國 36 年 7 月又發生霍亂，患者高達 82 人，死亡 54 人，翌年 4 月復發生大火，焚屋十餘棟，人心惶惶，鄉紳宋子鰲認為可藉改名逢凶化吉(台東縣政府，1995：無頁碼)，鎮長林福安遂於民國 37 年將「都威」改名「重安」，以祈「重」獲平「安」之意。

圖十三：重安部落。柯熙和拍攝，97/11/22。

3、阿龜堳社(已併入都威社)

位於都威溪南岸，與北側的都威社相鄰，日治時為便於治理，日人將位於稍高台地上的兩社同時遷於都威溪北岸，成一大社，取名「都威」，阿龜堳社從此消失。「阿龜堳」為阿美語 arakomay 的近音譯字。由於 tomiyac(重安溪、都威溪)及另一條無名溪繞過本部落，形狀像突出的半島，阿美語稱此為 komay，由此轉成社名 arakomay，近音譯字「阿龜堳」，為清光緒元年左右，由大港口加納納社的阿美族移來所建。

4、石雨傘

「石雨傘」爲漢人稱呼之地名，原因是附近有一隆起岩礁延伸入海，其中有一塊大岩石狀如雨傘(平衡岩)，故名。阿美族稱此地爲「Awawan」，因昔日南來北往的人經過此地，必須穿越岩礁近海處的一洞穴，而每當有人通過洞穴時，就會聽到'aw'aw 的怪聲，後來便以 Awawan 爲此處地名。石雨傘原爲西拉雅系平埔族的居住地，明治 29 年有平埔族 13 戶 79 人；日治時代這些平埔族已全部信仰基督教，該地曾經於清光緒 3 年建立東部第一所基督教堂「蟳廣澳教會」，但日治末期，教會遷至新港，留居此地的平埔族也只剩五、六家，戰後又陸續遷出；反之，戰後由東河鄉的都蘭、隆昌、成功鎮的和平、及長濱鄉的三間屋等地遷入許多阿美族，形成目前達五十戶人家的阿美族部落。因此，鄰近的阿美族又稱此部落爲 misa'opoan a niyaro'，意爲「聯合國式的阿美族部落」。

圖十四、十五：石雨傘。 柯熙和拍攝，97/11/22。

5、美山(微沙鹿)

原爲阿美族「微沙鹿社」，戰後首任鎮長馬榮通謂該處山形很美，遂更名與「微沙鹿」近音的「美山」。微沙鹿名稱由來有三：

此地阿美族人原居秀姑巒溪上游；清光緒 10 年(1884)左右，爲了躲避高山番的迫害，沿海岸南下避難。途中發現此一片小原野，於是定居下來。最初的移住者對後來者告以居住地溪流上游並列的三個小丘爲目標，該三座小山丘，鼎足而立，樣子有如三人相對蹲坐，阿美族人稱坐爲 maro，稱三人相對蹲坐爲 mararoong，遂以此爲社名，近音譯字爲「微沙鹿」。微沙鹿係阿美語 Misalo 的近音譯字，意爲「蹲踞的小丘」。

另說此地阿美族係從花蓮港廳太巴塱社南方的 saro 社移來，至此建了二棟相對的家屋，misaroku 是指「從 saro 社來的」之意，由此轉成社名。

圖十六：美山真耶穌教會。柯熙和拍攝，97/11/22。

東部成功鎮地區在早期漢人尚未移民至此前，僅有阿美族人的聚落，各自散居於此地；雖於明鄭清初時期，漢人大量移墾台灣，但僅限於前山的開發，由於清代時期，滿清政府將東部地區視爲「化外」之地，在朱一貴事件後更頒布封山禁令，嚴禁漢人越界入山，此禁令對東部發展影響甚巨，也形成了同一塊土地，東西部卻呈現完全不一樣的生活形態與結構，當西部已經慢慢轉形成，以漢人爲主的農業及貿易社會形態時，東部地區人口仍然以原住民爲主體，停留在以漁獵與採集爲主的傳統生活。

儘管如此，封山禁令並未完全切斷了西部與東部之間的連繫，清朝雖明令禁止漢人入山，卻無法完全阻擋，漢人私自前往東部探險與貿易，也因如此，在後期以港口運輸貿易爲主的成廣澳地區，成爲了東部一處重要軍事駐地及商務貿易港。

在牡丹社事件後，滿清政府爲杜絕日本人對台灣的覬覦，逐開始正視所謂「化外」之地的政策，無法根本解決台灣的問題，清廷逐開始改變治台政策，解除渡台禁令與封山禁令，並極積設官經營，開通山路，廣召墾民與招撫原住民

同治 13 年（1874），在沈葆楨的規劃下，開始分北、中、南三路開鑿通往東部的道路，而當總兵吳光亮受命將所屬部隊移駐後山璞石閣、水尾時，成爲了東部地區發展的一個重要開瑞，吳光亮率領中路飛虎軍的兵工，開發通往後山的八通關道路（瓦拉米步道爲其一部），同時也開了一條璞石閣（玉里）到成廣澳（小港）的道路，也就是安通越嶺古道，當時吳光亮將軍隊所需糧草等軍需品的糧站設於成廣澳，當吳光亮各營逐步移駐之際，即令總兵麥龍韜督押商船運載糧米、藥材至成廣澳，麥龍韜並親赴成廣澳南部各社鼓勵社眾協助挽運上岸。對成廣澳一地而言，開始由漢人貿易經商，零星拓墾之地，轉而成爲軍隊駐兵所在地，又兼轉運糧嚮軍需之重任。由於東部並無良港，內部運

輸路線亦未開闢，成廣澳天然的珊瑚港灣，逐成爲東部海岸地或是縱谷中段地區，重要的物資輸入港口，使其成爲漢人移墾東部的另一入口，無論在清廷的統治上或是地方的開發上，其角色均頓時重要了起來。

成廣澳當時的新移民也不僅止於漢人。光緒三年（1877）在這裡設立了義塾，主要就是教漢人識字、讀四書，也有少數的番童在此就學。光緒七年（1881）十月，秀姑巒溪山洪暴發，道光年間從西岸遷來的西拉雅人的田園多淪爲河床，部分族人就流落到成廣澳。而光緒十四年（1888）6 月，大庄（富里）客家人劉添旺因不滿水尾（今瑞穗）墾撫局委員雷福海征收田畝清丈費過苛，聯合新開園（池上）墾民及西拉雅平埔族人起事，引發「大庄事件」，本案爲清未東部地區自開山撫番以來，所引發之最大規模動亂，整個東部地區幾乎全被捲入，原來擬爲台東直隸州州治所在之水尾，亦因而燬壞殆盡，州治只好一直暫駐卑南；光緒二十一年（1895 年），觀音山西拉雅人再度不滿水尾駐軍徵糧，引發「觀音山事件」，兩次「抗清」，不少西拉雅族人也到成廣澳避難，這些移民南北夾漢人聚落而居住，光緒 21 年（1895）台灣割讓日本前夕，成廣澳已有漢人 43 戶 174 人，其中來自屏東的客家人爲數不少。成功鎮第一任的官派鎮長馬榮通，也曾在成廣澳義塾學習漢書二年。

光緒 13 年（1887）8 月，劉銘傳奏請將台灣西部由 2 府 8 縣 3 廳擴張爲 3 府 11 縣 3 廳。東部地區改設「台東直隸州」，左界宜蘭，右界恆春，歸台灣兵備道管轄。州置知州 1 員，其原來卑南廳舊治，置州同 1 員，水尾以北改爲花蓮港廳，置州判 1 員駐紮。光緒 15 年（1889），東部地區爲便於徵收賦稅，全境分爲五鄉，分別爲南鄉、廣鄉、新鄉、奉鄉、蓮鄉，其中「廣鄉」便是以成廣澳爲中心，卑南溪以北猴子山社（台東市富岡里）沿海至大港口一帶的庄社，「廣鄉」一詞也定義了成廣澳的興起，以及在成功地區發展史的重要地位。

割台前夕，成廣澳的文教商業已經十分發達，於是設成廣澳庄，屬台東直隸州廣鄉所轄。胡適之父胡傳（號鐵花）任台東直隸州知州時鑑於東部墾務不彰，曾檢討已往的後山政策，認爲應師前山故智，「先以舟楫海口，立市埠，置兵不多，不遽深入；力聚易以自固，費少易以持久。久之，而人日眾，土日闢，自成都會。」而今開發東部，則反其道而爲，「舍海道，棄舟楫，專事陸路，道踰山領，穿番社，力求深入。處處設防，處處爲番所牽制，徒自罷其力於荒山窮谷之間」。

胡傳由經濟面切入，認爲商貿供了移民的動機，不待官方的勸誘，民眾自然遷移至此地。因此，他認爲後山之開闢，應自海道而非山路。他說「夫臺灣後山有成廣澳、大港口，猶前山之有鹿耳門也。有火燒嶼，猶前山之有澎湖也。如仿行鄭氏之法，據海口而不深入，立市埠以廣招徠，造輪船一艘、帆船十艘，置兵五百人足矣。杜外夷之窺司、免內番之牽制，伸縮均得以自如矣。」簡言之，就是理番之策，開山越嶺不如開港立埠，也就是想開發成廣澳港，作爲理番政經中心。

成廣澳聚落的發展，對吸引客家移民至成功地區有著極深的意涵，客家族群中又以北客先到達成功地區，並以提煉樟腦貿易爲主，以成功鎮耆老黃金榮爲例，他於 1918 年出生在花蓮縣玉里，其父黃阿坤，原爲苗栗南庄客家人，以採樟腦爲業，黃金榮小時

候隨父母在花蓮玉里一帶，即今成功鎮宜灣部落的山上逐樟而居，到他 8 歲時（1926），黃父爲了讓孩子受教育不想再繼續採樟而下山，才來到石雨傘部落定居務農，以讓孩子就近念成廣澳公學校（現成功鎮忠孝國小）。

南客爲後期移民，以商務爲主如販賣民生必須品、經營碾米廠等，於經濟及生活趨於穩定之後，便開始著手於開墾事業，其中南客代表人物爲溫泰坤，溫泰坤於成廣澳創立了花東地區最大的雜貨商鋪「廣恆發商號」，其成就不但爲溫家帶來了可觀的財富，而且廣恆發商號的興起也帶動了成廣澳地區的發展，也因爲日治時期以其爲行政中心的關係，間接影響了日本政府在成功鎮興建新港漁港，亦帶動了另一波的南客移民。

第三章　一門三傑：宋安邦、宋子鰲、宋賢英

宋氏家族一門三傑，宋安邦投軍於劉永福麾下，屢建戰功，後舉家遷到成功鎮定居，創立「永振利商行」，是當地居民信仰中心「新港天后宮」的創議人，並受公推爲「籌建委員長」，是當年地方上公認漢學造詣最博雅之士。

其哲嗣宋子鰲幼承庭訓，受益最多，除了學識豐富之外，在熱心公益上，也身兼多項公職，甚至在地方建校時，踴躍捐輸，深具乃翁之風。

宋子鰲爲承先啓後，撰著家史、家訓、家譜等著作遺留子孫。宋氏家譜曾於民國七十四年，提供給中華學術院攝製成微縮影片，公開儲存於臺北市陽明山華岡中正圖書館，使先祖芳名永留後世，當時並曾獲得中華學術院院長張其昀等人聯名的感謝狀。

孫輩宋賢英在地方殷切推戴下，榮獲支持連續膺任均六、七屆鎮民代表；其後繼續投入鎮長選戰，以最高票當選，並且蟬連第六、七屆鎮長。

宋氏的「京兆堂」目前是成功鎮唯一的一座客家祠堂，雖已褪去昔日風華，但不掩大家巨族的氣概。

圖一：宋氏「京兆堂」隱於市街之內，由紅底金字的大理石堂匾，尚可窺見當年風華。筆者攝於 96/11/18。

宋安邦（1873-1937），號勳臣，祖籍廣東省梅縣古田，清隆年間來台，始居屏東縣

內埔鄉八壽埤，後因村落、房舍、田產被洪水沖毀，乃遷居萬巒鄉頭溝水。同治 12 年（1873）3 月 4 日，宋安邦生於屏東縣萬巒鄉。

宋安邦原爲屏東私塾老師，因馬關條約清朝將台灣割讓日本後，宋安邦因民族意識所驅，不願受到異族統治，因此於內埔六堆地區起義對抗日軍，但不敵日軍新式精良武器，終爲日軍所敗，爲避免遭到日軍查緝，故舉家遷移至成功鎮定居。其長子宋子鰲對父親起義抗日的故事，在著作「隨筆雜記」中亦有詳盡的記載。

時逢甲午之役，清廷敗戰，與日訂立馬關條約，割讓台灣，凡有血性之人，莫不義憤填膺，同仇敵愾，乃宣言獨立，建立共和政府，舉巡撫唐景崧為總統，進士邱逢甲為副總統，由提督劉永福統率軍隊抵抗日本，劉提督一面加強訓練軍隊，一面授命統領蕭三發組識團練，以備禦敵。

先父痛感世事遷移，慨然投筆從戎，糾合鄉勇，投軍於提督劉永福將軍麾下，編入團練，及見我父相貌清奇，英俊魁梧，與之語，知其賢，即任為統領幫辦。

時日運既由澳底上陸，基隆、台北等處，相繼陷落，敵以破竹之勢，長驅南下，在濁水溪北下塞，蕭統領率精銳之團練壯勇，屯駐濁水溪之南，與日軍會戰，是時日軍新式裝備，所用的是洋槍野砲，我軍所用，俱屬火龍槍，戰械優劣懸殊，然而得以禦敵者，皆由義兵英勇奮戰所獲焉，先父勇敢過人，頗建戰功。

九月念九日晨，先父出巡陣地，遙望對岸有馬一匹，濃茶色，雄俊高大超群之姿，令人喜愛，此馬正在溪邊食草，似可取也，先父急速返營，向統領請曰，對岸有俊馬一匹，十分雄壯，正在溪邊食草，吾願往取之，統領應諾，取紅綾一幅佩我父肩上，以壯其行，父辭出，即涉水渡溪，及至彼岸，馬見父至，起身緩行，父將趕及，馬即疾嘶奔馳，父稍止步，而馬亦停留路旁食草，父趕往，馬又疾跑，父追之愈急，馬跑之愈快，始終相距不過十餘步，急得我父性起，使盡平生氣力，極力追趕，近一兩步，就可得馬之際，敵陣突然砲響，煙塵瘴天，馬斗奔而逸，原來此馬猾不易致，係受訓練之故，乃日軍為誘敵之用者也。先父頓悟中計，急速反營，至溪邊槍火密集，彈如雨至，無處可蔽，即躍身潛水，詎槍聲仍然迫之，彈落溪中，水花四濺，清況危急，令人駭怕，但我父全然無懼色，在溪深水湍之中，任其漂流，俟槍聲稍遠，乃從容上岸，事實先父已經精疲力盡，統領驟聞砲響，知父被敵襲擊，急引兵救應，目睹我父滿身丹紅，血蹟斑斑，大驚曰，書負重傷，速返後方醫治，即由囊中取出高麗參一支賜父，立派親兵數名，護送我父，返回後方調治，驗之始知非傷，乃我父身穿白杉，披上紅綾，因濕而色退，以致滿身血紅者也，是日兩軍隔溪大戰，戰至黃昏方息。

翌死東方發白，細雨濛濛，日軍盡起大隊人馬，分兵三路，向我軍包圍，我軍與之浴血大戰，終於以眾寡不敵，我軍急向東面轉進，誤退濫田之中，遂遭敵人盲目射擊，幾乎全軍覆沒，英勇善戰之蕭統領葬於槍林彈雨之中，竟為國為民族，壯烈殉難於是役，是日天昏日暗，悲風慘冽，而先父因在後方調治，始得倖免。

嗟夫，回溯兒時，先父曾經詳述此事，前塵歷歷，記憶猶新，爰特撰文，聊誌先父生平乎，以供後代閱覽也。」

圖二：永振利商會舊觀，截自成功鎮志歷史篇。

大正 12 年（1923），宋安邦舉家遷居成功鎮，並創立「永振利商會」亦是宋氏家族現居地。遷居後，便開始經營百貨、碾米廠等生意，奠定宋家在成功鎮的事業基礎。據宋家後代子孫宋明英表示，宋家遷居至成功後，至所以會創立永振立商會，主要與宋子鰲爲商業學校畢業有關。

圖三：永振利商會現觀，謝國忠攝於 2008.10。

昭和 7 年（1932）新港漁港竣工，並舉行盛大開港儀式。該港經費總計 84 萬日圓，每日動員阿美族人工四、五百人，總計動員 28 萬人次，新港漁業移民指導所房舍於同年 12 月 20 日開始動工，成功鎮漁業得以迅速發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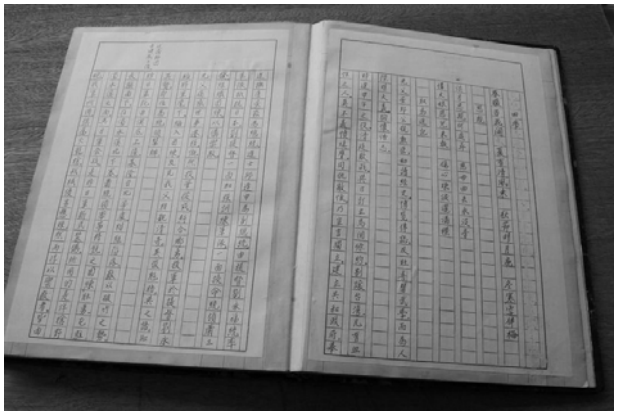
圖四：新靈寺現況，謝國忠攝於 2008.11。

昭和 9 年（1934），因當時成功鎮地區漁業已逐漸發展，地方人士便眾議籌建媽祖廟，宋安邦順應鄉親所請，召開信徒大會，被鄉親推舉爲委員長。歷時二年餘，建成新港天后宮，後因皇民化運動，日人強佔媽祖廟，成立淨土宗新港布教所，即爲現今之新靈寺。

1924 年，宋安邦在他店舖後方興建客家傳統的合院，其中，正身至今保存完好，現今已成爲宋家宗祠，爲當地古蹟。昭和 12 年（1937）9 月 18 日，宋安邦在成功鎮寓所與世長辭。

宋子鰲（1905-1937），明治 38 年（1905）12 月 30 日出生於屏東縣內埔鄉。於台南商業學校修業三年畢業後，於 1923 年隨父親宋安邦移居成功鎮，除經營家族事業外，宋子鰲曾任多項地方公職，如專賣局新港駐在所幹事、新港部落向上會幹事、新港郡教化委員會委員、新港郡教育會幹事、新港庄協議會員（官派）。光復後，歷任官派新港庄接收委員、官派成功鎮副鎮長、新港區漁會理事長等職。宋家當時已成爲新港區創業有成的典範之一，就新港庄役場，《管內概況一覽簿》，頁 10 中所記載，宋家當時資產額達參萬伍仟日圓以上，爲新港庄富人排名中第五。宋子鰲先生除經營事業有成外，其生平著作「隨筆雜記」亦是成功地區史料重要參考依據之一，內容除記載地方所發生的大小事及父親宋安邦生平外外，老先生所創作的詩集，亦是值得細細品味的漢學作品。另外，宋子鰲所撰寫之「宋氏家譜」曾於民國 74 年，提供中華學術院攝影制成微縮影片，公開展示於台北市陽明山華岡中正圖書館。並獲中華學術院院長張其昀、中國文化大學校長鄭嘉武、譜系學術礦究所所長趙振績等三位博士連署的感謝狀。

圖五：宋子鰲著作隨筆雜記及其封套，謝國忠攝於 2008.10。



圖六：隨筆雜記內文，謝國忠攝於 2008.10。

當宋家於成功鎮地區事業漸漸有成之際，便開始邀請屏東地區的親戚前來成功鎮協助家族事業，約經商二至三年後，宋家逐開始收購成功地區的農地，開始經營起土地投資的事業，收購對象包含原住民及閩、客族群，據宋子鰲參子宋明英表示，當年宋家土地約有二十至三十甲之大，家中因此還購買了 3 到 4 支的望遠鏡，爲的是在收割時期，監看佃農有無私藏稻米。

雖然宋家收購了大量農地，但宋家並未從事任何農耕事務，主要是爲了出租農地再與佃農對分收成之農作物，據成功鎮耆老王河盛口述當時成功地區地主可獲得租地稻米收成量的一半之多，宋家所持有之土地，於國民政府施行耕者有其田政策後，已大量放領給佃農。因爲早期成功地區主要經濟產物爲稻米，所以當時宋家的事業主要著重在碾米廠及雜貨店，但在新港漁港完工後，成功地區漁業迅速發展，並促使宋家開始經營漁船事業。宋子鰲於「隨筆雜記」中對新港漁港之建成歷史記載如下：

「新港原名蘇芼漏社，昔年為平地山胞集居之地，因建港而更名為新港，光復後，改為成功鎮，日治時，先設支廳，後改設為郡，管轄東河、成功、長濱三鄉鎮。光復初年，郡役所改稱區署，設庶務、警察兩課及後區署廢止，同時撤銷庶務課，將警察課改為警察分局，新港在台灣東部屬台東縣管轄，位於東徑一二一度二二分二四秒，北緯二三度五分五四秒，南距台東市，陸上五十五公里，海上二十四浬，北距花蓮市，陸上一百二十公里，海上五十六浬，距綠島三十一浬，距蘭嶼六十五浬。

新港背倚青山，面臨碧海，與綠島僅一衣帶水之隔，平眺咫尺，隱約可及，高垣屏障於東，土嶺橫臥於南，形勢險要，扼台灣東部水上要衝，為天然形成之優良港灣也。在新港未建港之前，台東缺乏可供漁船停泊港灣，漁船作業，多以綠島為根據地，沿海有暖流經過，旗魚、鯊、魴、雨傘魚、鰹、鮪、青鱗魚、飛魚等，資源豐富，日人為發展台灣東部漁業，計於民國六年，即有建築漁港之議，後經數度調查研究，認為新港，形勢天然，漁源豐富，有建築漁港之價值，即開始測量，乃於民國十七年，編列預算，次年開工，旋以財政困難而中輟，後經地方人士，數度陳情，延至民國十九年，再度復工，迄民國二十一年十月完竣，後因颱風季節，港內波濤洶湧，高達數尺，所有停泊港內大小漁船均極危險，為安全起見，乃於民國二十四年，在內港西瑞，增建避風渠。光復後，曾數度加強防波堤，浚渫淤淺部份，添建排水溝，整修碼頭等。民國四十三年十一月，闢為省內港，港內可供五百噸以下船舶，自由轉動，避風渠可供百噸以下船舶，停泊避風之用。余在新港區漁會理事長任內，因為漁船增加，而致颱風季節，避風渠無法容納，乃向農後會陳請呈請，獲准補助，於揚船場前面，建築防波堤二段，內側為漁船避風，防波堤兼為碼頭之用，第一、二、三號碼頭，可供客貨交通船舶停靠，陸上上設備，有淡水庫、魚市場、製冰廠、冷藏庫、揚船場、鐵工廠及供油站等，大致齊全。

新港地處中央山脈以東之沿海地帶，地勢陡削，平原狹窄，雨量多集中於夏季，氣溫最冷為一月，，最暖為七月，最高氣溫三十三度，最低為十四度每年十月至四月有東北向之季節風，五月至九月為颱風季節，本港為台灣東海岸中部，最完善之漁港，不獨台東漁船，匯集於此，當每年東北風季節，漁汛期間，基隆、蘇澳及屏東等地之鏢旗魚漁船，亦多來此地作業，成為本省鏢旗魚漁業重要基地，在未建港之前，漁業生產，微不足道，及至民國二十一年，新港漁港建築完成後，日本移民，從事經營漁業，從此，日漸發展。戰時，陸上設備及漁船均多損毀，光復後，日人遣送回國漁業一時衰退不振，當時，台東縣府，曾籌組水產公司，接收殘存設備，一面設班訓練船員，整頓經營，遂漸發展，光復當時，漁船只有約二十艘，現在有二百餘艘，本港動力漁船，多從事鏢旗魚漁業，部份兼營曳繩釣，鏢旗魚汛過後，則多改營飛魚追逐網，或鰹釣及延繩釣，動力竹筏，則從事流網、刺網、旋網、焚寄網、搖鐘網、地曳網等漁業，其中飛魚追逐網，及鰹約，現為台東獨有之漁業，頗適合當地之環境，宜集中力量，謀求發展。」

三鄉鎮風景帶

新港沿山重重秀，東河橋水處處清；

三仙台上花看月，八仙洞裡夜講經。

在成功鎮漁業逐漸發展之際，宋家開始經營起漁船漁業的事業，其間宋家共出資建造了 6 艘作業漁船，成爲了所謂的「山頂頭家（soanteng taukei）」，而頭家（taukei）在閩南語中帶有老闆的意思。

二次大戰日本戰敗撤離台灣後（民國 34 年），原屬日本政府財產之漁船均爲國民政府所接收，此時新港區的漁船分別屬於台東水產公司及山頂頭家兩種。所謂的「山頂頭家」是新港地區的人對不從事捕魚工作之漁船主的稱呼，這也是戰後新港漁業的特色。當時漢人的富裕階級掌握了地區經濟，他們以投資方式參與鏢旗魚爲主的漁船漁業事業，有很多的「頭家」主要以商爲生而非漁民。「頭家」出資建造漁船，雇用船長來從

事捕魚工作。而雙方因合作捕魚所得之利益，由頭家雇用一名會計記帳，扣除漁撈成本後，資方和勞方各得一半。勞方所得的一半再依職位分配不同份數，而每艘漁船均有其階級職位與晉昇制度，船長及船員依制度來領取自己所應獲得的分配利益，通常依正鏢手（船長）1.5 份、輪機長 1.3 份、副鏢手 1.2 份、一般船員各 1 份、伙夫 0.5 份的慣例分配。簡言之，山頂頭家出資本，而船長、船員則是出勞力。

鏢旗魚漁法是在日治時期由日本千葉縣及和歌山縣漁業移民引進台灣東部，台灣光復之後東部漁民也因此承襲了鏢旗魚的作業技術。在鏢旗魚作業團隊中，每一位船員所負責的工作皆有明確規定。能夠站上鏢台的鏢手是經年累月磨練而來，舉起由純手工打造長達 18 呎（5.4 公尺），重達 6 公斤的鏢竿，代表著是榮耀與責任。主鏢手（俗稱正鏢）由船長擔任，鏢魚時站立於鏢台右方，副鏢手（俗稱左鏢），站在左方，正鏢鏢出若未射中，副鏢才可以出鏢。在秋冬季節旗魚大量出沒成功沿海之際，漁船頂著惡劣的天候下出海，於茫茫的大海中追捕旗魚，討海人靠著眼力巡視著四面大海，追尋著旗魚的蹤跡，銳利的眼色捕抓每次旗魚在大海中揚鰭劃過水面的瞬間。鏢刺旗魚，是鏢旗魚團隊的默契表現，鏢刺旗魚的技術、力道與準度、旗魚被鏢中後纏鬥的力道、水面的跳躍情景、奮力的追獵與搏鬥過程，每一次皆深烙討海人心中。

圖七：由船長陳永福所領軍的新港籍漁船「龍漁發」，頂著強勁的東北季風與淘天巨浪，在大海中與旗魚搏鬥。資料來源：江偉全提供。

頭家與船長間的關係就如同地主與佃農，但卻不完全相同，當山頂頭家投資了一艘漁船後，就要去找一位好的船長來總管一切捕魚的工作，而船長則負責找船員，所以雇用船員仍是船長的權力。因爲鏢旗魚是一種具有週期性的漁獵工作，「夏枯冬榮」爲其最大特色，所以頭家對船長的聘約時間，通常只有一個漁期，每年鏢旗魚期結束後，若雙方有口頭上的承諾續聘，則秋季漁期又開始時，船長就會帶船員自動向船頭家報到。若頭家不再續聘船長，或船長不願再接受頭家的續聘，則雙方都要再去尋找新的勞資合作對象。

而當時成功鎮魚獲量非常充足，是成功鎮最繁華的年代，當時鎮上特種行業、飯館、戲院林立，每當月底漁船返港下完魚貨後，常見頭家於發放薪資時，在酒家宴請船長及船員。另外，當漁船在單日捕魚工作中，捕獲四條以上的旗魚，船員便會在返港的時候，在漁船頂插上象徵豐收的魚旗，此時頭家也會在酒家宴請該船組，慶祝這趟漁獵滿載而

歸，在 1924 年至 1961 年間以捕獵旗魚爲主的漁船，約有四分之一於返港時會插上代表豐收魚旗，但現在此一榮景已不復見。

因爲宋家 6 艘漁船可捕獲可觀的魚貨，於是宋家便採購了數輛的貨車，用於載運魚貨至台南等地區販售（其事業經營模式，如同現今成功地區的魚販林寶山先生），於返程時再收購南部地區漁貨至東部地區販售。後來因爲船員漸漸有所積蓄，便開始入股宋家所擁有之漁船或自行合股採購漁船，加上 1960 年代後半起，成功鎮農會、新港區漁會開始協助漁民向銀行融資貸款購買漁船，到 1970 年後半是漁民貸款購船的高峰，漁民擁有漁船數便多了起來，這時山頂頭家的漁業經營就轉趨劣勢。

後期，船長、船員常常藉故向頭家措錢，若不措給他們，往往就假裝生病而不出海捕魚，頭家就開始不好當了。此外，那時候新港的漁船，在農歷過年後會有不少漁船往北去蘇澳外海鏢黑皮旗魚，此時另有私心的船員常在外海，就把一部份的漁獲物偷賣給其他漁船來賺取「外快」。竟管如此，山頂頭家對船員這樣的的行爲依然鞭長莫及，一點辦法也沒有。宋子鰲在吃了這樣的悶虧之後，就開始找原住民來當船長，帶動了原住民勞力投入漁業。因此，在時代的變遷下，宋家在當了 20 年左右的「山頂頭家」之後便漸漸淡出了漁船事業，轉而將漁船販售給船員或有意經營之人。

圖八：位於重安部落都威橋旁的霍亂記念碑。謝國忠攝於 2008.11。

台灣光復初期，成功鎮內重安地區曾發生嚴重的霍亂及火燒村的意外事件，於事件平息之後，宋子鰲以「重安」一詞，將該地區重新命名，以祈求該地能重獲平安，始改名爲「重安」迄今。

成功鎮重安部落地名，文獻上記載，1896 年前爲「都滅」，1898 年改「敦密」，1901 年以後改稱爲「都威」，1947 年再改稱爲「重安」至今。

民國 35 年（1946）7 月，當地入贅至鄰村宜灣部落的族人，因食用海灘採收的海藻後生病，被送回重安老家醫治，不久其病蔓延全部落，經縣衛生局檢驗發現爲可怕的傳染病『霍亂』，有關單位立即管制交通，動員縣、鎮醫務人員經過月餘之防治始遏止疫情，但已奪走了數十人寶貴生命。

禍不單行，民國 36 年 4 月，部落再發生火災，焚毀十餘棟房屋，雖未有人員傷亡，但族人財物損失慘重。居民人心惶惶害怕再有災難發生，於是計畫遷村於都威溪南方高台上，原稱「阿龜眉」的祖居地。但因遷村經費及許多問題未能立刻克服，經過一段平安日子後，村民便不再談起遷村的事。

當時地方人士認爲原名「都威」二字，字意不吉利，當時鎮長林福安在廣納各方意見後，以地方耆老宋子鰲之建議，將該地區更名爲「重安」迄今。

重安部落發生「霍亂」事件當時，適爲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不久，台灣光復初期，日本人已將醫療人員遣送回國，加上醫藥短缺，病者在部落內被隔離，只能接受簡單的治療，大部份兩三天就死亡。死者由族人立即送往河邊已事先準備的火堆火化，即未撿骨埋葬也未有墓碑，因爲未經醫師診斷死亡並且未登記姓名，因此無資料可查對罹難者的確實姓名及人數。

罹難者家屬之一的林新玉女士，因他父親也在這波災難中病逝，當時他年僅三歲，直到半百之後才逐漸知道事件真相，並發現許多族人和他有一樣的遭遇，他才認爲應該查明罹難者姓名及人數，舉辦追思儀式並建碑以資追悼思念。

王河盛先生經當地文史工作者朱士杰先生轉告當地人士心聲後，乃前往戶政事務所核對日治時期與光復初期戶籍資料，查出罹難可疑者名單，並請里長召集年長的當地人士辨別，再由林新玉女士按戶實地查訪探究，終於大致確認出 64 位罹難者的姓名資料。

重安部落自民國 93 年起，擇清明節舉行罹難者追思儀式，原住民籍的成功地區嚴亞美縣議員，在縣議會 94 年第 7 次大會提案，爭取興建「重安部落霍亂事件」紀念碑，經大會決議通過後，送交縣政府會同成功鎮公所辦理。

台東縣政府採納後，於 94 年底撥工程款五十萬元交鎮公所發包施工，事隔一甲子總算完成紀念碑，告慰罹難者亡靈並撫慰後代子孫傷痛的心靈。

座落於成功鎮與東河鄉交界馬武窟溪上的舊東河橋，現今已成爲地方上重要地標及觀光休憩景點之一，台東縣政府更將其列入台東縣歷史建築，更爲台灣歷史建築百景之一。現今舊東河橋的外觀與建成與宋子鰲先生有著一段歷史的淵源。民國 x 年（ ）當時的省主席吳國禎先生，於巡視台東時來到了成功鎮，因吳國禎爲宋子鰲之舊識，便前往都蘭迎接，於是吳國禎先生與當時的台東縣長吳金玉先生及宋子熬便共乘一輛車，在到達東河橋頭處時，宋子鰲便請吳主席及吳縣長下車一同徒步過橋，並告知，這座鐵索懸吊橋，原爲日治時期大正十五年（1926）所建造迄今，因年久失修橋身已損壞嚴重，開車經過恐拍會有危險，吳主席下車查看後，發現東河橋鐵索已腐銹膨脹，對來往交通十分危險，於是便命隨行官員記錄，並儘速改建。在不到兩三個月的時間，便開始動工改建，將原來的鐵索橋改建成現今的鋼筋混凝土結構。宋子鰲在隨筆雜記中回憶起此事時，述說當年這座橋的興建完成乃是一件偶然之事。

圖九：宋賢英當選鎮長之記念匾額，謝國忠攝於 2008.10。

宋賢英(1927-1976)，係宋子鰲長子，生於 1927 年 1 月 2 日。於台南第二高中畢業後，接掌家族事業永振利商會，以及漁船事業。民國 44 年當選新港區漁會第一屆理事。理事長吳溪在任內去世，由宋賢英代理理事長一職，並在台灣區中小企銀服務 15 年。民國 47 年，在地方人士支持下，連任第六、七屆鎮民代表。民國 57 年，參選第六屆鎮長，獲最高票當選，民國 62 年，蟬連第七屆鎮長。

期間推動成功鎮各項基礎建設，如興建鎮公所辦公大樓、舊市場、自來水工程、台灣省水產試驗所成功分所之設立，在位期間各項建設不但解決本區民生問題，亦帶動起地方漁業經濟，政積成效深得民心，不知不覺中也爲後來亦參與鎮長選舉六弟宋文英，鋪設了一條政治的坦途，使其六弟宋文英於第十、十一屆鎮長選舉中以高票當選。

宋賢英鎮長在職期間，出生於都歷的原住民李光輝，因二次大戰期間昭和 17 年（1942）被日本政府徵召，組織「高砂義勇軍」，在接受短期訓練後，便被派往印尼參戰。李光輝在某次戰役中與隊友失散後，便隻身逃至深山匿居，轉眼間，在荒無人煙的印尼摩綠島深山，度過近卅年歲月的原始生活。

一直到民國 63 年 11 月，被印尼空軍中尉蘇巴迪發現，才得以於民國 64 年元月 8 日返抵故鄉。當天晚上鎮長宋賢英和秘書王河盛，得知李光輝回到都歷，帶著禮物去慰問，當陳德祥里長介紹鎮長時，他因不知鎮長是何種身份地位之人，一時之間面無表情。經隨行之王河盛秘書以日語解釋，過去的庄役場已改爲鎮公所，鎮長即是過去的庄長。他聽後立即立正站好，舉手敬禮，對宋賢英鎮長表達敬意。卅年來山中無歲月的日子，讓他一時之間無法適應社會的巨變。

而李光輝現代版的魯濱遜飄流記，也讓成功鎮這個小村莊一下湧進了大量的人潮與媒體，也算是當時的一件趣聞。

民國 65 年宋賢英罹患重疾，於台大醫院就醫中，仍對鎮上各項重要工程之進度十分關切。同年 9 月 26 日不幸病逝，留下年餘任期。

第四章　東海岸第一商店「廣恆發店鋪」創始人溫泰坤

《台東縣史．人物篇》裡記載，溫泰坤於清咸豐 11 年（1861）11 月 8 日，在屏東縣內埔鄉出生；於光緒年間冒著凶險的環境，抵達洪荒之地—成廣澳，拓墾並經商。

溫泰坤當年不畏艱難，克服交通障礙，利用成廣澳天然港口、海運各種民生物資到本地，並在成廣澳建一棟「廣恆發」店鋪，創立東海岸第一家批發商行。其後，當地居民才開始接觸文明的生活必需品，漸漸改變生活方式。

溫泰坤所建「廣恆發」店鋪老宅，爲漢人入墾東海岸僅存的一座具歷史意義的古蹟。因其子孫移居他地，使「廣恆發」老店鋪日久湮沒在荒煙蔓草間。到民國八十五年公路拓寬時，北側更被剷平過半，已不具當年風華。

溫泰坤在經商有成之後，從事土地開發事業。據昭和十四年（1939）新港庄役場的《管內概況一覽簿》記載，其資產 28 萬圓，爲當地首富，是台東廳下有名的大地主。

溫泰坤先生自奉甚儉，但對於公益不遺餘力，大正 13 年，還獲日本政府頒賞「紳章」殊榮。民國三十六年，溫泰坤在成廣澳老宅因病與世長辭，享壽 86 歲，其白手起家、創設東海岸最大商店、躍爲當地首富的奮鬥傳奇，直到現在，仍爲當地居民所津津樂道。

圖一：王河盛先生出示昭和十四年（1939）新港庄役場的《管內概況一覽簿》對溫泰坤資產的記載。筆者攝於 96/11/03。

圖二：溫泰坤先生，曹麗華拍攝，97/9/20。

溫泰坤先生來自屏東內埔的客家庄，他是 1861 年農曆是三月十一日出生，屏東內埔故鄉的居住所地址是阿猴聽港西下里內埔庄檳榔林三四四番地，1947 年，〈民國三十六年〉一月二十四日，農曆正月初三，溫泰坤先生在屏東市民生路一百一十一號去世，享年八十六歲。他於明治四十一年〈1908 年〉六月二十七日更改名字，原名爲溫大伍，改名做溫泰坤，改名原因爲何無法考證。但也許因爲改名而成就了他不平凡傳奇的一生。台灣在日治時代，戶籍謄本從 1895 年開始登記，台東成功的廣恒發在當時登記的住址是台東廳廣鄉成廣澳庄三十五番戶，到昭和十二年 1937 年十月一日，則變更爲台東廳新港郡新港庄小湊字成廣澳三十五番戶，小湊在日本時代叫做 komimato，是日本話，用羅馬拼音爲 komimato。

他可能是 1887 年或 1888 年來到台東〈明治二十年或二十一年〉，當時不僅路途遙遠，交通不便，資訊更是不發達，溫泰坤先生他獨自一人，一邊工作賺錢獲取盤纏，一邊走路，歷經千辛萬苦，幾經折騰，終於翻山越嶺，來到人稱後山的台東，當時他並沒有選擇台東當作居住地，而是繼續向北前進，到達成功的成廣澳之後才落地生根。1889 年娶微沙鹿 misalo 的客家人爲妻，微沙鹿即現在的美山，甲午戰爭結束，清廷與日軍簽訂馬關條約，1895 年台灣割讓給日本人統治，進入了長達五十年的日治時代，國民政府來台之後，一心想反攻大陸，當時並沒有長治久安的打算，濃厚的大陸情結，致使大量的更改台灣的地名，完全散失了歷史的沿革與意義。當時客家人在日治時代都是以廣東的「廣」來簡稱，若用英文則是以「Ha-Ka」來表示，閩南則稱爲「河洛」。溫泰坤先生出生於清治末期，經歷五十年的日本統治，戰爭結束，國民政府來台不久就去世，他剛好歷經了台灣最重要的三個統治的年代，他的人生也如時代變遷一般，更迭起落，充滿傳奇。

日治時期日本政府規定鹽、酒、糖都是專賣事業，不能私下買賣，要透過政府，取得營業執照，溫泰坤先生他經營的雜貨店廣恆發商號，是以民生必需品爲主，當時的米並不是從外地進口，應該是在地生產的，有自己私人的精米所，精米所是從日本話來的，

現在叫做碾米廠，剛開始用人工，請原住民用牛車拖，有發電機等相關的設備，子女也要從事家務，幫忙家事，稻米有的是自己生產的，有的是收購再加工，那時的雜貨店就是在成廣澳也就是現在的小港，在海岸山脈的山邊，住了很多很多從事樟腦砍伐製作的腦丁，做樟腦油的提煉，差不多有一百多人住在那哩，他們生活日常的所需，都是到廣恒發來購買，由雜貨店提供，買賣的東西不只是日常生活用品，包括罐頭、肥皂…等等，廣恒發這棟建築的格局是兩層樓，採巴洛克的建築風格，後面有陽台、精米所，後方約三百公尺的地方即是小港漁港，這可能是當初選擇在此建屋的主要原因，當時雜貨店的生意裡並沒有做山產的買賣，主要賣日常生活用品，有罐頭、日治時期一條一條的麵條、醬油，甚至內衣、布、糖…等，有自己有糖廍，製做黑糖，爲了維持黑糖的生產，自己有種甘蔗，以確保原料的來源。

當時腦丁製作出的樟腦油，要經過日本政府的許可，雜貨店生產的黑糖，日本政府會來檢查，太白的不能通過，日本政府管理得非常嚴格，只有黑糖可以自己買賣，但不可以精製，不可做成白糖。

根據史料的記載，台灣糖業的發展大約可分爲三個時期：[4]

(一)荷蘭時期

荷蘭時期的糖業發展是以「荷蘭東印度公司」爲主，在此之前的臺灣是以鹿皮爲主要國際貿易商品。在考量過臺灣的環境之後，荷蘭決定在台灣生產砂糖。荷蘭爲了在台灣發展糖業，引進了牛隻和吸引漢人來台，更改良耕種方法。因此，不論其殖民臺灣的結果是好是壞，對糖業的發展而言，荷蘭是有其貢獻的。

(二)清朝時期

清朝初年爲收攬臺灣的民心，因此採放任政策。使臺灣的糖業在沒有受到政府影響下，民間發展蓬勃。直到臺灣開港後（1860 年），臺灣糖業變的更爲興盛。雖然中間曾受到清法戰爭（1883-1885）及颱風（1886 年）的影響，臺灣糖仍是發展的十分蓬勃的。

(三)日治時期

滿清據台後也仿荷人，但糖的外銷主導權卻操縱在西方人的手上。日人據台(1895 年)後知台灣有天然的賦予也大加利用。原本日本是砂糖的消費國，在一八九四年時，計四百萬擔的消費量，其中八十%是仰賴進口。得到台灣後就是得到「一個救星」。歷屆台灣總督深知糖對日本的好處，都不惜餘力發展糖業，以節省價值二千餘萬圓的巨額外匯，又可開發台灣首要產業，達成台灣財政獨立及鞏固殖民地的統治基礎。台灣在被

[4]郭明亮、葉俊林著，《一九三 0 的台灣》〈台灣糖業史〉，(台北縣，博揚出版社，2004)頁 127—131。

荷蘭佔據時期，已發展出以出口爲導向的砂糖外銷。[5]

台灣在荷蘭佔領時期引入甘蔗的栽種成爲砂糖的的輸出地。當台灣成爲日本的殖民地之後，製糖業更成爲台灣產業的基礎，在各種保護政策下，許多日本財團紛紛來台牟利。許多中小型舊式糖部逐漸消失，取而代之的是矗立在嘉南平原上巨大糖廠，以及遠遠可見的高聳煙囪。

但是糖業的現代化並未對蔗農帶來好處，反而操受製糖會社更多的剝削，「指定原料採取區域制」是各種不公平制度的首惡，糖廠周遭若干蔗園爲指定原料地，蔗農不得將甘蔗外賣他地，形同賣身糖廠；同時，收購價錢由糖廠單方面決定蔗農無權參與，只能對著低賤的價錢嘆息，糖廠秤量甘蔗時，也總是挑三揀四，在磅秤上做手腳，欺騙蔗農，因此「第一憨，種甘蔗給會社磅」的俗諺，廣爲流傳。

台灣地理位置因位處亞熱帶，適合栽種稻米、甘蔗等農作物。日本統治台灣之後，實施「工業日本，農業台灣」的政策，台灣除了自給自足外，還擔負起供應日本國內糧食的責任。爲了達到目標，總督府積極發展農業。表面上台灣的農業迅速成長，但台灣農民在帝國主義與資本主義雙重傾軋下，卻過著悲苦的生活。

清政府領台後，自 1725 年台灣的樟腦被滿清政府獨佔，以樟樹爲建造戰船所需的材料爲名義，嚴禁私人煎腦，並專由「軍工廠」經營。其實滿清政府自已也進行煎腦的工作，美其名，稱之爲「軍工料」。獲利極豐，因爲有利可圖，所以才由清政府獨佔經營。

到了乾隆年間(18 世紀中葉)，樟腦業開始進入全盛期，但是由於台灣的樟樹都是原生於中央山脈地帶，如此必須進入番界，常受到原住民的攻擊，所以進出深山伐木的「腦丁」應運而生。腦丁即私人武力，專門爲伐樟樹，並防止原住民的攻擊。

1810 年，清政府將噶瑪蘭收入版圖，噶瑪蘭的山中所產的樟木足以供應軍工廠製腦，噶瑪蘭通判楊廷理諭令淡水的匠首林永春承辦，獲得很大的利益。另一方面，由於樟腦事業有利可圖，而清政府以官方之力遂行獨佔，所以民間轉入地下經營，因此清政府指爲「私煎」。因利之所趨，私煎者也非常眾多。

到了道光年間(1821 年至 1850 年)，英國船隻來到台灣，在雞籠上岸，向民眾採購私煎的樟腦，付以違禁的鴉片交換，如此相互交易，馬上引起樟腦價格急遽上漲，於是樟腦業更爲興隆。

民間能與英人交易，清政府官員也不甘人後，與英商勾結偷運巨量的樟腦出口，清政府官員一向的作法私利優先。這是在 1859 年清政府將訂立天津條約之前。

西方勢力開始入侵中國，在 1860 年分巡台廈兵備道陳懋烈議呈樟腦事業歸官辦，在台北艋胛街開設「料館」專管樟腦業務。

---

[5]黃大受，《台灣史綱》〈日本暴政下的台灣〉，(台北市，三民出版社，2002)頁 230—262

1866 年，分巡台灣兵備道吳大廷再次整頓，嚴格禁止把樟腦直接販賣給外商。在這樣清政府把樟腦業統歸官辦而嚴格取締民間售給外商的情況下，招致與英人樟腦商的國際糾紛，以至 1868 年(同治七年)，英艦來襲安平港(樟腦戰爭)。於是，清政府頒佈「外商採買樟腦章程」，實際上是清政府低頭，撤消了樟腦官營。但是 26 年後，即 1886 年台灣巡撫劉銘傳再度把樟腦收歸官營。

在臺灣的樟腦業可分成在現場製腦的「製造者」及將電舖設於腦務局或分局的「營業者」。製造者又分「腦長」與「腦丁」。腦長顧名思義就是腦丁之長，臺灣總督府官員於日治最初期調查所見，擔任製腦工作者皆爲臺灣客家人，營業者則設店舖或居住於腦務局或分局所在地，亦有派遣人員駐於當地的情形。

根據記載，營業者多爲福佬人，而資金來源大多是外商投資，透過洋行的融通，可以使腦棧的資本不致於曝露在風險之中。[6]

溫泰坤先生當初爲何會會千里迢迢來到台東，可能是考慮到那裡還沒有開墾，有錢可賺，他到台東是走路去的，慢慢走路去，那時窮鄉僻壤，還沒發展，1887 年 1888 年那時也還沒有公路，一路做工，輾轉來到台東。

人的機會可能是天註定的，一個機緣巧合，他沒有停留在台東市，一路北上到成廣澳，當時成廣澳是後山開發最早，發展最早的地方，新港地區是後來才發展的，所以支廳成廣澳支廳在日據時代就是在澳仔(成廣澳)，以雜貨店那條街爲基準，慢慢向道路兩旁發展，那時當地就有派出所，比新港更爲發展。後來日本人來到台東，認爲澳仔咾咕石、珊瑚礁較多，漁船要進出漁港比較困難，慢慢才往新港地區發展，成廣澳在日治時期叫做 komimato(小湊)，後來才改名爲小港，新港開始發展，船隻轉移停泊，澳仔就慢慢的沒落，港口的生意就一直減少，一直蕭條，它發展時間約在日治前期，1931 年後就慢慢沒落，人口開始外移，腦丁，走了以後，販賣對象主要是當地的居民，河洛人、客家人、原住民都有。主要的房子不止只廣恒發而已，還有另外居住的地方，廣恒發商號是屬於巴洛克式的建築，有三間樓房，有陽台，店面賣雜貨，裡面有個大櫃子，是檜木做成的，櫃子裡面可以放置重要的東西，旁邊有一個大椅板可坐，後面是溫泰坤先生的房間。那時已有公車通行，店裡自己有貨車、腳踏車。當時路上往來的車子並不多。

[6]戚嘉林，《台灣史下冊》，(台北縣，尚鋒出版社，1885)頁 146—236

圖三：廣恒發商號。柯熙和拍攝，97/11/22。

日治時期，小村莊裏唯一的店可能就是雜貨店，賣著各種民生用品，如糖、米、油、菸酒、醬油、電燈等，都可以在這裡一次買齊。店門口可能還會擺幾張長條椅凳，讓村民聚在這裡聊天，成爲村子資訊交流的中心。日治時期專賣的物品要有牌照才能販賣，看到屋簷下掛著「酒」、「菸草」的牌照，就知道雜貨店到了。

明治維新時期，日本派遣留學生至歐洲邀聘各國的建築師來到日本，引進西洋建築形式，統治台灣後，建築師來台大顯身手，這些西方建築風格，從歐洲流傳到日本，再從日本傳到台灣，西洋建築成爲台灣醒目的城市景觀。西方形制的山牆用泥塑、剪黏等傳統手法，讓街屋完美的融合西洋建築風采與台灣裝飾風格。在此同時，日本來的建築風格也在台灣生了根，宿舍、神社、料理店、旅社等，都受其影響，玄關、和室、榻榻米等，到今日也還常見，都是屬於日式空間布置。[7]

而「巴洛克式」(Barogue)是一種極其華麗的藝術，此種藝術完全符合誇示強大世俗權力之宮廷趣味及因狂熱之莊嚴儀式而引人側目的天主教儀式，更切合於現實中追求一切力量、一切富足的時代精神。「巴洛克」(Baroque / Barock) ，源自葡萄牙文，爲「變形的珍珠」之意，隱含有貶抑的色彩，此一術語其後在歐洲藝術史上係指一個時代之標誌，即西元 1600 年至 1750 年間的藝術文化，它上承文藝復興後期的矯飾主義，下接十八世紀的洛可可式藝術。巴洛克建築之風格在於建築物外貌精美的裝飾及雕琢，造就出一種輕盈流暢的動態感，並藉由外在光線營造出一種如幻似真的感受，配合著精美絕倫的工藝技巧，予人一種金碧輝煌的感覺。

巴洛克藝術最早起源於義大利，義大利最著名的巴洛克建築當屬羅馬的聖保羅大教堂及其廣場，聖保羅大教堂的圓頂穹窿爲文藝復興式建築，緊鄰其旁、具有宏偉廊柱之廣場及主教堂內部之精美裝飾則表現出巴洛克式之風格；然而最具代表性的巴洛克建築實爲法國的凡爾賽宮，凡爾賽宮象徵了當時絕對主義的專制王權的權威，將宣揚威望所需的一切雄壯及威嚴，藉由凡爾賽宮的精美裝飾化爲實際，可謂爲巴洛克建築一項特殊之風格。

在廣恒發的馬路對面是一家叫馬榮通的房子，他的隔壁也是家族的房子，裡面的佈

[7] 郭明亮、葉俊林著，《一九三0的台灣》〈建築形態〉，(台北縣，博揚出版社，2004)頁178—200

置有神桌、飯桌、倉庫及溫泰坤子女居住的房間，還有廚房，後面空地上有留有一顆大石頭。

圖四、五：廣恒發商號馬路對面溫家古宅。

柯熙和拍攝，97/11/22。

成功那時的名字叫做成廣澳，那時已經不是以物易物，而是有買賣的行爲，因鄰近小港漁港，海產的部分也有交易，因應市場需求，也有肉類買賣，並非以物易物的方式，佔取原住民的便宜，那時雜貨店和原住民的關係良好，也聘請很多原住民的工人，爲原住民創造工作機會。

溫泰坤先生在日本時代曾被日本人表揚過，因爲澳仔國小的地(日治時期的公學校，即今日的忠孝國小，創建於民國前八年)，是否有得到日本政府的補助就不得而知，宜灣的公學校也是溫泰坤先生捐的(今爲博愛國小)，1925 年二月十一日授頒紳章，表揚溫泰坤先生的貢獻。

圖六、七：小港忠孝國小。柯熙和拍攝，97/11/22。

圖八、九：小港忠孝國小。柯熙和拍攝，97/11/22。

圖十、十一：宜灣博愛國小。柯熙和拍攝，97/11/22。

台灣於 1895 年割讓給日本成爲殖民地，[8]1930 年代前後，日本將華南、南洋一帶設爲侵略的目標，將台灣當做到南太平洋諸島的補給基地。1941 年日本偷襲珍珠港，美國加入戰爭後，便陸續對台灣發動轟炸。戰爭快結束時，美國飛機來台東成功掃射房子，廣恒發的房子也成爲掃射的目標，當時牆上留有無數的彈孔，連屋內溫泰坤先生獲頒紳章的照片上的胸章也被子彈打中，事後台東的日本兵官還到裡面查看。[9]

1943 年底，美軍開始轟炸台灣，企圖癱瘓日本的南進能力。美軍鎖定機場、交通設施、工廠進行攻擊。總督府開始將都市居民疏散到鄉村。1945 年，美軍展開全面的空襲，市區的公共建物遭到炸毀，至今許多公共建物上仍留有遭炮彈毀損的痕跡。「走空襲」的防空洞避難經驗，也因此成爲經歷過那個時代的人民的共同記憶。

1945 年戰爭結束，1945 年十一月溫泰坤先生回到屏東。根據孫女溫芳淑女士的轉述，溫泰坤先生娶有妻妾二人，大房生了兩個女兒，二房生了五男三女，後因意外疾病

[8]賴澤涵，《台灣 400 年的變遷》〈日治時期殖民統治政策之演變〉，(桃園縣，中央大學，2005)頁 237—256

[9]李筱峰，《台灣史 100 件大事》〈盟軍空襲台灣〉，(台北市，玉山出版社，1999)頁 180—181

么折剩下三男一女，馬榮通的太太和二房是姐妹，具有原住民的身分。大房邱阿好女士，育有二女，二房也就是溫芳淑女士的祖母，生有五男三女，後剩下三男一女，三個男生的名字分別爲溫鼎貴、溫德鳳、溫德喜先生。[10]

溫泰坤先生後來是在屏東市過世的，當時喪禮長達兩個禮拜，場面非常的盛大，此與史料記載他在成廣澳過世大有出入，所謂落葉歸根，溫泰坤先生最後還是選擇回到故鄉終老。

附錄一：王河盛撰《台東縣史人物篇》〈成功鎮—溫泰坤（1861-1947）〉，頁 P443—444

溫泰坤於清咸豐 11 年（1861）11 月 8 日，在屏東縣內埔鄉出生；於光緒年間冒著凶險的環境，抵達洪荒之地——成廣澳，拓墾並經商。

古早的成廣澳景觀優美，橢圓形珊瑚礁的天然港口，可泊船隻。相傳明末便有漢人來此經商，因有港澳，漢人稱之「澳仔」，後來稱爲「蟳廣澳」，指其形狀如螃蟹左右的兩支箝子，相接圍成的海灣而得名。另有一說，在清朝時代，清兵曾駐在此地，他們都來自廣東，所以改稱成廣澳。

溫泰坤當年不畏艱難，克服交通障礙，利用成廣澳天然港口，海運各種民生物資到本地，並在成廣澳建一棟「廣恒發」店鋪，創立東海岸第一家批發商行。其後，當地住民才開始接觸文明的生活必需物品，漸漸改變生活方式。

溫泰坤所建「廣恒發」店鋪老宅，爲漢人入墾東海岸僅存的一座具歷史意義的古蹟。因其子孫移居他地，使「廣恒發」老店鋪日久湮沒在荒煙蔓草間。到民國 85 年公路拓寬時，北側更被劃平過半，已不具當年風華。

溫泰坤在經商有成之後，從事土地開墾事業。據昭和 14 年（1939）新港庄役場的《管內概況一覽簿》 記載，其資產 28 萬圓，爲當地首富，是臺東廳下有名的大地主。

溫泰坤性情溫和，富進取之氣，唯一信條是勤儉節約。據聞他生前外出走路都是打赤腳。公路開通後、自成廣澳到市區約 7 公里路程，有事情要辦，通常也是步行，節省車費，並可鍛練身體。

溫泰坤非過分惜財，其原則是能省則省。不過對於地方公益熱心參與、出錢出力，貢獻良多。因此，於大正 13 年（1924）獲日本政府頒賞「紳章」殊榮。

溫泰坤重視子弟教育。當年本地只有國小學校，不顧其時交通之不便，均遠往西部接受教育。長子溫鼎貴，畢業於日治時代之臺南師範，曾任本地公學校訓導多年；次子溫德鳳、三子溫德喜，均完成中學校學業。

光復後，溫鼎貴、溫德喜遷居北部從商。溫德鳳曾在成功鎮市區經營碾米廠，後移居臺東市，參與創立臺東區合會（現臺東區中小企銀），曾任總經理、董事長等要職，

[10]王河盛《台東縣史漢族篇》〈新港(成功)溫泰坤家族世系圖〉，(台東縣，(台東縣政府，2001)頁 66

是臺東金融界舉足輕重的人物。退休後，長子溫敦雄出任總經理多年，現已退隱。

溫泰坤生平以身作則，奉行勤儉節約美德。其後代雖然個個經濟情況富裕，但均遵守、效法高曾風範，生活起居相當儉樸，在地方傳爲美談。

民國 36 年 1 月 24 日，溫泰坤在成廣澳老宅因病與世長辭。他一生白手起家，能成爲本地區首富有如此成就，其成功歷程足堪後人效範。

附錄二：《成功鎮志歷史篇》〈沿革紀—第四章　日治時期的發展〉，頁 133

本島人中，溫泰坤爲客家人，原籍屏東內埔，清光緒年間至成廣澳拓墾，並經營貿易。當時成廣澳爲東海岸一帶主要的港口，爲附近聚落貨物之集散中心，溫泰坤利用此一優勢條件，以海運批發各種民生物資前來販售，成爲當地主要的大盤商。溫家亦因此以富厚，日治初期，溫泰坤在成廣澳興建商舖店面，名曰「廣恒發」建築採巴洛克建築，店面前並留有本省建築特色之「亭仔腳」，其建材，門柱、雕飾與樣式之壯觀與華麗，堪稱爲東海岸之首，爲成廣澳主要之地標。

溫家經商成功之後，廣置土地，成爲成功一帶最大的地主，並且將事業延伸至碾米廠。如此，溫家一方面以地主身分，控有稻穀的來源，再透過自家的輾米廠將稻穀碾製成白米出售，因此，雖然大正以後，商貿的重心逐漸由成廣澳向新港轉移，溫泰坤仍然是成功地區的首富。大正 14 年(1925 年)4 月 17 日，台灣總督府以溫泰坤經營事業有成，特別頒授「紳章」，以爲鼓勵。

三、溫泰坤先生長子—溫鼎貴先生

圖十二：溫鼎貴先生年輕時的照片。曹麗華拍攝，97/9/20。

1931 年溫鼎貴先生感覺到成廣澳已開始式微，轉而在台東經營農場，有照片爲證，照片裡面有稻米，另外這一張是次子溫德鳳先生結婚的照片，從照片上大家身穿「西米蘿」的衣著中，隱約可以看出當時家裡富裕的經濟情況，這張 1936 年三月初拍攝的相片，曾泡過水，也有撕破損毀過。裡面有溫泰坤先生、溫鼎貴先生，還有溫芳淑女士，一般史料中溫泰坤先生的照片是從這張翻拍過來的，照片中溫芳淑的姊姊，當時是國小一年級的學生，還有溫芳淑女士的嬸嬸、母親，溫芳淑女士的母親抱著的是弟弟，溫德

喜先生，大舅，是溫芳淑女士母親的兄長，溫芳淑女士的姨丈高阿榮先生(1898-1945)，是出名的醫生，可惜早死，戰爭結束後不久過世。

照片中的人是溫鼎貴先生夫婦的照片，他們當時是 1926 年，也就是大正十五年四月二十三日結婚，結婚的過程非常的戲劇性，溫鼎貴先生與人相親後，馬上決定結婚，直接迎娶回來。

圖十三：溫鼎貴先生八十歲大壽，伉儷合照。曹麗華拍攝，97/11/22。

1935 年，溫鼎貴先生與妻子結婚，經過了九年後才回到娘家，剛好遇上四月二十一日台中屯仔腳的大地震，幸好沒有受傷。當時要返鄉的路程非常遙遠，那時從澳仔到苗栗，要從小港坐船到台東，從台東坐船到高雄，再坐車到苗栗。溫鼎貴先生那時透過朋友的介紹，因第一次相親的女子年紀較大，不甚滿意，另外再行介紹，一見鍾情後就決定娶她爲妻，先娶到屏東，到老家內埔檳榔宴客，祭拜祖先，那時祖先牌位也有請到成廣澳，現在祖先安放在台北的金寶山。

1919 年五月二十日溫鼎貴先生進入台南師範學校，1924 年畢業，畢業兩年結婚，教書一年就沒有繼續教書。回來接掌龐大的產業。那時在台東也有房子和農場，後來的台東農工校地有部分也是溫家捐出的土地，台東的農改場也有部分是溫家的土地，後來被國民政府徵收。

圖十四：台東農校(今台東專科學校)。圖十五：台東區農業改良場。

柯熙和拍攝，97/11/22。

昭和十二年七月七日七七事變，溫鼎貴先生於十二月十八日被徵召爲軍伕，有照片爲証，名爲出征記念。

圖十六：溫鼎貴先生出征紀念。曹麗華拍攝，97/9/20。

1937 年七月七日，日本發動「蘆溝橋事變」，[11]揭開中日八年抗戰的序幕，戰爭初期，戰火並未波及台灣，台灣島尚未明顯感受到戰爭所帶來的煙硝味。以消滅台灣人的漢民族文化精神爲目標的「皇民化運動」也隨之開展。除了廢止報紙的中文，推行國（日）語，撤廢偶像、寺廟等，同時也強制神社參拜。當時的台灣青年，隨時隨地都可能被徵調到南洋或中國大陸戰地當軍伕。

1941 年四月，以標榜昂揚戰爭意志、實踐決戰生活、強化勤勞態度、完備民間防衛爲目標的「皇民奉公會」成立，[12]由台灣總督長谷川清兼任總裁。下設總務、宣傳、訓練、文化、生活、經濟等部門。地方各州、廳、市、郡、街、庄等設有支部、分會、支會等，其長官由各級行政首長兼任。1941 年六月，各地分會紛紛成立，很多台籍仕紳、醫生、學者、商人、辯護士都被徵召爲幹部。

1941 年十二月，太平洋戰爭爆發，「皇民奉公會」成爲驅策總動員的機關。戰爭期間，成立「拓南農業戰士訓練所」、「拓南工業戰士訓練所」、「海洋訓練隊」、「高砂義勇隊」等組織，訓練台灣青年，投入戰爭，擔任軍伕。更於 1942 年及 1943 年間分別實施陸軍與海軍特別志願兵制，將近 21 萬台灣青年被徵召到東南亞及華南戰線。維持家計的青壯年男人，一旦被徵調入伍，家中的生計來源便幾乎斷炊，生活變得非常困苦。家中的女性不得不堅強起來，獨撐大局。[13]

日本殖民政府爲了祈求勝戰，神社的祈願祭、奉告祭等戰時祈願也在台灣各地展開。出征前，部隊長會率領部隊至神社參拜，祈求勝戰。但是，在這場戰役中，台灣青年總共犧牲了兩萬八千多人，而倖免於死的，卻都成了俘虜，被關在集中營，歷盡千辛萬難，才得以回到家鄉。

---

[11]蔡錦堂，《戰爭體制下的台灣》〈中日戰爭的前奏曲〉，(台北市，日創社，2006)頁 7—14

[12]李筱峰，《台灣史 100 件大事》〈皇民奉公會成立〉，(台北市，玉山出版社，1999)頁 172—175

[13]李筱峰，《台灣史 100 件大事》〈日本開始在台募兵、徵兵〉，(台北市，玉山出版社，1999)頁 176—179

1941 年，日治昭和 16 年，在皇民奉公運動的鼓吹下，[14]日本徵召許多台灣青年到南洋當軍伕，隨著殘酷的戰爭炮火四起，神社成爲日本殖民政府祈求勝戰的精神寄託所在，數以萬計的台灣青年投入「大東亞聖戰」。[15]徵召入伍時，在神社的祈願參拜，使得神社成爲老一輩台灣人的生命歲月中，與親人、愛人生離死別的空間記憶。

1946 年十二月澳仔已沒落，雜貨店結束營業，那時大約是溫德喜先生結婚的時間，台東區合會(台東中小企銀的前身，現已被併購爲荷蘭銀行)後來給弟弟溫德鳳先生經營，據溫芳淑女士轉述，溫鼎貴先生做的事業，一旦上了軌道就會離開。

圖十七、十八：台東中小企銀(今荷蘭銀行)。柯熙和拍攝，97/11/22。

溫鼎貴先生會離開台東可能是因爲當時日本人對知識份子取締的非常嚴格，也或許是溫鼎貴先生曾參加林獻堂的台灣文化協會，[16]受到日本人的注意，溫芳淑女士小時候曾見過日本警察來家裡搜查，接獲日本人的來信，就要去接受問話，溫鼎貴先生說在台東那個小地方，比較會被注意，也爲了孩子的教育，才決定遷到台北。

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民族自覺運動在世界各地風起雲湧，促使台灣知識份子對於台灣的未來，有了更積極的作爲。1919 年底，林獻堂、蔡惠如等人集合了百餘名在東京留學的台灣學生，成立「啓發會」創辦《台灣青年》雜誌，成爲台灣民族解放運動的先鋒。1921 年，以蔣渭水爲代表的台灣知識份子，則發起「台灣文化協會」，以發達台灣文化爲目標，從都市到鄉村，舉辦密集的演講會，讀報會等，對臺灣人反抗日本殖民統治的意志，影響深遠。

溫鼎貴先生被徵召那時，溫芳淑女士正在就讀公學校，那時一學年分成三個學期，日本人是四月一日開學，[17]這是英國制，現在學校一學年是二學期，是美國制。溫芳淑女士是四月三十日出生，溫鼎貴先生想讓年紀只差一個月的女兒溫芳淑女士提早入學，但後來被學校退學，當時日本人規定嚴格，不足齡無法就讀。

---

[14]蔡錦堂，《戰爭體制下的台灣》〈皇民奉公運動的展開〉，(台北市，日創社，2006)頁 87—96

[15]蔡錦堂，《戰爭體制下的台灣》〈軍事人力動員〉，(台北市，日創社，2006)頁 16—18

[16]陳君愷，《狂飆的年代》〈第三章—謀求台灣文化之向上〉，(台北市，日創社，2006)頁 44—49

[17]賴澤涵，《台灣 400 年的變遷》〈日治時期台灣的教育〉，(桃園縣，中央大學，2005)頁 260—288

當時只有溫鼎貴先生、溫芳淑女士和姊姊三人住在台東，她的母親偶而才會前來，她平時都住在成廣澳，那時母親有許多的工作要做，要發落很多的事情，有時才會來，經常來來去去的，溫鼎貴先生要徵召時，姐妹須送回成功，剛好前兩三日地震，根據溫芳淑女士的回憶，當時要過台東大橋時，橋面搖晃得很厲害，來到半路，山壁土石崩塌，租的車須到中間接駁，當時計費是看路程多遠，時間多久，中間以無線電聯絡，走路繞過山崩的地方，溫鼎貴先生背著當時還是小孩的溫芳淑，走到車子接駁的地方，再坐車回家，差不多午後出門，到澳仔已經晚上，回到家後，家人都很煩惱憂慮，兩三天後溫鼎貴先生與弟弟又回到台東。

溫鼎貴先生非常幸運，當時從高雄港出發，坐船到上海外海，不知爲何，一直無法進入上海，又坐船回到枋寮等候，等了好幾個月沒有消息，就就地退伍回來。下圖照片是農場的照片，農場名稱是叫做：「旭農場。」，種稻米，順便幫父親處理事務。台東的房子有照片爲證，這張是昭和十二年溫鼎貴先生經營的農場——旭農場，當時已有公車牛車，在台東街上也有蓋房子(在今天的中山路上)。

圖十九、二十：旭農場。曹麗華拍攝，97/9/20。

溫芳淑女士要離開台東那時非常傷心，對台東的房子很有感情，這個房子位於中山路的日式房子並沒有蓋很久，全家就要舉家遷到台北，心裡有些不捨，溫鼎貴先生在去台北之前，曾去了一趟日本，去日本觀光，這趟日本之行可能給他很多的啓發和想法，才決定移居台北。溫德鳳先生娶妻之後，家裡多了人手，溫鼎貴先生到台北之後，妻子才一起搬來，照片中房子落成時，曾請日本的師公來舉行祈福的儀式。

圖二十一：溫家台東寶町興建中的日式房屋。

曹麗華拍攝，97/9/20。

1937 年皇民化運動開始。[18]日治時期日語在台灣稱爲「國語」。[19]皇民化運動爲了獎勵台灣人說「國語」。總督府設立「國語家庭」辦法，鼓勵台灣家庭使用日語，過著「日本化」的生活，包括奉祀日本所信奉的神，改穿和服或國民服，就可享有「國語家庭」的優惠。例如小孩子較有機會進入中學念書，公家機關可優先任用，食物配給較多等等。直到 1943 年間，台北州，包括台北縣市、基隆市、宜蘭縣，共有三四四八戶被認定是國語家庭。其措施如下：

一、推行日本語言的政策，限制對原本語言的使用，推動所谓「國語家庭」（國語の家）。

二、更改姓氏運動：要求改用日本姓氏，比如李登輝改名爲岩里政男。要求一般人民對日之丸（日の丸）國旗的敬愛，並要求齊唱君之代（君が代）國歌。

三、建立神道教的象徵物神社。

四、基於教育敕語的國家教育。

皇民化運動推行包含宗教改革、社會風俗改革、國語運動、改姓名等制度。獎勵台灣人說「國語」、限制使用台灣話，報紙的漢文欄也被廢止，「國語講習所」大量增設，鼓勵台灣人學習「國語」，以便普及日語能力。

臺灣總督府爲推動皇民化運動，開始強烈要求台灣人說國語（日語）、穿和服、住日式房子、放棄台灣民間信仰和祖先牌位、改信日本神社、同時也要每日向日本天皇居所膜拜。此外，殖民政府也在 1940 年公佈改姓名辦法，推動廢漢姓改日本姓名的運動。[20]

日本人的飲食口味偏向清淡，飲食也影響台灣，餐桌上看到的味增湯、漬物、沙西米(生魚片)、哇沙米、納豆都是日式的食物，到現在我們的飲食還隱隱約約嗅得到日本味。尤其是閩南語中還保存了許多日本的外來語。

1941 年日本偷襲了美軍在夏威夷的基地，導致美國對日本宣戰。美軍加入戰爭後便陸續對台灣發動轟炸。最後，由於戰爭規模不斷擴大，所需兵員越來越多，日本當局也在 1942 年開始在臺灣實施陸軍特別志願兵制度、1943 年實施海軍特別志願兵制度、並於 1945 年全面實施徵兵制。

1945 年戰爭結束後溫家連續發生了幾件大事，1946 年四月，一是溫鼎貴先生的小女兒過世，二是 1946 年八月國民黨帶走溫鼎貴先生，十一月到達法院訴訟，起因可能是糖的買賣，被合作者利用或污陷，或是自己也有參與，被污告爲走私，國民黨的士兵拿

[18]蔡錦堂，《戰爭體制下的台灣》〈皇民化運動的展開〉，(台北市，日創社，2006)頁 16—18

[19]蔡錦堂，《戰爭體制下的台灣》〈普及國語運動〉，(台北市，日創社，2006)頁 19—22

[20]蔡錦堂，《戰爭體制下的台灣》〈改姓名運動〉，(台北市，日創社，2006)頁 47—58

槍抵著溫鼎貴先生，把他押走，妻子緊急聯絡台東的小叔，小叔多方奔走籌錢探聽，找朋友幫忙，才查出溫鼎貴先生的下落，花錢消災，拿錢了事，「那時才深深體會到在日治時期，守法都沒有出事，爲何國民黨一來就出事，給我很深的打擊，所以我不屑學習國語(中文)。」那時還有很多人都想趁機從中勒索，一直到十一月才保釋。三是溫泰坤先生於十二月初回到屏東家鄉，溫芳淑女士的母親南下照顧，那時大姐已從高等女學校畢業，在台北找到工作，開始有頭路，那時溫芳淑女士剛考完試，接到家裡的電報趕回屏東，隔年一月二十四日爺爺往生。溫芳淑女士回憶說：「爺爺非常嚴格，對兒子媳婦管教嚴格，後山的環境不好，家裡的人都要勞務，請很多的長工，母親非常的辛苦，嫁到台東，1926 年結婚，九年後才首次回到苗栗娘家，遇到了台中屯仔腳的大地震，爺爺去世，舉行的喪禮非常盛大，當時在屏東轟動一時，也因此大家都認爲家裡很有錢，爲了遺產稅，父親和叔叔到處奔走籌錢，現金都繳稅了，後來生活很困苦，稅金都繳給台東縣政府，讀高中時因生活困苦，同學邀約去看電影都不敢去。記憶中爺爺雖然嚴格，但過年都會給媳婦做新衣，大學時姐姐的衣服修改讓我穿了四年，大學時爺爺叫我不必再唸書了，我說不行，時代不同了，後來阿公說你要讀就去讀，當時阿公給我一百元，至今猶對這件事情印象深刻。」

溫鼎貴先生生有二男四女，後剩二男二女，溫泰坤先生除了有自己親生的子女，還有收養養子養女，可能是那時家裡需要大量人手的幫忙。

溫鼎貴先生與妻子結婚，在當時非常風光，溫鼎貴先生出手大方，有很多聘金，女方以爲嫁過去是去做少奶奶。「後來外婆到高雄岡山探望阿姨，才順道到台東探望母親，母親回到苗栗，幫叔叔物色對象，所以叔叔結婚時，大舅有來參加，照片上的穿著都非常的正式。」[21]溫芳淑女士回憶說。

[21]陳柔縉，《台灣西方文明初體驗》〈裝扮〉，(台北市，麥田出版社，2005)頁 282—293

圖二十二：溫鼎貴先生伉儷年輕時合照。圖二十三：溫德鳳先生結婚全家合照。

曹麗華拍攝，97/9/20。

清領時期的台灣男性穿長袍馬褂留辮子，女性則裹小腳梳著髻。纏腳、蓄辮、吸鴉片是日本人眼中的台灣人三大陋習，1915 年六月十五日是限定剪掉辮子的最後期限。辮子剪了台灣人的穿著也變了。在同一場合，有時會同時出現中式、西式、日式等不同穿著。1930 年代上海風格的服飾，在台灣風行一時。1937 年總督府開始獎勵臺灣人改穿和服或國民服，認爲去除中式改穿和服，就可以培養國民意識。只是和服穿著不便且價格高昂，多數人負擔不起，因此推動不易。

四、溫泰坤之孫—溫芳淑女士

圖二十四：溫芳淑女士。曹麗華拍攝，97/9/20。

溫芳淑女士是客家人，祖籍在屏東縣內埔鄉的客家庄，但是從來沒有住過那裡，出生故鄉在台東成廣澳，父母親祖籍都是客家人。她經常回憶起小時候在廣恒發的一切，在房子裡爬來爬去、跑上跑下，後面有兩間倉庫，有精米所，再後面是一般人家的茅草屋，二層樓後方有曬米場，那時在此精米，請原住民拖牛精米，後來才改採機械化，那時家裡也有在賣煤油。

1931 年起日本一連串的教化運動中，「敬神尊皇」是一項重要的任務。敬神尊皇裡的神指的是日本神道教的神，皇是指天皇，簡單說就是要求百姓敬仰神道教的神，尊崇萬世一系、神聖不可輕犯的天皇。日本神道教的神觀屬於多神教系統，對山川神靈等行自然崇拜，相信靈魂不滅，算是具有濃厚原始宗教性個的民族信仰。台灣地方的行政機關發起各種消滅傳統的活動，「正廳改善」，勸導台灣人將正廳奉祀的神佛祖先改爲日本神，並且發動燒毀寺廟神佛像，要求民眾到神社參拜，試圖將台灣人從家中到寺廟，都改成日本神道信仰。

1937 年推動寺廟整理運動，[22]用意在壓制台灣的傳統信仰，發揚日本神道。許多台灣本土寺廟被迫關閉或改爲日本佛寺講道所，總督府甚至在台灣各地興建神社，最具代表的是結合天皇崇拜與軍國主義的建功神社。雖然限制製造金銀紙，但民眾仍然會私下購買以小學生習作紙張製成的簡易金紙，以奉祀媽祖、土地公等本土神祇。日本信奉神道，皇民化運動推行時，總督府鼓勵台灣民眾在家中設置神棚來恭奉「神功大麻」即天照大神神體，[23]意圖改變台灣人的傳統信仰。

台灣日報九十二年六月十五日副刊刊登溫芳淑女士投稿的文章——床之間落難的媽祖，詳細的記載當年小港媽祖落難的經過，與一般史料的記載有很大的出入。1940 年日本政府實施廢廟政策，日本軍隊要打破一般百姓的迷信，當時要搜括媽祖的神像，成廣澳當地的士紳特別商請溫鼎貴先生將媽祖藏身帶走，以保護媽祖的安全，詳細經過由溫芳淑女士撰成＜床之間落難的媽祖＞一文，茲徵得溫芳淑女士同意，轉載如下：

記得是八月下旬陽光普照的早上，父親帶著大姊、我、弟弟三個小孩下了從成廣澳到台東街的巴士後，為了搭乘開往高雄的巴士，便匆匆趕到汽車站的另外一個剪票口。正要走進去十，我突然跌倒了，提在手裡的盒子也掉了下去，我趕緊爬起來，用日語向走在前面的父親說：「我跟神樣(神明)一起跌倒了。」父親回頭，板起面孔瞪了我一眼，瞬間我發覺我說錯話了，就默默拍打裙子，膝蓋好像還有點擦傷。然後再把用報紙包裝的長方形盒子上面的土粉拍掉，才跟著父親後面上了車。我不敢左看右看，害怕剛剛我說的那一句話被別人聽到。父親依然沒有說話，若無其事地坐在弟弟的旁邊，我只好湊過去坐在後排大姐的旁邊，但還是沒有講話，我有點懊惱，只好把那個盒子小心翼翼地放在我的膝蓋上。

當時我只有九歲，台北市蓬萊學校的三年級生，我所提的盒子裡面裝的是成廣澳天后宮的媽祖神像。跟媽祖一起跌倒是我最難忘的一件事，現在我已經七十一歲，從那一次的跌倒開始，我變成很會跌倒，會無緣無故，莫名其妙跌倒，跌倒的次數實在數也數不清；在國外也跌倒了好幾次，在東京甚至有一次從電梯上面跌下來。更誇張的是在緬甸仰光的雪達根寶塔參觀時，導遊先引領我們到一棵樹齡逾百年的菩提樹下，我看到了它的葉子跟台灣有點不一樣便好奇地向前邁步，因為沒有注意到剛剛用水擦過的大理石地板，就這樣整個人向後倒下去，屁股重重著地，發出一大聲響，同隊的人們以為發生了什麼事紛紛回頭看，發現我坐在地板上，站在我旁邊的先生因為太突然了，還來不及伸出手拉我起來，我就一骨碌爬起來了。又有一次在柏林參觀德國的國會議事堂，走出來正在下台階時，不知何故從離開地面的兩個石階的地方向下趴了下去，還好也沒有事，只是太難為情了。我不認為我有哪一條筋不對，是不是暗地裡媽祖在懲罰我？奇怪的是不論怎樣跌倒我都能夠自己爬起來，當然會有擦傷烏青，但沒有什麼大礙，媽祖大概也可憐我，所以每一次跌倒，他都匯保平安無事呢。

我們去台東街的前一天晚上，由於暑假快要結束，我們這些孩子就在房間裡整理書

[22]蔡錦堂，《戰爭體制下的台灣》〈台灣人家庭正廳改善運動與寺廟整理運動〉，(台北市，日創社，2006)頁 35—46

[23]蔡錦堂，《戰爭體制下的台灣》〈神社建造、參拜與奉祀「神功大麻」〉，(台北市，日創社，2006)頁 23—34

本和行李。突然家裡來了好幾個人，在大廳裡小聲講話，不曉得在商量什麼事情。最後我們聽到父親說：「既然你們都沒有辦法，這件事就交給我好了。我會把媽祖請去台北，當然我要負責媽祖的安全，你們放心吧。」他們就把高約二十五公分，寬二十公分的盒子交給父親。在一九四〇年中日戰爭爆發後的第四年，日本人為了摧毀台灣人的宗教信仰，用強壓手段進行廢廟政策，成廣澳派出所已經發出命令要燒毀神像了，保護媽祖已迫在眉睫。

成廣澳的天后宮是後山最早的媽祖廟，建立於一八七四年，據說在一八七一年來後山任通事的劉進來因擔心在後山這尚未開發的蠻荒之地，恐會遭遇不測，就請媽祖隨身護行。後來這尊媽祖就駐在成廣澳，並在此地安然度過了六十幾年的歲月，媽祖成為人們敬虔信仰的中心，同時也庇佑了成廣澳的繁榮。然而燒毀神像的命令引起了當地純樸的憤怒和恐慌，但又無法抗拒命令，所以只好來找父親幫忙了。在日據時代鄉下目標顯著，人口又少，比城市容易取締，因此日本人能夠嚴格又徹底實行他們的政策。父親知道藏匿媽祖是極危險的一件事情，但奈何祖父是當地的紳耆，保護媽祖是義不容辭的。我們這些小孩並不知道請媽祖到台北我們家避難是大代誌。當時我不解的是為什麼父親會把媽祖神像交給我來提，而不交給弟弟或大姊，可能是因為我比較細心吧！但他萬萬沒有料到我竟然在大庭廣眾面前跟媽祖一起跌倒，又大聲說：「媽祖跌倒啦。」

在台北我們住在建成町(現在的長安西路)的日本人宿舍區。在那裏只有我們一家是本島人，我們住的房子是連棟的木造二層樓房，有四棟連在一起，隔著小巷子對面也有四棟，這條巷子是死巷，最裡面是獨棟的西洋式二層樓房，我們家就在右邊第三棟。因為左右鄰舍都是內地人(日本人)，平常我們也只好用日語交談。當時父親為了讓弟弟妹妹能順利上日本學校就讀鄰近的建城尋常小學校(戰爭結束後校舍改為舊台北市政府)，便申請了「國語常用家庭」的認可資格。為了能取得國語家庭的資格，我們吃盡了苦頭，差不多有一個月的時間家裡沒有安寧的日子，每天緊張又慌忙，因為資格審查的委員會隨時來勘察家庭生活的層面——平時有沒有用日語交談，生活水準是否跟日本人一樣，衛生狀況如何，是否具備廚房、浴室和廁所，更重要的是廁所是否乾淨。這舉措實在太侮辱人家了。當時我是公學校三年級生，對他們這樣的騷擾感到厭惡，但我相信父母親心裡一定是比我們更難過、更痛苦。只不過是想讓孩子們能上日本人讀的小學校，就必須讓別人來品鑑家庭生活，是多麼難堪的一件事情；但也無可奈何，在異族的統治下，一切都要逆來順受，為了孩子的將來，屈辱算不了什麼。

父親會從台東的海邊小村莊來到台北市，並不完全是為了我們小孩的教育，主要是躲避鄉下小地方日本人對少數台灣知識分子的騷擾。曾經受過師範教育，並擔任過公學校訓導的父親，聽說也曾經偷偷參加過文化協會的組織，並在台東街經營有規模的農場，是日方注意的人物。因此中日戰爭爆發那一年的十二月，它就被徵召做軍伕而出徵了。當時被徵召的都是台東街的十幾位知識分子，起初他們都擔心有生之年不可能再回到故鄉來。聽父親說他們坐運輸船到了上海外海，但不知為了什麼原因卻無法登陸，所以他們就折回高雄港，然後駐紮在枋寮，一個月後就莫名其妙讓他們退伍了，但是還要他們在家裡待命。為了父親的出征，祖父和母親都非常焦慮，以為父親這一次出征再也

回不來了。所以後來父親要離開台東到台北發展事業實，祖父並沒有阻止他，祖父大概也想通了吧。在日本治理台灣的那一段時期裡，大人的生活是極端矛盾的，好像患了人格分裂症，為了生存，一方面要迎合日本人的需求，但內心的掙扎只有默默忍受，外表與內心的世界是截然不同的。

由於我們已經順利取得了國語常用家庭的資格，確定不會再有任何陌生人進到屋子來，因為我們家的門楣上，父親名牌旁用釘子釘上了政府發給我們的「國語常用家庭」的牌子，這就是我們的護身符。父親算準了這一點，所以他才大膽答應村人要把媽祖藏匿在我們家。我們樓上的房間有「床之間」，它佔有房間裡最好的位置，「床之間」比榻榻米高出約十二公分，床面是木板，大約有三尺寬，六尺長，高度與房間天花板一樣高，但前面的上方有約一塊十吋寬與床面同長的牆面分隔房間和床之間，這樣剛好擋住了視線。父親就在床之間面對外面左邊上方的地方用木板定了一尺寬，三尺長的架子，媽祖和香爐就安置在那木板架子上。我們床之間的正中央掛著老虎的掛軸，通常床之間是用來擺設裝飾品，或是掛字畫的地方，所以按照日本人的習慣床之間前面應該是寬闊的空間，但我們不重視床之間的用途。父親故意在靠左邊床之間那裡放置了大姊和我的書桌，遮住了床之間前面三分之二的空間，所以閒人無法窺視床之間上面的媽祖。剩下三分之一的空間則作為通道，從那裡我們可以到床之間上面去祭拜媽祖。

我們家不是廟，供奉媽祖的地方又小又簡陋，委屈了媽祖，但為了避難這樣將就也不算失禮吧！因為那裡是家中最高又最隱密的地方。媽祖就這樣跟我們一起住下來了。當然我們在每月農曆的初一、十五都會上香祭拜一番。當我們遭遇到困難時，也會祈求祂保佑，祂好像完全融入了我們的生活中，我們也就很自然地跟媽祖一起度過了安然無恙的五年時光，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但是諷刺的是我們家除了媽祖之外，還供奉了日本天照大神的神位。為了能取得國語常用家庭的資格，我們只好順從了日本人的要求，接受神道信仰，並且在家裡設置了神棚。神棚是一般台灣神社裡本殿的縮小版，用白色木板製成的神棚約有一尺高、八吋長、五吋寬，裡面放置的是跟我們祖先的神主牌一般的牌位，但用白色厚紙板製成，上面用墨寫上了天照大神的字樣。父親故意把他安置在最顯著的地方，就是在二樓房間從緣側(房間外側的木板走廊)走進去的門口上面，用木板釘了一尺半，寬約八吋的架子。當然我們從來沒有拜過，是給日本人看的。但有時為了修飾門面，新曆過年時，故意在神殿前面百日本的餅和橘子，並在兩旁白色的花瓶裡插上榕樹的樹枝，本來應該插神樹的，但台灣沒有，只好以榕樹代替。我們台灣的媽祖和日本的天照大神，恰好兩位都是女神，都駐守在我們家裡，祂們如何相處是否爭風吃醋，或相安無事，是我等凡人不得而知的秘密了。

今年九月間我曾經到過成廣澳天后宮，想探視曾經駐到我家的開基媽祖。廟公特地帶我進到正殿後面圍起來的地方，打開鎖讓我仔細看住進我家的媽祖金身，但我確認不出來了。以前的媽祖好像是一尊慈祥的黑色木頭向，但現在卻是粉紅色的面孔，穿著華麗的衣裳。難道媽祖信眾虔誠的信仰也會改變媽祖原來的外貌？廟公說好多年前有人捐款給媽祖金身做過整容。我感嘆媽祖的落難和風光不也受到我們人的控制呢？或許我已經不是當年的小女孩，我自己也變了？但六十二年前媽祖與我們一家人奇妙又溫馨的相

依，還是讓我懷念不已。

圖二十五、二十六：小港天后宮媽祖。柯熙和拍攝，97/11/22。

溫芳淑女士在台東就學就遷過三個地方，在成廣澳住的地方是在廣恆發對面的溫家古宅，有倉庫、廚房，有地下井，是自然湧泉，水很清澈，可以洗衣洗臉洗碗盤，外面種有一棵蓮霧樹，還有豬圈，養了十幾隻的豬。印象中還有一棵麵包樹，後面距離到山邊還有很大的腹地，種植甘蔗，豬舍旁有蓮霧，紅色的蓮霧，小小長長的，放假回去的第一件事就是爬到樹上採蓮霧。童年在那裡度過，溫芳淑女士四歲就有記憶，對成廣澳的印象深刻。父親被徵召那時，住在台東寶町 165 號，可能是現在的中山路，那時也有一間店面。

圖二十七、二十八：台東市中山路寶町藝術中心。柯熙和拍攝，97/11/22。

後來到台北就讀公學校二年級，公學校畢業後考進高等女學校，當時台北有台北州立第一高等女學校，台北州立第二高等女學校，台北州立第三高等女學校，台北州立第四高等女學校，第三高等女學校是台灣人念的，其他三所是日本人念的，溫芳淑女士讀的是四高女，一、二、四高女戰爭結束後改成省立第一女子中學，合併後臺灣人只有十七人就讀，那時參加考試的人有六百多人，溫芳淑女士當時想讀一高女，但老師沒有給

她自願書，資格不符而沒有錄取。當時讀完台北高等學校才可考大學，公學校只能讀高等科二年，台北高等學校不好考，李登輝就是考到台北高等學校才去讀日本京都大學。[24]

日治時期，初等教育一般分爲小學校，公學校與蕃人公學校三種，原則上「小學校」是日本然子弟就讀的初等教育機構，「公學校」是漢族系台灣人所念的學校，而「蕃人公學校」則是原住民兒童就讀的學校。三種系統中，與日本國內教育同步的小學校，無論師資、設備、教科書內容都最優良，其次爲公學校，再其次爲蕃人公學校，形成一種差別待遇的教育。1922 年(新台灣教育令)發布後，雖准許台灣人子弟就讀小學校，但仍設有入學者必須了解日語的門檻限制。1941 年爲配合日本國內教育學制的改變，台灣的小學校、公學校等一律改稱爲「國民學校」，但課程內容仍舊有差別。[25]

台灣子弟公學校畢業後若要升學相當困難，中學校主要提供日本人就讀，台灣子弟若要升學，家境中下者只能選擇國語學校、醫學校等技職學校，少數經濟良好者則到日本本國去念書。1928 年台灣最高學府「台北帝國大學」設立，但絕大多數學生仍爲日本人。

到台北定居後，每次回台東，都要輾轉多次，回成也是一樣。從成功坐船到花蓮港，再走蘇花公路，山路崎嶇不平，大家總是吐得東倒西歪。溫鼎貴先生見狀不捨，後來回台東改坐火車到高雄，再搭巴士走南迴公路，到大武再換車回成廣澳。還曾從基隆港坐船到花蓮港，坐火車到台東再坐巴士回成功。還有時從台北坐有臥舖的車子到高雄再坐巴士回成功。當時路途遙遠，返鄉真是一條迢迢長路。鐵路是日本人建的，若無日本人在台灣的工業建設，台灣無法發展。[26]

清代劉銘傳在台灣所築的鐵路只從基隆到新竹，並未帶動運輸效益。日人領台後，重新建設鐵路，1908 年縱貫線鐵路完工。之後，台灣各地蓋起輕便鐵路(台車)，構築成本低，易於克服地形障礙，成爲日治初期最重要的交通工具。[27]1930 年汽車普及後，輕便鐵路陸續拆除，不過，公路建設幾乎都是拓寬台車路線而成的。1920 年代以後，汽車、公共汽車成爲重要交通工具。[28]

溫芳淑女士回憶說：「我的下面有兩個妹妹，一個有先天性心臟病，一個瘧疾去世，當時的衛生環境不好。當年不幸的事接踵而來，一是父親被抓，一是嬸嬸去世，最後爺爺去世。我是日本醫生接生，其他的姐妹是產婆接生，爺爺死後，父親才獲判無罪。」

當時住在台北時，已有自來瓦斯，那時還有賽馬，父親曾帶溫女士去看過，她就讀

---

[24]李筱峰，《台灣史 100 件大事》〈台灣教育令的頒布〉，(台北市，玉山出版社，1999)頁 125—128

[25]蔡錦堂，《戰爭體制下的台灣》〈戰爭體制下的庶民生活〉，(台北市，日創社，2006)頁 133—170

[26]吳密察總策劃，《台灣歷史小百科》〈台灣的鐵路〉，(台北市，新自然主義出版社，2005)頁 196—199

[27]李筱峰，《台灣史 100 件大事》〈後藤新平奠基殖民地建設〉，(台北市，玉山出版社，1999)頁 115—118

[28]郭明亮、葉俊林著，《一九三 0 的台灣》〈交通建設〉，(台北縣，博揚出版社，2004)頁 98—108

蓬萊女校時有很多活動，[29]鼓勵學生從事運動，學校還會帶去看電影，看過泰山、米老鼠…等，米老鼠在 1928 年出現，那時很進步，屏東九曲堂也有賽馬場。[30]

日本統治台灣後，因應都市發展，人口增加，娛樂休閒成長等現象，規劃了許多休閒設施。台灣人開始懂得到公園散步、去動物園看猩猩、相約電影院看電影。

日治時期的五十年，可以說是臺灣社會變遷最劇烈的年代，從傳統社會進入現代社會，但這些變遷許多是來自於總督府政策面的主導，非臺灣社會自主性的變遷。

人口的變遷，臺灣在日治時期共舉行過七次人口普查，從 1896 年全臺有二百六十萬人，到 1943 年臺灣人口達六百五十八萬人，是當時全世界人口增長最快速地區。人口的增長主要因爲社會安定、衛生條件改善，死亡率大幅下降所致。

社會風俗的改良，以往臺灣社會有三大劣習，吸食鴉片、纏足、辮髮。在鴉片吸食方面，總督府在 1897 年頒布〈臺灣阿片令〉禁止吸食鴉片，但已經成癮者經醫生開立證明可領有特許狀，購買專賣鴉片，藉此採漸禁的方式，並增加財政收入。

但總督府之後卻增加特許人數，引起臺灣民眾黨的反對並向國際聯盟抗議，國際聯盟的國際鴉片調查委員會因此於 1930 年 2 月來臺調查。

總督府除了攏絡連橫撰文提倡鴉片有益論，也開始正視吸食鴉片的問題，臺灣的鴉片吸食量也因此年年漸減，到日治最後幾年可說近於根治的階段。

放足與斷髮起初是透過學校教育的宣導，社會上也有士紳團體的提倡，在 1915 年總督府透過保甲組織，全面性進行放足斷髮運動。這使臺灣的婦女不用受纏足之苦，穿著服飾也以西式、日式爲風尚。

在這五十年之間，臺灣社會結構也發生轉變，以往是廣大的平民與極少數的士紳爲社會的兩大部分，階級流動並不活躍。

日治時期，透過教育，尤其是醫學、師範兩大途徑，以及其他專業表現都可獲得社會尊重，階級的分野較爲平等。但地方上的領導階級人多是以往士紳階級的後代所延續，形成日後派系政治的基礎。

在生活型態方面，總督府引進星期制，並將星期日訂爲假日，加上國定假日，臺灣社會有了餘暇生活，開始有了旅遊、藝術欣賞等休閒活動。

守時的觀念也在總督府大加推廣下，臺灣社會開始依照既定的時間表準時運作。

現代的衛生醫療觀念也在日治時期建立，臺灣以往是傳染病流行之區，總督府即建立現代醫療制度、公共衛生制度，廣設醫院、培養醫生，並且開辦自來水、設立城市下水道，實施防疫制度，配合警察、保甲制度去要求清潔環境、撲殺傳染病媒。這些作爲，

---

[29]陳柔縉，《台灣西方文明初體驗》〈體育活動〉，(台北市，麥田出版社，2005)頁 212—240

[30]郭明亮、葉俊林著，《一九三 0 的台灣》〈藝術生活〉，(台北縣，博揚出版社，2004)頁 168—176

始以往在臺流行的鼠疫、瘧疾、霍亂、天花、傷寒……等各式傳染病在臺消失，降低了臺灣人的死亡率。[31] [32]

日治時期的臺灣社會在較被動下，發生了重大的轉變，使臺灣更接近現代化的生活型態，多數仍爲今天臺灣社會的基礎。[33]

溫芳淑女士在受訪時多半用日語、台語和英語，她說自己國語說的不好，原因是經歷了父親被捕的白色恐怖，加上祖父過世家產被大量徵收，財產大幅減少，對國民政府的印象不好，所以不願學習國語，有濃厚的台灣意識。[34]受過日本教育的她，對於小時候成廣澳的印象深刻，充滿了無限的回憶。她自臺灣大學外文系畢業後，從事教書工作，屆齡退休後，目前住在屏東市。對祖父的事蹟資料多所蒐集，與祖父相差六十歲的因緣，隱隱中似乎有一條記憶的長線。而其他的堂弟妹，對祖父的印象就相當模糊。她因受過嚴謹的日本教育和高等教育的影響，對於祖父的事蹟，考證的年代非常詳盡清楚，對於這次的訪談，幫助很大。

※ 後記：

從溫泰坤孫女溫芳淑女士的訪談中，隱約可以了解溫泰坤先生當年來到成功，在天時、地利、人和的條件下，成功地經營雜貨店廣恆發商號，當時規模之大，首屈一指，成爲當年台東的首富，他四處置產，財產快速累積，甚至還成爲日治時期的表揚對象，可見當時他對社會的貢獻，他不僅克勤克儉，有著傳統的客家人美德，對子女的管教和栽培也是不遺餘力。隨著小港的沒落，他的家道也逐漸衰落，從成廣澳廣恒發建築的斷垣殘壁中，隱約可以一窺當年的繁華榮景。眼見它樓起，也眼見它樓塌，昔日繁華隱沒於荒煙蔓草中，後代子孫也一一離開了小港，分居台東市和台北…等地。一個屏東內埔的客家人爲何獨具慧眼，先知卓見，來到台東成功小港，開設了東海岸最大的雜貨店，創造了事業奇蹟，隨著政權轉移，家道也逐漸沒落，最後終老時落葉歸根，回到屏東的故鄉。與成功小港的因緣短暫卻輝煌，在當時可能連自己也使料未及。溫泰坤先生一生克勤克儉，努力打拼，留給子孫最佳典範，他儼然是日治時期的另一個經營之神。

---

[31] 王良行主撰、王河盛、蕭明治撰修

《成功鎮志－政事篇》〈第七章 衛生行政 疾病防治 第二節 日治時期〉，(台東縣，成功鎮公所，2001)頁 164—166

[32] 郭明亮、葉俊林著，《一九三 0 的台灣》〈衛生醫療資源改善〉，(台北縣，博揚出版社，2004)頁 110—116

[33] 鈴木滿男，《日本人在台灣做了什麼》〈台灣印象〉，(台北市，前衛出版社，2002)頁 73—107

[34] 鈴木滿男，《日本人在台灣做了什麼》〈日語・英語・北京話・台灣話〉，(台北市，前衛出版社，2002)頁 111—151

第五章　柑仔山統領　宋番古先生

宋番古家族族譜

<table>
<tr><td>二十二世</td><td colspan="16"></td></tr>
<tr><td>二十三世</td><td colspan="2">慶星</td><td colspan="8">景星</td><td colspan="6"></td></tr>
<tr><td>二十四世</td><td colspan="12">添榮(原慶星三子因景星無出與弟海榮同承景星香火)</td><td colspan="2">海榮</td><td colspan="2"></td></tr>
<tr><td>二十五世</td><td colspan="16">貴華
(宋阿二)</td></tr>
<tr><td rowspan="2">二十六世</td><td colspan="13" rowspan="2">萬春(番古)
【出生】：明治二十四年十二月十八日
（西元 1891 民國前二十一年）
妻(宋徐氏閨金)、(羅氏儀　)
【逝世】民國六十二年農曆十月日
享年八十三歲</td><td>慕良(番妹)</td><td>萬龍
生民國前五年</td><td>安開(立群)</td></tr>
<tr><td colspan="3"></td></tr>
<tr><td rowspan="2">二十七世</td><td colspan="14">母妻(宋徐氏閨金)</td><td colspan="2">二母（羅氏儀　）</td></tr>
<tr><td colspan="2">肇源(長子)(亡)
5 10 12
妻宋氏鏄妹(亡)</td><td colspan="5">信源（三子）
14 12 29
妻宋林紅妹</td><td colspan="6">茂源（四子）
妻謝氏玉妹
19 11 28</td><td>濬源（五子）
22 7 11
妻黃氏桂蘭</td><td>德有（六子）屏東市
33 5 23
妻吳氏月秀</td><td>德福（七子）台中改
名明諺
38</td></tr>
<tr><td>二十八世（出生年）</td><td>興文
38</td><td>興明
42</td><td>興順
40</td><td>增添
44</td><td>達光
47</td><td>興昌
49</td><td>興忠
54</td><td>振光
45</td><td>劼光
46</td><td>來安
50</td><td>寿兼
54</td><td>日松
57</td><td>興家
65</td><td>彩文
57</td><td>文翔
60</td><td></td></tr>
</table>

二十九世	芳龍	宗憲	秉翰	璧光	政霖	岳霖	時榮	金樺 易霖	旺諺									
三十世																		

照片一：貴華家族照(宋正源提供)97.10.30 翻拍　　照片二　宋貴華(屏東古厝牆上翻拍）郭愛珍 97/10/30 翻拍

一、　原鄉----回到從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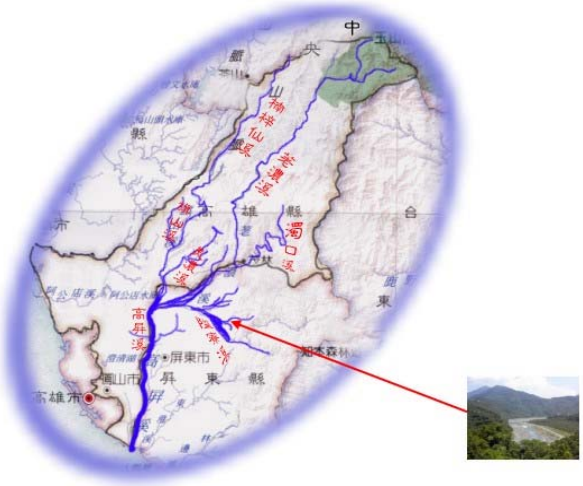
「樹高千丈，葉落歸根，根在原鄉」----是人稱“客家人”不變的循環與命運；目前分佈在世界各地的客家人近億人，尋根問祖，追流溯源，是千百年來 “客家人”一條永不停歇的流浪之路。

照片三：留著一綹美髯的宋番古先生。宋清源先生提供，郭愛珍翻拍 97/9/12

「客家人」又稱客人，在歷史文獻中，有許多形容這個堅強民族的文字，一般而言在明鄭時代之前，台灣南部就出現過客家人的蹤跡，目前散居在東台灣的客家人，來自不同的原鄉，也來自不同的時代，他們都背負著不同的理由，卻懷抱著相同的夢想，無非是爲了追求更好的生活。

對宋番古人稱「丫古」先生而言，給家人一個溫飽是他身爲第二十六世家族長兄及爲人父的信仰，也是種下他帶著家人再次步上“客家人”遷徒他鄉的宿命。

宋家始祖原居江西省吉安府盧陵縣，及至五世祖因兵亂而攜子避禍遷於梅縣白渡鄉居之，後宋家幾代遷移都不離廣東梅縣，一直到二十二世祖相福公於清乾隆年間由廣東省梅縣古田遷徒來台，開基南部，福蔭後代三世在屏東縣內埔鄉八壽埤拓殖力耕，晴耕雨讀、辛勤奠定在台基業，據後代子孫轉述當時來台祖所建的房子，有十廳九進是地方上的大戶，加上子孫勤賢，耕地日漸擴展，年有存糧是農家口中的富戶。世第二十五世因爲屏東山地門「隘寮溪」氾濫村落被洪水沖潰，房屋田產盡付諸流水，乃族人分散，各自營生，番古之父貴華公乃帶領家族遷徒至田寮落戶。「隘寮溪」，屬於高屏溪水系，爲荖濃溪的最大支流。主流河長 69 公里，流域面積 829 平方公里，分佈於屏東縣北部與臺東縣西側一小部分。主流上游爲隘寮北溪，其最遠源流爲額落烏溪，發源於高雄、屏東、臺東三縣交界附近之遙拜山西側，南流匯集巴巴那斑溪後，改稱巴油溪，隨後轉向西南流，匯集來布安溪後，始稱隘寮北溪。隨後轉南流匯集哈尤溪、喬國拉次溪等，再轉西北流，經上大武、下大武，至佳暮轉西南流，經華容、伊拉，於達來轉南流，匯集隘寮南溪後始稱隘寮溪。本流在此轉向西北，於三地門出屏東平原，續流經賽嘉、關福、南華、新南，於里港附近注入荖濃溪。隘寮溪的源流區位於屏東縣霧台鄉三地門，是台灣南部的多雨中心，年平均雨量高達 4500mm 以上。由於水量豐沛，泥沙量大，形成屏東平原上最大的沖積扇，也是最容易氾濫的溪流。



圖片一　隘寮溪

因爲氾濫，宋家幾代辛苦開墾的良田都被山上流下來的石頭覆蓋，沒有辦法耕作，所以只好離散，這個被土石吞沒的土地從日治時代一直到台灣光復，國家政府接收後，台糖的員工長期以來都得分批出來挑石整地才能一點一滴累積土地繼續耕作，現在屏東的體育公園一直到三地門當時都是那種地，後來將一部份土地依授田證授給榮民去整理，35民國 41 年 11 月 1 日，在國防部總政治部督導下成立「屏東大同合作農場」，將這些地都交給榮民去經營，民國 58 年 11 月 1 日正式定名爲「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

[35] www.geog.ntu.edu.tw/journal/article/G37-04.pdf 國家發展大計下的原住民移住聚落 屏東縣三和村拚湊的地區內涵　陳丁祥　蘇淑娟

導委員會屏東農場」。農場土地早期是一片荒蕪、巨石密佈、崎嶇不平、地形惡劣，經安置場員胼手胝足、不畏艱苦辛勤開墾，終至目前的阡陌縱橫良田千頃，榮民前輩方得以此農耕而食，貽養天年。宋家二十五世之前就是因隘寮溪氾濫，才舉家遷移到屏東田寮，目前還留在那邊的家族就「景華」那一房的後代。

遷至田寮後的宋氏家族第二十五世祖36貴華公有子四男四女：萬春(番古)、慕良(番妹)、萬龍、安開，在八壽埤水患後，以牛車一石一土、一步一腳印將八壽埤可用之石材運到屏東田寮重新建立基業，帶領子女秉持先祖力耕、勤讀、營商的傳統生活方式，齊心胼手胝足努力而擁有位於目前屏東商農附近的肥沃良田一、二十甲土地，民國二、三年間所興建的古厝到現在約九十幾年的歲月，目前產權由宋家第三房萬龍後代管理，紅牆黑瓦清淅可辨，可惜人事已非。

身爲長兄的宋萬春又名「番古」，因外貌黝黑而有「番古」小名，生於民國前二十一年，逝於民國六十二年農曆十月十五日，享年八十三歲，有弟三人妹四人，番古公幼時亦曾就讀私熟，及長則幫助家業，在屏東市開設化學肥料行，因個性溫和不善與人爭利，留在田裡做事的時間較長，番古的父親貴華公是個漢學儒者，影響所及其四子皆對詩、書頗有修爲，長子番古公除詩、書外易經及堪輿頗有研究也能自通，移居東部後常應用所學爲鄰里排憂解惑，尤以對藥草的認識與研究，在那個醫學不發達的農耕部落，頗有助益，在村里傳爲美談，番古公對小孩教養非常嚴格，是非道德觀念要求嚴謹，是家族的領袖，人格修養也是後世子孫的楷模，宋番古先生的樂善好施尤爲當地人所津津樂道，除了出借金錢與土地，據說當時在成功鎮鎮公所任職的公務員有一半以上都是客家人，每到中午，大伙就相約一起到柑仔山上的宋家吃午餐。宋家在山上除了種植水果之外，也有種植蔬菜、養些雞鴨，再加上當時溪流裡隨手可撈的魚蝦，每天的中餐都豐盛極了，也難怪會成爲當時客家鄉親最喜愛的聚餐處所。

宋家長孫興文回憶當時：

> 我丫公對詩、書、易經、人文地理都很有研究，尤其對藥草，認識很深，以前農耕社會西醫沒現在那麼發達，有些發燒小病痛什麼的，對隣里有點用處，但沒有在教別人，所學幾乎都應用在教養自己的孩子，當地人都說丫公修養很好、很熱心不和人家爭執，尤其非常好客，那時物質不寬裕的年代，家裡經常高朋滿座，家中媳婦經常被丫公從園裡召回家，殺雞宰鴨待客，我是常看著滿桌招待客人的美食，口水直流，但丫公對教養孩子很嚴格的，倫理道德、是非觀念非常嚴謹，所以縱然一口都沒吃到，也沒人敢犯上講半句話。

宋家六子德有是番古在晚年時一直同住陪伴在側的孩子，雖然番古過世已三十幾年，但對於父親慈詳、好客的個性印象深刻：

> 我和四個哥哥是同父異母，我的哥哥們都有我父親溫和慈詳的個性，對我和弟弟非常的照顧，我出生時我父親已經五十幾歲了，我父親的教育方式都是以口頭告誡，在那個年代，在地方上算是很特別的，印象很深刻的一件事是：那時有一個

[36] 宋氏二十二世祖家譜簡編---由宋氏第二十七世孫宋正源編製

很潦倒的閩南人大概三、四十歲，和我們不相識，想要到我們家找工作，因為家裡已經有兩個長工了，不缺人手，那個人很失望的就要下山去，當時已黃昏，我父親就留他下來，吩咐大嫂殺雞，並留他過一夜，天亮了再讓他下山，看到父親對一個陌生人都可以如此大方款待，更何況對自己的親人，給我們子女留下很好的風範，所以兄弟未分家時努力合作，就是分家產後，大家還是住在三和院裡常常一起吃飯聊天，就是大哥肇源，也是每天回家面見父親請安共用晚餐後再回自己的家，因為人口陸續增加，所以才各自建了房子搬出去。分家產後，因為大家田地相互交錯，所以，兄弟們都會在自己的土地為其他的兄弟開路，以方便兄弟們耕作、運貨時通行，父親對人慷概熱情的個性是留給我們子女最大的財富。

決定東移時宋家長子番古公當時年已四十四歲，原本是個擁有良田一、二十甲的殷實農家，因兄弟生意經營不善，家產消耗逮盡生活不易，遂種下舉家東移他鄉，再起基業的因緣，然而不斷與陌生環境奮戰的客家習性，讓宋家子弟秉持客家不畏艱難，勤儉進取的精神，在貧瘠的的新港土地上努力扎根、再起宏業。

二子慕良(又名番妹)，外型俊秀，皮膚白析，遂有「番妹」的暱稱，個性非常活躍，頗善交際，家中經營的碾米廠、飼料行，皆交其管理經營，民國十二年家族長輩（宋安邦）至台東開發商業，番妹數年後也前往與堂弟子鰲共同經營廣南製糖公司，時值宋家四子安開日本回台，後受聘遠赴廣東當通譯，番妹也隨之前往投資石鹼工廠，不料不善經營，短短一、二十年家中田產相繼易主，台灣光復後番妹回到台灣，當時番古一家在新港的事業漸漸穩固，又值日本戰敗，日產召標權利轉移，隧邀番妹舉家東遷並允其在原日本人經營的「杉原株式會社」擔任隊長，兄弟合力共同經營柑橘園，後改名爲「富榮農場」，家族合作奮力擴展，因耕種有方，日本所開發的柑橘新叢，經番古父子投擲百倍心力與技術，成爲全省模範柑桔園，在那個時代很是轟動一時，也曾多次得到政府的褒揚。

照片四 萬龍小女兒宋淑琴，郭愛珍拍攝 97/10/30

三子萬龍生於民國前五年，才猷卓特器識宏通，是個非常有才情的人，高雄中學第二屆畢業，也曾遠赴日本就讀醫科大學，當時四弟安開也在日本求學，然因家道中落，家中無力負擔龐大的學費及生活費，兄弟二人只好返台就職，萬龍天資異秉，可惜天不假年，英年早逝，民國二十八年去世，得年三十四歲。

萬龍育有二男一女，均學有所成。承繼之宋家田產古厝座落於屏東縣屏東市林森路22號(照片)，走訪宋家古厝的建築，房子四周雜草叢生，顯露出年久失修的蒼桑，尚可清楚分辨黑瓦紅牆的屋子，佇立在在四周五樓舊式公寓建築中，

照片五　宋家古厝三合院，郭愛珍拍攝 97/10/30

在這一整排的舊式建築外圍還有更高更新的高樓圍住，看起來有如新式樂高積木圍著一顆舊式佗儸般的突兀與不協調；據訪談住在公寓建築的居民表示，她已搬進這排公寓住了三十幾年了，而且公寓當時已是二十幾年的老屋了；依時間推算，民國二十六年番古舉家東遷時，這幢房子還只是二十幾年的屋齡，由三房萬龍承繼後沒幾年過世，孤兒寡母守著這一間大宅院到現在，實屬不易。

宋番古東移之前，這座三合院是宋家生命繁衍與家族成員相互依存的地方，依時間來推算宋家的這座三合院約建於民國一、二年屋齡應有九十歲以上了，房舍平面呈現「ㄇ」字型，坐西南朝東北，是典型的客家三合院建築，正面是三間「正身」中間爲祖堂，兩側各有一間是房間仔，左右二邊有「護龍」，（護龍在北方稱爲廂房，在南方則稱爲橫屋），宋家四兄弟與姐妹，加上老大番古已成家立室，兒女成群，在家中人口愈來愈多時，則會增加「護龍」以解決住的問題，據研究六堆地區的三合院，正屋的配置均以三開間爲基礎，一般均爲長輩之居室，另外在正屋的左右邊兩邊，緊鄰著正屋，各以三開間爲一基礎，建成許多的橫屋，且橫屋如地勢許可容許無限延伸發展，有時可達三、四十公尺，而橫屋的屋頂在建築設計上往往會較正屋稍低，但爲了避免橫屋太長在尾部太低不適合住，在每三開間組合中，建築師又將尾間的屋頂拉高，使房屋的室內空間不致於相差太多，在以前能夠建三合院，算是經濟能力較好的人家，目前的宋家祖產就只剩下這一座無人住的三合院，雖然整體環境看有些蒼桑，但廣大的禾埕成爲附近居民的免費停車場，在人車擁擠的都市，也算是一種受歡迎的敦親陸鄰之方式。

萬龍過世時其小女兒才六個月，妻子二十七歲，當時分家產時，三媳因較不善農事，於台灣光復後服務於台糖，在所剩無幾的家產中表示希望能分得古厝及附近土地，守著這份家產養兒育女，其小女兒淑琴回憶與母親相依爲命的日子：

照片六　屏東宋家三合院，郭愛珍拍攝 97/10/30

照片七　屏東宋家古厝一角，郭愛珍拍攝 97/10/30

我爸爸過世我才六個月,我媽二十七歲就守寡，那時我們家分到的家產就是林森路 22 號的這幢古厝，和附近幾分地，我們原是住在內埔鄉八寿埤，因為水患搬到這裡，聽媽媽講，丫公每天天未亮就架著牛車，將淹水土地上的石頭，一趟一趟的以牛車搬到這個地方來自己蓋房子，以前這個地方都是我們宋家的田，這裡都是田，沒有幾間房子(目前林森路 24 號)，我們古厝是 22 號，到正源家是 24 號，這中間以前都沒有房子，這些門號是 22 之幾或 24 之幾的都是後來陸續蓋的的房子，我們丫公非常辛勞，種田買地，從屏商、自來水廠、水源地一直到田寮巷、豐田里，一整片都是我們宋家的，有一些被政府徵收了，當時邱家是這裡的首富，再來就是我們宋家。

母親說那時開碾米廠時是宋家最富有的時候，因為家中經商，家中子弟常有幫親友擔保，之後就一直賣地陪錢，家裡的櫃子一打開來都是記帳的帳薄，藍布外皮就像古代的帳冊，很多很多，每次都要搬來搬去的很麻煩，我就問我媽媽為什麼不丟掉呢？我媽說，這是我們宋家的帳冊，如果你有辦法去要回來，三代都吃不完，這也是宋家的古董，不能丟。

為什麼會知道呢？因為以前日治時代，日本人禁止台灣人拜拜，所以我們都把家裡的祖先的牌位藏在抽屜裡，上面用帳簿一層層的蓋起來，到了黃昏時候，日本警察不會再來檢查了，再將祖先請出來拜一拜，拜完之後趕快再收回去，(正源插嘴說，那麼多兄弟都沒人聽過這件事)，因為我們家是分到這個古厝的產業，那時我媽守寡，我大哥七歲，二哥是二歲，我才六個月，我媽一個人和我們守著那麼大一間房子，小學時，我是負責掃大廳，我都很細心掃，地方又大，掃著掃著我每個抽屜、每一樣東西都拿起來看看再放回去，我媽還問說，掃個地怎麼掃那麼久，因為我一面掃一面玩那些東西，

裡面很多的帳冊和照片，以前常要搬出來晒太陽，因為都有白蟻，以後房子就交給二哥管理，二哥搬到美國後房子一直都鎖著，我結婚後還有搬回來三合院住過，那時候還曾將一些帳冊和照片搬出來晒太陽，交給我二哥之後就沒有再進去了,這幢房子約民國一年或二年建的,外表的磚頭是原來的建材，沒有改建過，裡面有可能有改一些吧，我知道裡面有很多櫃子，東西很多，現在不知道還在不在了。

照片八 古厝內樑柱彩色彫花非常精緻，郭愛珍拍攝 97/10/30

萬龍小女兒，自教職退休後依然住在原來祖地上，只是這塊地與房子是淑琴先生買了送給淑琴當嫁妝的，當淑琴帶著正源和研究者進入塵封已久的古厝時，正源和淑琴表情相當肅穆，尤其是宋正源，雖然家就在附近(24號)，但古厝產權自兄弟分家成爲三房的權利後，不知多久沒進去過了，當大門打開時，大家一陣驚愕，環視一周後，隨之而來的嘆息，讓我一個外人都可感受到他們內心有多大的不捨，尤其宋淑琴看到兒時經常翻閱的大櫃子抽屜，因爲白蟻蛀蝕腐朽到無法開啓時，一行人都大嘆可惜丫！

照片九 屋內的棟對，郭愛珍拍攝 97/10/30

客家三合院通常是利用空間與多層次的設計來呈現客家人之家庭倫理親密關係，宋家古厝正廳不寬，正身中間的「廳下」，是祖先牌位或供奉神明的場所，兩側

懸掛著貴華公和其夫人邱氏的畫像，在南部客家建築會出現了棟梁底下的「棟對」，這在南部客家建築裡非常興盛。「棟對」分成上、下兩聯，各聯長約二十餘字，書寫在正廳（廳下）兩側的牆面上，內容多爲祖先移民遷徙的過程，也有書寫忠、孝、義等祖訓的詞句，主要目的是提醒後世子孫不要背祖、忘祖，在宋氏古厝的正廳牆壁兩側就各懸掛著祖屋楹聯，兩塊油亮長黑木由屋樑垂至人的腰際，各刻上「棟宇喜維新從前風雨綢繆乃寢乃興安敢謂翬飛鳥革」、「箕裘思克紹祇此竹松苞茂爰居爰處應毋忘祖德宗功」。「正廳」是家族聚會、祭祖之場地，正身的左側間，則由最年長、輩份最高的長輩居住。

照片十　三合院大門上【京兆堂】三字，郭愛珍拍攝 97/10/30

這樣的建築具體展現了客家人的淵源關係，三合院大門門框上方寫上【京兆堂】的堂號，用以標誌家族與宗族遷徙的淵源。三合院所圍成的「禾埕」，是整個家庭休閒中心，農忙時則可以用來曝晒稻穀或農產品。尤其是擁大片農耕土地的宋家，內外禾埕象徵著整個家庭的團結和諧與生活的富裕，想像禾埕金黃稻穀澄澄、小兒嘩然嬉戲、婦女添材烹煮、炊煙裊裊；歲終時節長輩在廳下祭祀完畢，灑酒於庭、祖德綿長，總總熱鬧景像，如今只留埕前雜草及膝、積水成澇，讓人頗有蒼海桑田之嘆。

照片十一 古厝埕前雜草及膝積水成澇，郭愛珍拍攝 97/10/30

四子安開又名「立群」育有五子，早年遊學日本，進入日本京都立命館中學就讀，因資質優異，貴華公傾力栽培，在家道中落後返台，奉職於麟洛青果株式會社，後世子孫承襲父志，在學界商界皆有成就。

安開三子宋正源對於家族莫落感觸最深，他是目前唯一還居住在父親當時起造的日式房子裡的孩子，這幢由父親和日本同事合蓋的房子已七十二年了，整條林森路新式店面林立，一直到24號進入眼簾大大的一扇紅色鐵門特別引人注意，往裡一看一大片的庭院後是一幢老舊的日式建築，因爲建材都是木頭，本易吸水營生白蟻蛀蝕，又因年久失修加上後來又經過一次風災，整幢建築搖搖欲墜，家中珍貴資料在稍疏失間就這樣被白蟻蛀蝕殆盡，所以讓正源興起修葺家譜的念頭，旨在奉始祖宣德澤，昭垂後代子孫尊祖敬宗之道，正源因爲編寫族譜的需要，訪求遺地故老、奔走各家親族而將族中親人再度牽繫起聯絡的橋樑，更因此讓正源獲取更多失傳的親族故事：

祖父（貴華公）移來屏東時經濟不錯，有四男四女，大伯父（番古）是最大和我父親安開相差了二十幾歲，等於大哥要賺錢供弟弟讀書，所以大伯父(番古)只進私熟認字而已，而我父親安開是八個孩子中的老么，最得祖父母的疼愛，因此能受到較好的教育和照顧，聽母親說，那時候兄弟都要工作，就連當時才一年級的信源（番古三子）丫伯也有很重的工作，可是我爸爸會被丫媽帶到園裡去讀書，不大做田裡的事，慢慢的不知怎的開始賣田產，地賣得差不多了，到了兄弟分家產時，當時老大和老二這兩個伯父是怎麼分的不是很清楚，那時有輾米廠和肥料店，都已經變賣了，就大伯父得了三分多地，當時難以生活，決定移墾東部需要資金就將地質壓給堂兄弟宋來秀,那剩下我們這二房，三伯母在台糖廠工作,因為是文人較不善耕作，就要求只要房屋(三合院)三百多坪的厝地給她就好,而我們四房則分得現在居住房子的田產,我父親是日本留學回來的，當過日据時代的翻譯官，後來在三十歲左右應徵到廣東當通譯官，番妹去廣東做生意，那是我父親在廣東而跟著去那邊做生意，當時在廣州投資開石鹼肥皂工廠，我父親有一次回來要我母親賣地，我母親不肯，父親就說:「你一個女人能耕多少田，賣掉地讓我到外面賺錢較快！」,後來才知道賣掉田地的錢是給二伯父(番妹)帶到廣東做生意，日本戰敗後就跟著賠光了，就只留下現在住的這塊地，現在這幢日式房子,是在日治時代，我父親在麟洛青果株式會社工作，父親的日本同事沒房子要蓋房子，我父親(安開)提供土地就蓋了兩間，一家一間，就是現在我(宋正源)住的這幢日式房子，已有七十二年的屋齡了，三十幾年前賽洛馬颱風把屋頂括掉了,就那次之後房子不容易再整修，又捨不得拆掉，因為太有紀念性了，就進到現在，可是年代太久，白蟻太多，一時沒注意，一些父親就學時的成績單,證書之類資料和珍貴照片都被白蟻吃光了，很可惜，想了就很難過。

照片十二 宋正源與妻子看著家族照片跌進深深的回憶中 郭愛珍拍攝 97/10/30

祖厝以前的地名是高雄州屏東市旭町八十五番地，更早的名稱是長興庄，日本佔領後改名爲旭町，之後又編入豐田里，到國民政府接收台灣後又改爲現在的林森路，對於宋家龐大家產，短短一、二十年消失殆盡，家族堂兄弟都不甚噓唏；番古三子信源憶起屏東若大家業，水源地的一、二十甲良田，到了最後番古公只分得三分薄田，又因生活不易而離開家族遷移東部有著滿腔的無奈，他表示在四兄弟中番古是唯一以農爲業，雖然亦曾就讀私熟，但一直以來，田地是他的事業，也是番古先生賴以養家活口的經濟命脈，加上成家後小孩陸續出生，食指耗繁且生產力不足，人口的壓力和漸貧的生活，最後逼得己值中年（四十四歲）的番古先生決定冒險東移，尋找新的希望。（訪談）

番古先生三子信源回憶當時：

「那時我聽我爸爸說他們家兄弟有一、二十甲地吔, 一、二十甲屏東水源地的田，但是因為栽培我丫叔讀書，我二個丫叔很會讀書很有才情，家裡一直栽培讀到中學，還到日本留學，三叔是讀高雄中學畢業，那個年代讀書是真花錢的，所以家裡花了很多錢，還有我那個最大的丫叔（番妹）開碾米廠、飼料店、又去日本、廣東做生意，可能是不善經營賠了很多錢，也可能是時機不對，整個家族田產散盡，兄弟不另外想辦法是無法過日子了。所以在屏東幾代積累的龐大產業，就在我爸爸那一代就都沒有了，他們兄弟中我爸爸是作農，但是也只分得三分地，那個時候，我們這些小孩子一個個出生，六個兒子三個女兒，生活真艱難，在我記憶中在我一到三年級留在田寮的這段時間，每一天得幫著母親汲井水……哇，從井底拉起的一桶水對一個一年級小孩子來講是多重丫，沃菜、切豬菜、拔草、每天除了上學，跟著母親總有做不完的事……。」

談到母親，不免想到在客家的文學作品中以「客家婦女」爲論題的作品不少，最常被拿來研究與討論的是客家婦女在家庭中的地位及其所承擔的勞動量，終年勞動很少休息幾乎是與客家婦女的特質劃上等號，所以客家人對妻子有著異於別族的稱呼-----「輔娘」，這樣的稱呼不若閩南人稱妻子爲「牽手」有著較多的情意與浪漫，從其歷史背景來看，客家婦女在族群輾轉遷移的環境下，丈夫必需不斷的向外探求發展的機會，而婦女則必需挑起家庭生計及承擔所有的生產勞動，在宋番古決定東移發展的同時，宋家長媳宋徐潤金擔起家裡炊爨、縫紉、畜牧、耕耘、樵採……無所不爲的重擔，有一首形容客家婦女辛勤工作的歌謠叫＜客家姑娘＞[37]：

勤儉姑娘, 鷄啼巷(起)床, 梳頭洗面, 先烝茶湯, 造頭鍋尾, 洗擦光光, 煮了半朝(日飯), 快洗衣裳, 急急忙忙, 養豬種菜, 熬粥煮漿, 紡紗織布, 唔離開房, 針頭線尾, 收拾櫃箱, 唔講是非, 不敢荒唐, 受惜子女如似肝腸，礱穀舂米沒穀沒糖，人客來到，輕聲細講，歡歡喜喜，拉扯家常。雞卵鴨卵，豆豉酸薑，有米有麥，細算算用糧，粗茶淡飯，……

這首民謠充份反映了客家婦女勤勞儉樸的品格個性，有如番古之妻---宋家長媳終年勞苦，沒有一日休息，憶起因過度辛勞早逝的母親，讓三位七十多歲的信源兄弟一

[37] ＜客家源流探奧＞房學嘉著　　武陵出版　１９９６年2月 P311

陣深沉的靜默，提起慈母爲家庭所付出的一切，不禁紅了眼眶；客家婦女刻苦、耐勞的美德讓許多中外客家學研究者讚譽有加，這樣的美譽直接反應在宋家長媳(番古夫人)身上，信源印象中的媽媽，手中永遠有做不完的工作，不管粗細，幾乎一肩挑起，真的想不起來被媽媽擁抱是什麼樣的滋味：

信源回憶小時候：

照片十三番古妻宋徐閏金，郭愛珍翻拍 97/9/21(宋濬源提供)

聽阮丫兄（肇源）講，在我還沒出生時，因爲我媽媽是大媳婦，除了煮全家的三餐飯、洗一大家子的衣服，還要兼顧養豬、養雞鴨和做田裡的工作，每碰到播種秧苗或收割，除了顧家裡三餐外還要趕回家煮工人的點心再挑到田裡，最辛苦的是，那時我兩個丫叔在讀書，三叔是讀高雄中學，小叔到日本留學，我媽媽爲了讓三叔能趕上搭第一班車到高雄讀書，從我家林森路走路到車站得一個多鐘頭,所以得一大早三點起床做飯，要不然我丫嬤會很生氣。

後來我們幾個小孩都出生了，我丫叔他們娶妻了後，有的搬出去做生意, 小叔日本回來也是出外吃頭路，家中田地還是我媽媽在做，我媽媽是家族長媳，教養孩子非常嚴格，工作非常負責，所以總是天未亮一直做到天黑看不到了，才回家做厝內的工作，一生非常的勞累，一人兼顧內外，一天睡不到三個鐘頭。所以……四十幾歲就死了，太操勞了……

深沉的氣氛讓訪談者的我有點不知所措，採錄的工作也暫時停頓，爲想化解沉重的氣氛，我忽然迸出一句：「你記不記得媽媽那一年代的女人都用什麼樣的保養品？」

三位老人忽地抬起頭：「什麼保養品？」，經過我的解釋，信源大致描述了一下番古夫人的穿著與打扮，話中對家中的女人有著深深的愛憐與不捨：

我媽媽總共有四個兒子三個女兒，在七個孩子中，大姐勤妹排行老大，老三鳳妹和老五景妹，她們一生很坎坷、辛苦，兩個姐姐都沒讀書，當時家裡不算窮，我丫嬤就是不肯給女孩子讀書，我丫叔都栽培去讀中學，一個還去日本留學，女孩子都要留在家裡做事，才十二、三歲的年紀，印象中很少在家裡幫媽媽的忙，都是

被派去和別人家「換工」38，就是閩南人講的「放伴做」，屏東在當時是農業社會的農業地區，因為每個人耕地大小不一，自家人一定做不了,所以大家分散做，你今天幫我播種幾天，等你要播種缺人手時,我就　回幫你幾天，若天數不合時再算穀物或工錢，要知道去別人家做事不比在自己家，要隨人差 遣，到天晚才回到家裡，黑天暗地，要打扮給誰看？印像中不是藍色就是黑色的布衫仔褲，梳包頭，有時連鞋都沒穿列，那有可能保養皮膚？我家的查某人都勞碌，因為沒讀書嫁人後也是在田裡操勞，所以我們家二個姐姐一個妹妹早早就死了，都很操勞。。

那時我們家算是大家口中的富戶，有田有地，子孫又很勤奮，記得在內埔老家二叔常和我 們聊天，說到當時的有錢人的定義是只要你家中有存糧，當家中婦人說沒錢買物品了，可以隨時擔著穀糧去販賣換錢過日子就是有錢人，也就是家有餘糧的意思，但家中女人不會因為有存糧而免去勞務，相反的家大業大更操勞。

「家裡土地越多，婦女越辛苦」，這是信源兄弟談到母親後所下的結論，1892 年出生的番古夫人宋徐閏金，自 1911 年（民國元年）底嫁入宋家，民國三年即生下長女勤妹，一直到民國二十一年最小的兒子濬源出生，除了早夭的一男一女，在黃金的十八年中共生了九個孩子，九個懷胎十月的歲月，耕田力役、生養輔育從無間斷，以至後來到新港麒仔麟與丈夫會合時，身體已經很孱弱，無力擔起家中的重擔，不到兩年就過世了。

在屏東「田寮」還是一大家子住一起的日子，媳婦永遠是家中的勞動者，這是所有接受訪談者共同的心聲，尤以宋家四子安開的三子正源感觸最深，民國二十五年出生的正源，一歲開始就目送著親族一一散去，懞懞憧憧的他，就是覺得家裡越來越寬大，人越來越少，到三伯萬龍去世，剩下一幢三合院和附近的幾塊田地，也再一次的分割後，宋家二十六世的四個兒子自此各分西東，士農工商各展所長，老大「番古」與後代子孫重新在東部發跡，攜手共建「柑仔山王國」，目前由四個兒子及孫輩守著柑仔山。

二子「番妹」是大哥「番古」眼中最有生意頭腦的弟弟，雖然最後在台東打拼的田地賣光了，但其子女都承襲了父親聰慧、靈活的優質基因，在學、商界頗有成就。

三子萬龍和四子安開自小雖較少農耕，但功讀詩書，後代子孫學有專長在學術界皆有貢獻，特別的是正源與阿庚之後重康致力於族譜的編制，所以有好長一段時間往來於親族之間，因此也從中獲得一些親族間有趣的故事，當研究者轉述由信源處採錄有關番古夫人在長治老家辛苦的點滴時，正源說：不只這樣丫，我聽我媽媽在講大伯母，很可憐的：

提到大伯父家，有很多故事，大部份都是我媽媽講給我聽的，我兩個伯母都是麟洛人，我大伯母會那麼早過世，是做死的，小時候我母親常和我這麼講。

我母親是最小的媳婦，我祖父大概在快五十歲就不管事了，在家享福，那時候每天手裡拿著一本章回小說，時時在躺椅躺著看，不管祖母如何罵就是不理她，我祖母是很能幹又很嚴勵的人,所以家裡那些媳婦就有做不完的事。

---

[38]客家人在農忙時，家裡人手不夠的時候，不「請」工人，而去找左鄰右舍來「幫工」,「幫工」也叫「換工」乃基於客家人傳統的平等精神（《客家人尋根》雨青，1998：ｐ240）。

那時家中有大伯母和二伯母，二伯母很會女紅，長得白淨、嘴巴又甜，所以較得祖母疼愛，而大伯母不大講話，所以每天有做不完的事，我母親進門後常看她晚上十一、二點了還在那裡一面打瞌睡一面切豬菜，每天為了三伯父（萬龍）要搭火車到高雄上學，大伯母三、四點就得把飯菜煮好，否則連三伯父都會追著要打；日治時代三伯父都穿長統靴，一回家三伯父把腳一伸出去，他的那些侄兒（番古的小孩）就得趕快幫他脫鞋，更有趣的是三伯父很用功,每天讀書讀到三更半夜，肇源那時才七、八歲，要陪著三伯父睡，負責五點之前要叫醒三伯父，假如睡過頭了，那肇源就完蛋了！

說完後，正源特別加一句，後面那一段可是大堂哥肇源自己說給我聽的，每年老家(屏東)清明掃墓時，正源口中的大堂哥（肇源）都一定會參與家族祭拜，每一次家族聚會，大家興緻最高的就是聽肇源敘述過去生活的點點滴滴；民國五年出生的肇源，享年九十一歲，生命中經歷過日治與民國，離鄉背井由平原向深山流徒，背負興家旺族的使命，多麼沉重的年代丫，猛一回頭，那條成長之路，點點滴滴都是他們爲成長所付出的辛酸血淚。

提到祖母與家中媳婦的互動關係，正源繼續說著：

我祖母是住在長治當時抗日很有名的火燒庄，在長治麟洛這個地方，姓邱和姓許是大戶人家，雖然祖母也姓邱但家裡很窮，祖母很能幹，也很嚴厲，她有那麼多的小孩、媳婦，但她還是每天天未亮就去園裡摘芭樂、木瓜、菜挑去街上賣，她最看不慣沒事做的人，大伯母他們要遷移台東時是從高雄港塔船繞過台灣尾去台東，我祖母因為會暈船，航程實在太遠了，一路上吃盡苦頭，所以回來之後就拿石頭壓路，發下重誓說死也不再去, 我祖母過世之後, 可能大家都沒講好, 結果我大伯父（番古）將祖母的骨灰請到台東去埋葬祭祠，之後有好長一段時間，台東大伯父一家就有一些不平安的事陸續發生，大家就懷疑是不是這個原因，那時大姐勤妹生的孩子, 在七八歲時就忽然間發燒，之後語言能力

受損，後來我父親與親族在屏東這裡興建宋氏墓園，我伯父過世以後，因為三伯和我祖父合葬，我祖父是葬在這裡，後來我父親就說父母怎麼可以分開葬，在民國七十一年才將大伯父和祖母的骨灰都搬回來這裡葬，目前屏東墓園葬有來台祖、景星、貴華、安邦、這三個家族，我們這一代在這個墓園都有安排位置了。

正源從一接受研究者採訪就一直表示，應該早幾年來做這一份研究，若能在番古長子肇源未過世之前採錄，相信可以留下的資料史實更豐富更有紀念價值，但想想亡羊補牢就從現在開始做吧，總比任它流失要好多了。

照片十四 貴華妻在古厝，郭愛珍於古厝牆上翻拍 97/10/30

二、 遷徙----從屏東到新港

客家諺語有所謂「逢山必有客，無客不住山」。決定移居台東的番古公，以三分薄田質壓給堂兄弟宋來秀一仟元後，獨自一人先行到新港山區開墾荒地，麒仔麟山是其建立基業的地方，位於現在的忠仁里，山區土質多爲沙與礫石，未經開墾的麒麟山放眼望去一片荒蕪，早期研究客家歷史者，認爲客家人來台的時間點比閩南人晚，因此肥沃的平原地區爲閩南人所佔，客家人只好避居山區。爲什麼台灣客家人的聚落，除了屏東平原外，多屬靠山的貧瘠之區呢？是客家人習性就與山區親近，還是當時丘陵山區己是最好的選擇？1937 年番古公東移新港時，漁港己完成初步建設，＜成功鎮誌＞記載：1932 年完成初期的漁港工程，泊船面積 54545 平方公尺，漁港可停泊 40 艘 40 馬力的發動機船，築港以後，新港成爲東海岸最重要的港口[39]，尤其在番古先生（1937 年）移居新港之前，新港不斷的續建各種相關設施，因爲貿易數量的增加，所以繼續進行漁港擴建工程，決定東移新港的番古公，是什麼因緣摒棄如此蓬勃發展的新興海業，反而選擇貧脊的丘陵地----麒麟山落腳。

三子信源口述：

> 「我們來這裡時的新港，漁業大部份是福佬人和日本人在做，阮家族三代都是從事農業，我們家這一代除了德有和德福他們兩個人讀書較多，在外地讀書之後，事業就不在土地上了；我爸爸遷居來台東以前就是種田的，雖然我丫叔（番妹），他先來成功己經有事業，是在做生意，新港當時的海產業也是很好很發達，但是都是日本人和河洛人在掌權當頭，阮客家較少也較不習慣討海的生活，光暈船就袂吃了，怎麼做工作丫！當時我爸爸來不是來這（三民里），是麒仔麟，麒麟山那裡先種水果、種菜、種蕃薯，到台灣光復以後才移來這裡（柑仔山）。

[39] 成功鎮誌地理篇 p 221

信源口中的麒麟山是位於新港漁港南側的海岸，包括三個部分：位於海岸的麒麟、位置稍南的麒麟(南麒麟)及西側海階上方的上騏麟。「麒麟」爲阿美語 ciliksiz(或 ciliksay)的近音譯字，爲「蚊子很多」、或「蚊子咬」之意。由於麒麟附近，竹林茂密，蚊子容易滋生，故稱之。近來因爲巨石文化遺址而聞名。

三子信源描述決定遷移新港的過程：

> 我聽我爸爸在講，當時最大的丫叔（宋慕良）從台東回來屏東和我爸爸說：「怕沒地！整片山隨你去墾拓！」，後來我爸爸跟來看，看地不錯也有希望再興家業，就來了！主要是這裡有兄弟，可以互相照顧。

照片十五 宋信源，郭愛珍拍攝 97/9/21

1929 的台東新港漁港開始興建，至 1932 年始完成初期的漁港工程，自此新港成爲東海岸最重要的港口，隨著新港漁港的完成，貨船每月自北南來，自南返北海運相當發達，新港遂成爲漢人從商或農墾的據點，宋家老大「番古」公和許多來到後山拓荒的移民一樣，帶著希望翻山越嶺而來，迫於生活上的種種無奈，宋家東移墾拓時已是日治時代的後期，移墾時間較晚，無可選擇的只能在土地較爲貧瘠的山區，當時的成功鎮在日本官方殖產政策的引導下，日本人及漢人相繼移入成功鎮境內[40]，阿美族一直是境內最主要的族群，當客家人進入原住民部落之後，常因土地墾地不足與族群衝突而必須再度遷移，據番古五子宋濬源描述當時在麒麟山墾殖時的情形：

> 當時我還很小，大概六、七歲，就聽父兄說地要勤一點開墾，開墾了再申請，那時還小，發現有時這裡開開整整，種種咧，種一次沒什麼收穫就又移地再種，有時也不知是何原因，墾好了地又換，最後移到較平的地方才留下來。

跟據雨青《客家人尋根》，1998：208）研究：客家人在過去移墾時期，常自成一個部落，這種部落初期可能是同族部落，如果同族的人數不多，則又招集一些同鄉來組成一個部落，同族聚居是血緣性的團結，籍貫相同者的聚居，則是地緣性的團結。客家聚落則往往含有這兩種性質。由宋家長孫宋興文的補充可以得到這樣的印證：

> 客家人生性較小心，長期的逃難與遷移內心存有很深沉的不確定感，時常感受到危險，怕會被出賣或被陷害，尤其是一整個大家族的遷移，為確實保護家人不要

[40] 成功鎮誌地理篇　第十章人口 p 171

陷入險境，會做一些防護，第一道防護就是進入較荒闢的山區，就像我們家族，在新港已經有堂叔公（宋安邦）、叔公(宋慕良)在這裡營商，但因為行業不同，再來我們到台東較晚，沒有安全感，很自然的往山上跑，依靠比較可靠的土地，你看，我們這個聚落很奇怪，我們這個山上(柑仔山---富榮農場)都是客家人，但都不是同一個時間來到這裡，但大家就是可以找到同族定下來，每一戶來的時間都不一樣，只要有客家人來到新港，就會聚到這個山區。

這樣的描述印證了客家人普遍喜居住在山區靠水之處及群聚的習性，已值壯年的番古， 毅然留下妻兒在屏東等待，就此東移落戶新港，爲家人尋找另一個春天。番古三子信源口述：

「我爸爸頭先是他一個人先來，我丫叔帶他來，那時我丫叔（番妹）已經來成功在做生意，那時新港在建的時候他就來了，我爸爸在民國 26 年時才來到成功，最先在麒仔麟山開山種水果和種菜。

「我老爸在屏東有三分地，那時候孩子又多，心想來後山開墾打拚較快，又聽我丫叔回去屏東時在講，新港這裡的山都隨便人去開墾，隨便人家要種什麼，我爸爸就拿那三分地和親戚借了一仟元，要來新港這裡開墾，當時我才三年級，那時的孩子憨憨，大人說去那裡就去那裡，父母是不是經過討論，也沒有什麼印象，後來長大後才知道我爸爸是借了一仟元先來這裡開發，兩年以後，在這裡有了屋子和土地了，才回去帶我母親和弟妹們來。」

「我家遷居來台東當時分三批，我爸爸是第一批，他一人跟著我丫叔(番妹)先來，在麒仔麟落腳，麒麟山那裡是我家的開發基地，一直到台灣光復了後才搬來這裡(柑仔山)，我小弟和我媽媽和大姐算是第二批，當時我（信源）已經十一歲了，在屏東就讀四年級和五年級，那時我大哥在一間官鹽館當店員，月薪 25 元算很高的薪水，養我們全家，我跟著大哥在枋寮讀二年書，後來我和我大哥是第三批來台東。」

日治時代的成功鎮隨著產業發展及新港漁港的完成，海運相對漸漸發達，一般乘客及貨物搬運也更加的便利，雖然當時台東港並無任何港灣設備，只有在近岸處設有投錨地點，但會因季風、颱風海面的波浪太大而而使船隻無法上岸，獨獨新港爲自然港灣加以修築的港口，全年通航無阻，當時（1932 年）4 月之後，沿東海岸線的船隻有宇佐丸（819 噸）、大分丸(711 噸)、宮古丸(973 噸)三艘，但僅有宮古丸一艘每月於每月由基隆南航高雄途中的 2、12、22 日寄港於新港，再由高雄沿東海岸往北返回基隆途中的 6、16、26 日，停靠的次數有時會另外調整，或者因風浪太大的關係而減少，於 1938 年後定期船則增加航次改爲一個月南航二回、北航四回[41]，那一年宋肇源已二十歲帶著年僅十一歲的大弟信源搭上「宮古丸號」，跟隨父母的腳步也踏上移墾之路。

[41] 成功鎮誌地理篇第十一章交通 p225

信源回憶與大哥搭船到台東的經過：

「哇!船很大大概有上千噸，那時候來台東都是搭船，繞著台灣尾到台東，我一家包括我爸爸來台東都是搭船，從高雄中午後開，差不多（記不太清楚了）在隔天的天亮到台東，還要等船下貨，等很久才又開船，來到新港因為船大隻無法度入港，要坐舢舨上岸，在船上大部份的人都暈船暈得很嚴重，還好我不會，大家不吃的我都全吃光光，那時還是囝仔，感覺還滿好玩的。」

番古公所落腳的麒麟山，位置是現在的忠仁里內，山高 1554 公尺，和成廣澳山、分水崙山、白守蓮山、新港山、加只來山構成海岸山脈地勢最高的山地地形區，也是成功鎮各河流的發源地，番古公帶領著兒女同心協力，胼手胝足在山區開墾，種植芭樂、檸檬、木瓜、柚子等水果，庭前屋後掘菜股種蕃薯、擔肥沃菜，再徒步以人力挑下山賣給水果販及人家，以賺取生活費用。

信源帶著大家回到初到新港的辛苦歲月：

頭先來到這裡，1937 年是日本時代，你開肯多少就去申請，土地自己去開墾，自己去圍，但是都只是耕作的權利，當時我爸爸也請一些工人來幫忙，都是原住民，但是要和管區說明，看需要多少工人，就會派公工來，那時日本人派的公工，那時一天大概三角，開墾是可以申請工人來幫忙的。

濬源接著三哥的話，繼續說：

我家兄弟每個人都有很重的工作，那時挑水沃菜對小孩子來說是很吃重的，更何況種菜還要再挑到街上去賣，沒收入日子無法度過，還好大哥己經在吃頭路，有薪水可以幫忙家裡，最辛苦的時候還是日本時代時，我們在麒仔麟開墾，那時我和二哥、三哥都還在讀書，我母親來新港沒多久就過世，那時我爸爸還沒再娶後母，吃飯都要自己煮，每天都有很多事要做，我較小就要去拔菜草，較大的一大早要擔菜去街仔路賣，那時我大哥在外面做事，二兄(信源)要去街路賣菜，那時沒時鐘，信源和茂源天還黑黑的就爬起來飯煮煮咧，吃吃咧就擔著菜上路，一路摸黑，也不知道時間，大家心裡在想，走那麼久了，天怎麼還不亮，後來在路邊大松樹下休息很久了天才亮，一趕到學校老師都還沒起床列！那時候大家覺得很好笑，現在想起來也真心酸！

宋家兄弟除了大哥**肇源**己高等科畢業而且成年外，信源在 1938 跟著大哥在坊寮就讀小學五年級，後來二人也搭著船跟著家庭腳步遷移新港，當時茂源與濬源到了新港之後進入當時稱爲「新港公學校」即「三民國小」的前身就讀，同學較多是原住民和河洛人，客家人相對的較少，濬源表示：

我一直到小學六年級才稍為會說一些河洛話，那時和同學講閩南語，大家都聽得出來我是客人，講我有客人腔，我爸爸很少講河洛話，我爸爸講河洛話有很重的客人腔，原住民都叫我爸爸「捱捱仔」(客語發音)，在家裡我們兄弟都是講客話，在學校和同學都是講河洛話，連阿美斯的同學也都會講河洛話，現在我太太在成功街仔做生意，都是要講河洛話，連我丫兄(肇源)在家也都和小孩講河洛話，我聽到了就笑丫兄：「丫兄!你怎麼和小孩也講河洛話？」，講習慣了，客話遂不怎麼有機

會講，有時孩子帶著孫子回成功，要教他們以客家話向長輩打招呼，孫子會說：「我不會，丫公很囉嗦！」，就不理你了，客語眼看就快不見了。

濬源小女兒明燕今年三十八歲，在新港從事生態解說員的工作，對於成功地區客家族群因爲環境的變遷，工作結構的改變致使群體產生自然解體的作用，她表示一來機械代替人工，二來城鎮的開發，再加上東部地形上無法改變的自然災害，讓功利掛帥的社會推著年輕子弟不得不往西部發展，工作生態無法留住子弟，讓分散在西部個各角落的客家族群失去語言溝通的對象，明燕描述成功地區客家語言流失的嚴重性：

我小學讀書一直都沒有離開我的族群，不管到誰家，我們溝通的語言都是客語，但出了我家族的活動範圍，客語是沒有用武之地，不是你不講而是沒人會講也沒人會聽，我也是到山下去上小學，學校讀書才學會河洛話，在山下讀書，學校教給你的就是：你不會說國語就表示你的程度和家庭水準很低，到現在心中還是有這樣的衡量標準，只是沒以前那麼嚴重而已，現在看來其實是個普遍的現象，最好笑的是連我爸爸有時和我講話，客語講著講著就變成河洛話，但最讓人擔心的是我們家族的第三代大都離開了族群到西部去發展，不但自己失去說客語的能力，連帶的也影響到第四代無法以客語溝通了……。

濬源回憶與其共同工作的丫美族群：

我家三嫂講丫美仔話（丫美族語），沒人聽得出她是客家人，她在成功街仔做生意，大家都以為她是原住民，現在很多原住民講河洛話大家都聽不出來，在麒麟山開墾時，有一個原住民在我家做工，後來光復後嫁到基隆，前幾年回來成功找我們，講河洛話沒人聽得出來她是原住民，她的孩子也都講國語和河洛話，也不會講丫美仔(丫美族語)話！

客家人一向有著強烈的族群意識和文化的自信心，對於長期處在大中國及閩南強勢文化之環圍下，尚力圖保有原本風格，並企圖發展屬於自己的特色；但各族之間文化的接觸無可避免會相互影響，而客家族群佔台灣總人口的少數，如此的弱勢文化往往會遭到強勢文化的同化，首當其衝的就是族群語言的流失，當彼此的共同語言不再是族語時，若本身缺乏自覺被同化的危機，族群文化很快就會消失了。

日治時期的東台灣，仍是荒地最多極待開發的地區，自 1930 年代以來，由於日本逐漸進入準戰爭的非常時期，當時株式會社的產業朝向軍事化發展，強調國防原料的自給自足，所以在昭和１２年（1937）「在臺拓」開始規劃本島人移民的同時，「杉原產業株式會社」在新港設立新港農場，自西部移入本島人移民 40 名，此次移民計畫不到兩個月因爲募集的宣傳條件和實際移民契約不同，移民無法適應當地生活，全數逃走，而告失敗，杉原產業本島人移民的失敗，突顯東部開墾的困難度甚高[42]，根據研究，移墾者無法定居東部的首要因素是暴風雨、洪水、旱災等天災毀損房屋和作物，

[42]軍需產業與邊區移民政策的轉向：戰時臺灣拓殖株式會社在東臺灣的移民事業，林玉茹（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 P19。

在 1937 年東移的番古雖不是這一波的移民人口，但「番古」所決定的這趟移墾之路其實也是一條險路，面對著相同險惡的環境，他竟頑強的留了下來，而且兩年後建立了基業，也將妻兒接到東部共創事業。

宋家第三批東移的人口就是肇源和信源，當肇源帶著信源搭船來到台東新港後，全家總算團圓，因爲肇源擁有高等科的學歷，又通日語，很快的在日本產業「杉原株式會社」有了一份工作，當時的「杉原株式會社」是日本開設的農場，爲配合戰時日本需求的物資，整大片的山地都是種瓊麻、苧麻也有種香茅，1941 年根岸勉治以＜商業資本型殖民地企業型態＞爲名發表之論文，該文說明 1916 年由肥料貿易起家之「杉原商店」，自 1932 年以來將投資經營範圍擴及工業生產，包括肥料、製油、澱粉製造、肉類加工及製紙等食品及化學工業領域，並及於東部的農業經營等，1936 年改組爲杉原產業株式會社，是一個以殖民地爲基礎，由商業資本出發的殖民地企業發展成農工商混合型企業。

根據成功鎮誌[43]大事紀紀錄於 1937 年「杉原產業株式會社」在台東新港庄創設新港農場，申請土地 1100 餘甲，目前已墾 90 甲，栽培柑橘 29 甲，其餘種植脆麻、苧麻、黃麻和香水茅，後來在日治時代末期日人又規劃種植柑橘的農場，位在新港港口西側的丘陵區，這一帶的丘陵區因氣候和土質適於種植柑橘類水果，日人當時曾對現在稱爲「柑仔山」的「杉原株式會社」做過土質測驗，證明當地土質適合種植臍橙、檸檬等柑橘類水果，所以日人招徠西部移民種植柑橘，目前柑仔山上有十多戶客家鄉親全都以種植臍橙爲主，而有「柑仔山」之美稱。

照片 十五信源手指為「現在稱為富榮農場的柑仔山」，郭愛珍拍攝 97/9/21

「番古」公長子宋肇源，民國五年出生，是整個家族的精神領袖，在大弟宋信源眼中更是一位讓人欽佩到無話可說的大哥，凡大哥講的話，兄弟毫不懷疑一概尊從，肇源東移新港時已二十一歲，從坊寮帶著信源搭船到新港的肇源，因有高等科畢業的學歷，很快的在日人經營的「杉原株式會社」擔任會計的工作。一方面在日人農場工作賺領薪

[43] 《成功鎮誌．大事紀》 p305。

津貼補家用，另一方面還得帶領弟妹在麒麟山墾耕的工作，一直到台灣光復後，宋家產業因日本戰敗，承接日本產業而再度遷移到現在三民里的富榮農場(原杉原株式會社)。一面帶領弟妹開墾農事，一面在日人產業工作的肇源，不但得以維持家中生計，也因爲肇源在「杉原株式會社」工作的機緣，才得以習得種植柑橘的第一手技術，並安排弟弟信源至台東改良場學習種植技術，宋家兄弟擁有種植技術與經驗，在日本戰敗後土地放領招標時，才得以取得土地經營權利，宋家產業至此正式轉移到「柑仔山」，並將麒麟山四、五甲地的成果轉送給貧困的番古大女兒勤妹經營，勤妹是宋家大女兒，東移時在屏東已嫁爲人婦，因家境窮困，最後也跟著舉家遷移到東港，宋家三子信源回憶：

> 日本時代我丫兄在「杉原株式會社」吃頭路，我那時十五、六歲大哥安排我去台東的改良場學技術，我們兄弟二人都有種植柑橘的專門技術，當時我們在這裡種植都只是申請後才有權利種，沒有土地權狀，所以雖然橘子價錢很好，因為家族人口多，所以只有負債沒有存錢，要靠我們種菜挑去街仔賣才能過日，我若回家，有時去撈魚苗賣，有時到泰源去買蕃薯到番社去「換番社」，那時番社沒有物資，大家先談好交換的條件，我去買地瓜先拿給他們吃，等他們稻米收成再依條件換多少袋稻米回來，幾次下來也積攢了一些錢。

「換番社」、「放稻青」通常是在當時經濟條件不好的年代，人們以物易物的生活方式，當時漢人攜帶針線日常用品到「番社」「換番」，經常可以換取多倍價值的糧食和穀物回去，只是原住民對於土地的習性是只取所需的量，不像其他族群大量的開墾，積屯米糧，所以「換番」有時候不見得有現成的穀物可以換，這時漢人會同意先把他們所需要的東西先留下給原住民先享用，等到穀物成熟再依當時議定的量來收取，稱爲「放稻青」，據信源說，生意不公道的人很多，沒有一定的行情，所以有很多人在台東因「換番」而發財回西部的；信源在堂兄弟眼中是一個相當有生意頭腦和膽量的人才，正源講到信源哥，對他的經營理念與膽識、魄力佩服得五體投地，正源說：

> 信源的評估眼力真是勵害，他是這一個家族中最有生意頭腦和手腕的人才，他只要在橘園裡大概繞一繞、看一看就可以估出這一山區的橘子大概有多少收成？值多少錢？而且每次估計與實際收成數量都差不多，眼力相當準，所以每次去包人家橘子園或讓人家包下橘園去賣從沒吃過虧。

這時大家一陣七嘴八舌，對信源年輕時小小年紀很敢嚐試各種買賣，非常的佩服，信源從小就很活骨，常利用挑菜到山下賣的空檔抓魚苗去賣錢、撿橘園的落果再挑去街上也可以賣錢回來，後來更利用這些賺的錢當本，跑到泰源去買地瓜再挑到原住民部落去「換番」、「放稻青」、在最小的弟弟德有眼中，信源生意眼光和膽識不輸給台灣首富郭台銘，看他如此精瘦的個子，挑著柚子上山下山，每天要好幾趟，腳力非常的快，家中兄弟都叫他「瀆射機」，那時在山上種水果的日子，前一秒還在附近聽到他的聲音，下一秒就已經到另一個山頭了，家中就靠信源一人將水果挑下山去賣錢，再買物質挑回到山上，信源的身體很好，做到七十幾歲了還在挑橘子山上山下的跑，甚至載到屏東、花蓮、台北去賣，現在八十幾歲了，雖然不必挑擔子，爲了循

視橘園依然上山下山如屢平地，喜歡旅遊的他也組了一個槌球隊，當任理事的他，常得帶著會員全省走透透，自得其樂。

德有講到信源做生意的經歷，欲罷不能：

> 我二哥抓魚苗去賣，他不是像人家固定每天去抓或固定去賣給誰，他如果發現有比賣魚苗更好賺的，他就不抓了，有一次有專門在賣魚苗的生意人就跟他講你以後就抓來賣給我，我就多少和你買，可是當信源發現生意人是以低價買進以高價賣出，他就說要這樣我就自己去賣就好了，之後的好幾次真的都自己去街上賣。

「抓稻青」應該讓信源哥年紀輕輕的賺了不少錢，他有了一些本錢之後，就到處去看，看到人家稻子剛播下去還沒收成，就去和人家估價要不要賣，先把錢估給你用，等稻米成熟了由我來收成，那時是一種風險很大的買賣，若是碰到風災或乾旱就血本無歸了，不過當時這樣的買賣的價錢都是折半價的，也就是時價一斤米若是五元，那買方就只要付二塊到三元就可以買到了，膽量大又眼力超準的信源，就這樣以小錢滾大錢，著實讓他積攢了不少錢,尤其是做生意的膽量就此培養起來。

尤其讓德有非常欽佩的是，家中的產業信源是體能最好、最忙、最賣力的一個，但他還能利用大家都休息的空檔時間去從事私人生意，而且不只做一種買賣，除了「放稻青」等著收成之外，還會先去泰源買地瓜挑去原住民部落「換番」，「換番」是一種以物易物的生意方式，當時「換番」是沒有行情的，端看當時的生活條件和社會景氣，信源做生意很公道，曾經有人以一袋地瓜換四袋稻穀，而信源一直是一袋地瓜換一袋稻穀，當時筆者問他，原住民他們有稻米，爲什麼還要拿來和你換地瓜這種較低價便宜的東西，信源說，哦！原住民高興的不得了，那時候那有得吃，窮到稻米剛種下就已經估給別人換食物吃光了，所以我一去，他們都很歡迎，因爲一來可以先解決食物短缺的困境，二來我不會騙他們。

在宋信源的生活哲學裡沒有「等待」，有的是不斷的爲自己創造機會，尤其在困境中所謂的機會就只是簡單的兩個字「付出」，而信源卻甘之如飴，這不但爲自己帶來財富也爲後代子孫鋪陳一條無慮的生活環境，現在八十三歲的他平日除了照顧橘園外，每天一早隨手在空地上種菜，這裡一股那裡一股，卻成爲太太和兒子在成功街上賣菜做生意的貨源，而且是不用本錢的。

德有對也是頗有生意頭腦的二嫂（信源妻）更是讚譽有加：

> 我二嫂是不認識字，但在街上做生意很有本事，當時的人買東西會有賒欠的習慣，二嫂一張紙記得密密麻麻的，誰都看不懂，但一到年底她就是有本事一筆一筆都可以很清楚的收回來，有一次賣黃瓜，一條價錢是五毛，有一個婦人就說我只有三毛就賣給我吧，二嫂二話不說，黃瓜拿著往膝蓋用力一折，黃瓜應聲折成二半，一半就這樣賣了三毛錢，另一半留著晚上煮湯（大家一陣大笑）．．．唉！他們夫妻二人都有很好的生意頭腦和手腕。

信源最風光時候，成功街上和高雄有好幾家傢俱店，信源談到自己做生意賺錢的本事和工做的耐力與毅力，意氣風發，對於自己閒不住的個性也是很無奈：

我那時在麒麟山和二個弟弟種菜，每天挑下山去賣賺了一些錢後，再拿來當本，我和弟弟賣菜和做生意當時就賺到兩萬塊，日本時代的青仔叢（票額一百元因票面上有一棵椰子樹而稱之）是很難看到的，日本仔巡查若看到你有「青仔叢」，是會問你來源的，你看我賺到二萬塊，所以後來我也去山下做生意，光復以後，我們家的產業都移到柑仔山，我大哥在杉原有宿舍，我們家也把「杉原農場」承接過來，所以大哥就叫全家都搬來這裡，麒麟的四五甲地就都給大姐勤妹去做，日本時代我十八歲時也被派去當兵，二年多回來，我還賺了三百多元回家，在路上還買了一頭牛回家，我的生活真的很儉省，要不然怎麼會有這一片產業？

客家人的節儉男女皆然，由信源對生活的拚鬥和節儉可以窺知一般，當時的「杉原株式會社」因日本戰時的需求，在東部大量規劃種植瓊麻，瓊麻與台灣的關係淵源於日治時代，戰時日本人知道瓊麻的纖維可以製成如麻繩、麻袋等諸多民生用品，但當時的台灣並無生產，因此認爲這項作物可以在台灣發展的日本人，就在 1901 年從墨西哥將瓊麻引進台灣，並在台灣的北、東、南部三地進行試種。

在氣候、地質等因素影響下，旱生的瓊麻在恆春地區試種成功，也長得最好；因爲當地「富碳酸鈣的地質」加上「強勁的落山風」，使得瓊麻中的纖維可因此更加強韌，品質純佳；爲此，日本人即開始鼓勵當地居民展開小部分的種植，不過當時農民並不曉得瓊麻爲何用。不過自日本戰敗從台灣撤退後，在往後的十幾年內開始發展經濟，因此對繩索的需求量很大；而當時無論商船、漁船或軍艦等都需要這種拉力強度大的繩索，瓊麻才得以展露頭角而跑上第一線，除供國人自用外，還可外銷至其他地區。

後來日本戰敗台灣光復後，「柑仔山」放領招標的土地，第一次宋家並未得標，由林傳號得標。但因一方面宋家種植土地遼闊，管理人若要通過柑仔山，得先向宋家打聲招呼；一方面得標人並未具有種植柑橘的技術，經營辛苦而且虧損連連，於是在得標的第二年就宣告放棄，「柑仔山」遂正式由宋家番古兄弟和馬榮通合股接手管理，並將農場改名爲「富榮農場」取其富裕榮耀之意，目前往柑仔山的這條路稱爲富榮路，路名因此而來。

信源回憶：

台灣光復後番妹丫叔從廣洲回台，當時家族都已分產，屬於丫叔番妹的部份也都因為投資大陸失利，回到家鄉後番妹暫住三叔萬龍古厝，一來對三房生活造成壓力，二來我爸爸認為這個弟弟是個有生意頭腦的人，可以補自己溫文不善爭利的不足，所以力邀番妹舉家東移共創橘子王國，又說大家兄弟一起做，有飯大家一起吃，所以就讓丫叔番妹和我們合股，雖說是合股，但丫叔當時沒有出半毛錢，完全因為我爸爸認為客家兄弟，要合作才能有力量，更何況當時我丫叔跑過大陸大江南北，世面廣闊，所以我父親就讓他擔任農場場長，個人一個月支薪伍仟元，可是當時招標時柑仔山產

權不知何故卻都登記在番妹丫叔名下，後來遂引發一場土地糾紛，當柑仔園收成時，丫叔告我們番古父子侵佔，還好最後兄弟都能秉持客家人相互尊重、團結合作的情操，才得以圓滿解決。」

但因爲土地產權的糾紛讓兄弟兩家感情陷入泥淖，番妹有三子，然皆不善農事，農場接收後的工作自然都是番古四子在做，信源最是不平的是，當時大哥肇源雖是當主計，但是分薪卻是丫叔番妹的權利，信源描述農場工作的情形：

我們家和丫叔家都是兩個兒子在農場工作支薪，當時丫叔是隊長，個人月薪是伍仟元，我大哥和丫叔的大兒子皆是二仟元，而我一個月才九佰元，一天才三十元，又有一家大小要吃用，很艱苦，所以我老婆要種菜、養雞、鴨才能過活。過了三、四年，因為整個農場都是丫叔在管理，更嚴重的是土地都是登記在丫叔的名下，所以我才和大哥講：丫兄！現在的土地都是丫叔名下的,現在如不趕快分開，以後咱家什麼都沒有。」後來我大哥想想也對，就打電話到台北給最小的丫叔(安開)和宋子鰲大家一起來處理，協調了數次才將土地分割清楚。但卻在一次收成橘子時被丫叔硬指盜竊而告上法院，自此兄弟行同陌路。

照片十六 番古六子宋德有與訪談者訪談情形，林耀雄攝 97/10./30

番古的五子德有當時才十五歲，看到父親個性如此大方不善與人爭利，到了晚年卻因土地而落得兄弟鬩牆，心有戚戚焉：

記得有一次我陪我父親從山上要下去，正好我叔叔番妹從山下要上山來回家，那時兩家因為土地產權不清感情不好，那時年輕氣盛，所以我也很不尊敬他，我們在路上相會之後，大家也沒打招就走過去了,但到了山下之後我父親就回頭問我：剛剛碰到的那個人是誰丫？我就說:「是叔叔丫！」,當時父親一巴掌就從後腦拍下去，你叔叔？知道是叔叔為什麼不叫人，那時候我也很頑皮又任性，我就回說:「爸爸你是他哥哥為什麼他就不叫你，為什麼我要叫他呢？」我父親就是這樣子,他說我們兄弟怎麼樣是我們兄弟、大人的事，你是後輩是不可以這樣子的，過了幾年，當時我父親生病奄奄一息的躺在床上，我們兄弟都圍在床邊，那時我父親是住在三合院路口進來最邊邊的那個房間，窗戶是玻璃，從我父親躺的地方可以向外看到，他知道我叔叔有來看他，但就是不願進來，所以我父親一直流眼淚，因為我們都一直背對著窗口，直到後來我太太和我說我才知道這件事，所以說是是非非雖然都已經是過去的事了，但心中知道我叔叔有那個心，再多的不愉快也就放下了。

三、　拓墾---柑仔山王國

日治時日本對台「內地化（日本化）東臺」政策，透過土地整理，將東部土地大半納爲官有地，作爲日本人移入的基地，以扶植日本民族爲東部優勢族群和日本人心中的「新故鄉」，但由於東部勞力嚴重不足，日本臺拓政策爲了進行開墾和栽培事業，乃自昭和十二年（1937）開始同步自西部移入臺灣人至東部墾殖，除民間公司招募的「會社工」外，凡自主性的遷移，並以永住爲目的的移民，即所謂的「自由移民」，日本人的移民計畫，無論官營或私營完全失敗，而且私營移民的失敗程度更在官營移民之上[44]，在由於移民失敗，土地任其閒置，台東開發因而遲緩，於是私自前來東部拓墾的民眾日益增加[45]，有的沿著鐵路開墾，形成聚落，有的順著海岸線落腳，落地生根，其中包括宋番古一家。

番古公所落腳的新港麒麟山，位置是現在的忠仁里內，山高 1554 公尺，和成廣澳山、分水崙山、白守蓮山、新港山、加只來山構成海岸山脈地勢最高的山地地形區，也是成功鎮各河流的發源地，番古公帶領著兒女同心協力，胼手胝足在山區開墾，種植柑橘、檸檬、晚崙西亞、柚子等水果，庭前屋後掘菜股種蕃薯、擔肥沃菜，再徒步以人力挑下山賣給水果販及人家，以賺取生活費用。

1945 年日本戰敗後，日治時代結束，日產開始招標放領，原本在「杉原株式會社」農場工作的宋家兄弟，在二年後取得農場經營權，國民政府從 1949 年到 1953 年，採取“和平漸進”的方式，進行土地改革。首先實行“三七五減租”。意思是地主對佃農的租額不得超過全年收穫的 37.5%，所以簡稱“三七五減租”。爲什麼要定這個比例呢？當局是這樣計算的：農田普通收穫量中，種子、肥料和耕作中其他成本費用要耗 25%，扣除這部分，餘下的 75%地主與農民平分，各得 37.5%。所以就叫“三七五減租”，其次實行“公地放領”。台灣光復後，從日本人手裏接收過來的耕地叫“公地”。政府曾於民國三十五年辦理公地放租政策，將公有土地放租給耕種該地之農民，而後扶植自耕農，從 1951 年開始，台灣當局將這些“公地”陸續賣給農民，幫助農民取後耕地所有權，地價爲耕地主要產物全年收穫量的 2.5 倍，爲了不受貨幣貶值的影響，以實物計算，全部地價由農民在 10 年內分期償付，不負擔利息。受領農民只要連續交納 10 年地租，每年交納的租額正好等於每年應交納的地價，10 年期滿，耕地即歸農戶所有，公地放領到 1961 年辦理完畢，最後實行“耕者有其田”。這樣的政策益及宋家，自此辛苦二十幾年的宋家，終於有了真正屬於自己的產業----「柑仔山」柑橘王國。

人稱「阿古先生」的宋番古，於民國 26（1937）年遷徙至新港，當時的成功原稱「麻老漏」（Madaudau，其意爲「枯草原」，大正九年（西元一九二〇年）地方制度改正時，新港支廳自「成廣澳」移設於此，也因這裡是一個新開闢之港口而改名爲「新港」，直至戰後，才又取「光復成功」之意而改稱此地爲「成功」。

客家族群遷移到地處多山的台東，由於人口較少，加上移民較晚，墾拓的地區大都爲丘陵山區或貧瘠之地，倘若遭逢戰禍或天災，生活便無以爲繼，造成許多人的再

---

[44] 陳羿妙＜日據農業移民研究---重新檢討日本對台灣的殖民結構＞ 清華大學經濟研究所碩士論文 P75

[45] 台東文獻復刊第 10 期 民國 93 年 10 月 P12

遷徙，他們有在原居地附近移動，有的族群爲了解決內部人口不斷增加、分家後每一房分得的田地日益緊縮，農作所穫不足維生等等的問題，有的會向其他族群租賃土地或者以擔任長工的方式換取生活所需，甚有或者乾脆拋棄原墾地，到一個全新的地方開拓美麗新世界。

客家民間流行一句俗語：「節儉富千年，坐吃大山空」，客家人生活在貧困的山區，披星戴月，把貧瘠的土地開墾出來，不省吃儉用就很難生存發展，宋家在墾荒的時代，有時較耗費體力時就煮乾飯吃，偶而也會碰到寅吃卯糧一日三稀的窮困情況，且伴食不是番薯、芋頭、南瓜就是自種的青菜：

番古先生三子信源和五子濬源回憶：

當時和我爸爸開墾種水果時，我兄弟三個很能做也很能吃，每天帶大約兩碗米，現採菜園裡的蔬菜和著野菜，三個兄弟就地煮成一大鍋飯菜，也不用帶筷子，就地取材，現削樹枝就把整鍋飯菜吃個精光，有時兄弟圍抓竹雞，現殺加菜，一起下溪撈蝦抓螃蟹，那個時候溪裡蝦仔很多，整個山區可以吃的東西很多，上山下溪什麼都能吃，現在想起來那時候物質雖然不像現在應有盡有，但是只要有土地什麼都不缺。

一直笑著看著兄弟的茂源接著說：

光復之後因為物資更缺，市場一片亂糟糟，都沒地方買，我們做農的還好有蕃薯配蕃薯葉（在旁一直笑的濬源小女兒明燕打趣的說：那很養生丫，難怪你們都那麼健康），那時規定不能播田，東西都沒得買，要配給，有人會偷宰豬，爸爸會去偷買人家的私宰豬肉，厚!抓到後果是很嚴重喔!大家怕得要死，只好偷偷丫吃!

土地放領後，宋家的新希望——「柑仔山」，位於東台灣，是西北太平洋颱風必經之路，正面迎風的成功鎮，當颱風來臨時，其所挾帶狂風之強大壓力可讓樹倒、屋塌、飛沙走石、人畜傷亡，以種植為生者因氣象自然因素所導致的災害，以颱風所造成的損失最大也最嚴重，其次是異常降水，再其次為乾旱，被番古公視為美麗新樂園的「富榮農場」，位在丘陵山區，宋番古先生當時種植柑橘，柑仔山的水果品質良好，連改良場都會來此購買。據宋信源先生說，在當時柑橘的價格很好，光是賣出一斤橘子的價錢，就足夠請得起四、五個工人工作一天了，客諺有云：「七月落水又起風，十個柑園九個空」，辛苦成果免不了天災折損，而這樣的折損正是宋家龐大負債的主因，一場風雨輕則落葉折枝、滿園落果，重則連根拔起、血本無歸，談到天災造成的損失，宋家三兄弟心有餘悸頻頻搖頭，可怕的景象又回到記憶中：

每一年的七、八月是我們做農的最擔心的季節，颱風一來多年的辛苦都要白費，幾乎每一年都會有一、二個颱風，印象最深是在我們分家之前的幾次颱風，超級大，直接從成功登陸，山崩地裂、飛沙走石，風大雨也大，很恐怖，我們柑仔山的柑橘約在十月底開始收成，所以八月來颱風，老天簡直是不給飯吃，掃得整片山光溜溜，折的折、倒的倒，去了了…….到民國五十二年爸爸決定分家產時，因為一來風災讓我們家負債沉重，二來大家兄弟都成家了，小孩一個一個的出生，每一個家庭使用的公款差異越來越大，是到了分技散葉個自打拚的時候了，所以父親找來當時的結拜兄弟陳陳洪霦當立證人，就分家了。

想起在柑仔山一起爲果園打拼的三兄弟，思緒回到爲家庭奮鬥的點滴，信源忽然想起：

那是在分家前了，想到有一次（轉頭問濬源），咱兩個兄弟趕著牛車去載米，停下要買個東西，想說把公牛暫時掷著比較不會跑，沒想到公牛自己拖著車往山下衝，路又陡，兩人嚇到　　兩腿發軟，驚到喊不出聲音，還好路上沒人，剛好牛車的一個輪子卡在土地公廟邊的溝仔，否則就慘囉！我兩個兄弟仔嚇到一口氣差點喘不過來，全身發抖，現在想起來，心臟還一直跳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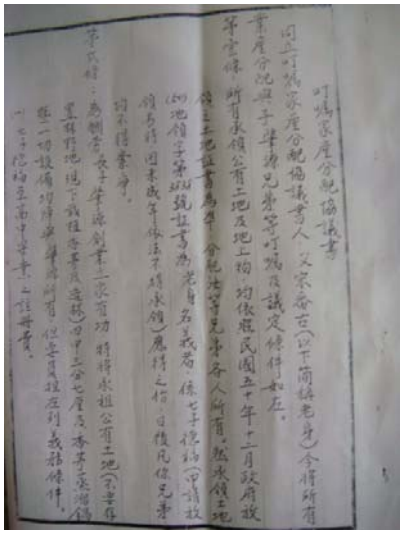
講到家中的牛，濬源接著說：

我家母牛就很有人性，去山下載日常用品時這隻牛母自己知道路回家，有時我們兄弟會在半路轉到雜貨店仔買東西，牛繩一放讓這隻母牛自己走路回家，路上原住民碰我們都會很驚訝說你的牛沒人帶可以自己走路回家，太厲害了!

提到牛，家中的牲口在信源兄弟口中娓娓道來像是家人一般親密，憶起當年剛來台東新港開墾時，茂源、濬源還是個六歲和十歲的孩子，雖然年紀還小，但是要努力工做才有飯吃的觀念，讓他們放牛、趕牛、照顧牛就像是照顧自己的肚子一樣的用心，從不感覺有多麼辛苦；時光流逝有如那隻驚嚇的公牛，「歲月」在陡陡的坡道上往下狂奔，一轉眼七十年就這樣傾泄而下，消失在當時還是黃黃的泥石路上，想到七十多年的辛苦，一步一腳印隨著牛車緩緩一步一步往上走到現在舖上水泥的宋家紅色大門，「柑橘王國」在一道紅色鐵門內自成一個天地。

照片十七 紅色鐵門進去就是柑仔山，郭愛珍攝 97/9/21

四、　分家----家產分配協議書



圖二：宋番古先生「叮囑家產分配協議書」。宋信源先生提供，郭愛珍翻拍 97/9/21

宋家是傳統的客家大家庭，雖沒有一般客家家族數世同堂的規模，兄弟分戶，經濟上不同財，各自獨立謀生，但在意識上卻依然依附在宗族的大家庭的結構之中，還保留著大家族的觀念和習慣，宋番古先生不僅開家立業著有成績，即對百年之後的家業分配，亦有先見。民國五十二年，宋番古先生七十三歲時，他即預先立妥＜叮囑家產分配協議書＞，對家產、資金預作分配。

茲錄其＜協議書＞內容如下：[46]

叮囑家產分配協議書

同立叮囑家產分配協議書人，父 宋番古（以下簡稱老身）今將所有業產分配與子 肇源兄弟等，叮囑及議定條件如左。

第壹條：所有承領公有土地及地上物，均依照民國五十年十二月政府放領之土地證書為準，分配汝等兄弟各人所有。然承領土地（50）地領字第 3838 號證書為老身名義者，係七子德福（申請放領當時，因未成年依法不得承領）應得之份，日後凡你兄弟均不得紊爭。

第式條：為酬勞長子肇源創業立家有功，特將承租公有土地（不要存置林野地，現下栽植香茅及造林）四甲三分七厘及香茅蒸餾鍋暨一切設備均歸與肇源所有，但要負担左列義務條件。

（一）七子德福高中畢業之註冊費。

（二）自本 52 年十一月起至明 53 年七月止之膳（原文誤為「繕」）食費。（但自該 53 年八月起由德福所有收入部份自負）

[46] 本「協議書」係由宋信源先生所提供。

（三）倘因茅油跌價至每台斤叁拾元以下無法繼續經營時，上述兩款（註冊費及膳食費）之負担，一切應予取消，惟註冊費乙項分由肇源、信源、茂源、濬源四兄弟平均負担，其他服裝、來往車費蓋由老身負担。（中間倘遇老身有百年大事時，則由德福所有收入份下自負）

第叁條：老身之養老費均由肇源、信源、茂源、濬源四兄弟，每人每月負担新台幣壹百元於每月五日以前交清，以備使用。

第肆條：柑桔過去兩年連遭颱風損害發生歉收，以致現有五八九０七．五０元之負債，則將現下所有盈長現金五七二三元扣除外，尚有實際負債金額五、三一八四．五０元整（另附負債、現金結存明細單各乙份）每條借款均由肇源、信源、茂源、濬源四兄弟平均負責（每人負擔母金一三二九六元）依約償還不得異議。

第伍條：信源、茂源、濬源現住房屋歸由德有、德福所有，又肇源現住房屋歸由茂源所有，但肇源、信源、濬源三人尚未另建新居以前，有居住現屋之權利，茂源、德有、德福不得乘（原文誤為剩）隙驅逐兄長之行為，但他日各有發展遷出新居時，原有住房內部設備，不得毀損或搬移他用。倘德有、德福所住之房屋及現住人（信源、茂源、濬源）居住之房屋，若有損漏時，所有人（德有、德福）與現住人應付共同補修完善之責。但肇源居住之房屋應由肇源負責修理。

第陸條：與李文相先生合夥經營之柑苗，待明53年春季出售結果（應予扣除苗圃租金，工資，農藥費以外）與他二股均分現金，餘苗後再由汝兄弟六人平分。但因茂源所分之土地，尚未種植柑桔之面積較多，應予加發柑苗式佰株俾資種植。

第柒條：牛車壹台，水牛兩頭歸由老身所有，但你兄弟可得申請使用，使用要付老身看管費若干元。（看管費由老身規定徵收）

第捌條：腳踏車及脫殼器各壹台，又犁叁張，手耙，刈耙各壹張由老身保管，但你兄弟可以共同使用。

第玖條：約定第肆條之債務未償還之前，肇源、信源、茂源、濬源之放領土地證書，暫由老身保管至債務償還清楚之時，始行發給，若不依約履行債務償還者，老身有權處 理所有產業至債務償還清楚為主，不得異議。

第拾條：分配各人所有之果園生產物品，不得互相乘（原文誤為剩）隙貪圖盜採。及應嚴加管教各人子女，不得損摘他人之物，違者任由所有權者處罰，不得抗議。

右列叮囑家產分配協議書拾條，業經徵得汝兄弟，心歡意願之下所訂，務希切實遵守遵行，勿以天倫詬誶，以同脈操戈，須貽同氣之光，無傷手足之雅，而對神對祖宜誠，對親對戚宜敬，事業必有周全計畫，實行，檢討得失改善，子女教育應從重視培養，居家必須檢點，用財宜慎經濟，親賢遠小，嫖賭勿耽，善事可作，惡事莫為，凡做事必循天良，處事宜行德義，自然冥冥天道，當庇福壽無疆，望汝兄弟依承父命無違是囑！切切。

備註：該協議書全式作成六通各執乙份為憑。

立協議地點：成功鎮三民里三民路202號本家正廳

立協議人：　父　宋番古

長子 宋肇源

叁子 宋信源

四子 宋茂源

五子 宋濬源

六子 宋德有

立會及記錄人：　陳洪霦

住台東鎮文化里更生路孝順巷六號

中華民國 五十二年 九月 二十九日

以下空白

此份協議書內容巨細靡遺，有慈父的殷殷叮囑，亦有嚴厲的諄諄告誡。宋氏兄弟相處和睦，後代子孫率多溫良恭儉，宋番古先生的教誨居其首功。

此份協議書不僅是一位父親的叮嚀與期許，其中也可看出當時的社會狀況。「香茅蒸餾鍋暨一切設備均歸與肇源所有」，因爲當時有一塊地是在種植香茅、蒸餾精油，當時價錢相當好，番古公認爲肇源是長子，建立家業、引領弟妹功勞最大，所以將香茅權利分給長子，然而相對的要負擔栽培幼弟讀書的義務；而「柑桔過去兩年連遭颱風損害發生歉收」句，則傳達了當時居民與天災抗衡的無奈。

信源回憶分產時的情景說：

我家在民國五十年我爸爸就幫我們兄弟分家丫，我記得分家前幾年來了幾個颱風都是超級颱風，風雨都很大，當時把所有的柑丫都括走了，所以分產時沒錢，只有負債和土地，協議書上面有註明，等我們兄弟把債還清之後才可以拿到土地放領的權狀證明，當時分地，上面的地較陡的地四個兄弟都平分,丘陵地也是四個兄地都平分,平地的地也是四個兄弟一起平分,每一個部份都是抽簽決定誰得那一塊,所以好壞地大家都有分到，而且由大哥做簽，我們三兄弟先拿，大哥拿最後那一支簽，我大哥做事很公正公平，而且什麼都會讓，從不和人爭長爭短。

濬源的小女兒表示，常聽父親津津樂道家中分家的情形，心中也很吶悶，照理說分家產是一件很不愉快的事情，不是明爭就是暗奪，怎麼爸爸每次提起分家的事，還總是得得意洋洋，明燕口述：

大伯父(肇源)是整個家族的精神領袖，我丫公當時在分地就是說，上面比較陡的丘陵地或山下較平的地，四個兄弟都有分到，所以四兄弟的地都在隔壁或附近，當時丫公將地分成四分,大伯父做簽,由三兄弟先抽,大伯拿最後的那個簽,我覺得丫公很有智慧，雖然看起來把地都分了,但是彼此的每一塊地都在隔壁,你要到山上工作,一定會經過其他兄弟的地,你要開路也要和其他兄弟商量才有路可開，所以感覺上各自

工作，家產分開，實際上卻是以土地將兄弟更緊密的聯結在一起。

分家產時德有、德福當時都還是分別爲十二歲和十六歲的年紀，正在求學的他們，對家裡兄長每天起早趕晚的工作，提供資金以供其求學，但是到了最後在分家產時，兄弟還能互相禮讓的情境，記憶非常的深刻，也讓他滿懷感謝：

大家還住在一起未分家時，種植的橘子，因為稀少所以價錢很好,幾十年錢一斤橘子十幾塊,想想看那時候女工一天 2 塊 5 毛錢,男工一天 4 塊錢,一斤橘子可以請五、六個工人，可見那時的橘子很少很珍貴，大部份配到台北，你有錢也買不到，是大官人家買來送禮的，晚倫西亞幾十年前經濟不好的人買不起，經濟好沒有本事也輪不到我們普通老百姓買,我叔叔和我爸爸和馬榮通剛合伙接手時「杉原農場」的橘子才只是新叢而已，經過我哥哥們的技術栽種，一、二十年後就成為老叢，現在才有多量的收成，當時大部份土地還沒種橘子時是種瓊麻，那時日本會請專家來測土質，看那一塊地最適合種何植物最好,後來土質專家建議可以大量種植晚倫西亞才引進來，但這時日本差不多已快戰敗了。

「我大哥們都非常的老實善良，完全就是埋頭苦做的人，很肯做事，尤其是大哥肇源聰明會讀書，在那個年代讀到高等科畢業是很不容易的事，他一個人吃頭路賺錢養我們全家，來到新港就找到工作到會社（杉原產業株式會社）做會計，等我們這些弟弟們較大了才和大哥一起分担，大家一起打拚一直到民國五十二年分家產，辛苦了二十幾年的四個兄長，到分家產時每人分到的是一萬多元的負債，而我和弟弟受到父親和兄長的照顧，不但沒有承擔負債，反而和兄長一起分得家產。

分家後因爲協議書言明，信源、茂源、濬源現住房屋（三合院）歸由德有、德福所有，又肇源現住房屋因在茂源的土地上所以歸茂源所有，但肇源、信源、濬源三人尚未另建新居以前，有居住現屋(三合院)之權利，茂源、德有、德福不得乘（原文誤爲剩）隙驅逐兄長之行爲，但他日各有發展遷出新居時，原有住房內部設備，不得毀損或搬移他用。倘德有、德福所住之房屋及現住人（信源、茂源、濬源）居住之房屋，若有毀損雨漏時，所有人（德有、德福）與現住人應付共同補修完善之責。但肇源居住之房屋應由肇源負責修理。因此，縱然分了家產，兄弟還是和樂的共同住了好幾年，宋家長孫興文當時在屏東美和中學讀初中，與最小的叔叔德福同年，所以有機會同享家族公費資助學業的福利，客家人在分家時，通常是家庭增值或繁衍的重要過程，通過分家析產，新的家庭單位不斷的產生，但宋家家族凝聚力並未因此而受到衝擊，反而因爲番古特別方式的田地劃分，讓兄弟們在園中工作行進時，因爲田產交錯相鄰所以天天必得要經過兄弟們的家門口，所以老大肇源在屋前闢建一條道路以方便二弟信源三弟茂源載貨下山,也因爲這樣的情誼,養成兄弟們在工作後每天都會在大哥肇源家中聚會的習慣 。

照片十八 肇源住家前的道路是為弟弟們上山工作而留，郭愛珍攝 97/10/10

五、 京兆堂——成家立業

照片十九茂源的家也是斗大的『京兆堂』，郭愛珍攝 97/9/21

客家人堂號是每一姓氏的淵源，也代表著姓氏的代稱。 客家人大都掛起祖先的堂號，以明白表示其本源之所自，並做爲光榮的標記，藉以緬懷先祖之創業而思所承繼與振發，宋家兄弟家門兩旁的門聯都寫著：【京華仰望高書府 兆應昌明宰相家】，橫聯斗大的『**京兆堂**』三個字，這是宋家宗族從屏東延續的血脈證明，傳統的客家人，大部份仍念念不忘原鄉，但對於在這個氣候潮濕、夏季多颱風的海港小鎮安身立命的宋古家族而言，可以移植原鄉的經驗必竟不多，最具代表性的就是這個堂號了，族群有時爲了求生存，一方面要武裝自己接受來自自然界的衝擊和挑戰，另一方面因地緣關係與與生命的延續，必得接受與其他族群通婚、生育的事實，血緣與親族以及社群的婚姻關係甚至生活習慣因而重新組合與改造。

番古公在夫人過世不久即認識住在隆昌的阿美族婦女羅儀(漢名)，番古是羅儀的第三任丈夫，以當時丫美族傳女不傳男的傳統及客家保守的性格，羅儀會進入宋家生活，相信有份浪漫感人的愛情，讓已年近五十的番古不顧家中已成年孩子的感受，成就了一樁異族通婚的美事，當時年已二十五歲的肇源和正值青少年判逆時期的信源，心中還是緬懷著因過於勞累而世的母親，不希望母親的地位被頂替，但客家父親的威權和不捨父親的形單影隻，雖不大能接受最後還是尊重父親的決定，只因家庭真的需要一位女主人，當時信源十五歲，正在台東試驗所學習技術，有一次回家知道了這件事：

那時我差不多十五歲，我爸爸決定要娶這個第二個太太，怎麼決定的我們小孩子無權過問，聽人說是人家介紹的，我父親也不太提，知道的是嫁給我爸爸已經有二次婚姻而且有二個小孩，我心裡很不是滋味，因為我媽媽真的很辛苦，大家生活習性不同，大兄是在吃頭路住在宿舍，剩下我二個小弟和一個妹妹，那時他們年紀還小，真的需要照顧，雖然二媽不太會做農事，但和我們相處可算融洽，而且還幫宋家生了兩個男孩，那時候家中入不敷出，都是我大哥和我工作在栽培，所以德有和德福和我們很親，家中只要有事他們一定會回來參與。

照片二十　富榮農場的三合院

番古續弦的妻子羅儀，有二段辛苦而不美滿的婚姻，前夫酗酒且暴力成性，生下兩子後離婚收場，嫁給番古後，養雞、種菜，謹守本份，很少外出，因爲身體不好，兒子德有常有機會到山下找醫生到家中出診，雖然事隔多年，當談到母親心疼之情溢於言表：

我非常感謝我的哥哥們對我和弟弟的照顧，我父親在民國六十二年過世，因為父親在地方是很有人緣和名望，所以後事辦得很風光，之後我母親過世，那時我們兄弟都以經分家了，我光為了自己三餐外，還要負責我弟弟的學費，那時德福在台北文化大學就讀一學期學費加上生活費是一筆龐大的負擔，所以搞得很不好過日子，若不是大哥們頂力相助，我會很悲慘。

我媽媽在沒嫁給我父親之前的婚姻是很不幸，是聽我

媽之前所生的兄弟講的，我母親的前夫愛喝酒而且很暴力，我母親那時身體就很不好了，所以嫁給我父親後，農事可以做多少是很有限的了，小時候看她就是不大出門，本本份份的做事而已。

照片二十一 番古居住椽鑿屋一角，郭愛珍攝 97/9/21

照片二十二 信源看著賣出去的古厝，郭愛珍攝 97/9/21

這棟宋家三和院建於民國四十年左右，在我 19 歲時交到我的手裡，三合院的建造是因爲我們原本在麒麟山開墾，到日本戰敗徹退後，日方產業急著拋售，那時「杉原農場」整個山區有好幾甲地非常的大，當時我爸爸也只是小有積蓄財力有限，無法獨立承當下來，所以找馬榮通和大叔番妹合股把整個農場頂下來，那時爲了將整個事業重心移到柑仔山，所以向當時的農會總幹事買下這塊山坡地，建了三合院做爲住家，三合院的地不屬農場，是以前農會總幹事的地，我父親和他買，後來請一個叫李文相的師傅來蓋，這種客家人講的「椽鑿屋」，非常特別也很耗工，是以較大的竹子一根一根去造洞，小竹子穿進大竹子裡，整棟房子都沒有一根釘子，牆面是以竹子削成竹片，一片一片像布紋一樣編起來，以黃土、泥漿和切成一段一段的稻草攪拌，再糊上已編好的竹片上，利用稻草的附著　力將泥漿保持住，非常特別而且住在裡面冬暖夏涼，橫的中間是客廳，兩旁是房間共有三間，左右龍虎間有四間，左邊的最後一間是廚房，那時除了大哥肇源外其他的哥哥都住在一起，而且二哥信源三哥茂源都是在那裡結婚，所以分家產時他們都成家了，只有我和德福未成年，由爸爸和肇源、信源四個哥哥共同承擔照顧我們的責任。

房子接手的時候我大概 19 歲,父母過世後沒有幾年我就搬到街上了,當時的地我投資去種生薑,不是做得很理想，年紀輕不會理財也不會處理事情，後來又要負擔弟弟德福的學費，因爲分家前柑仔山有一塊地專門稗種蓍香茅草,沒有兩年香茅就跌得很慘,依分家協議香茅跌到三十元以下，弟弟的學費就要由我來負責,那時弟弟考上文化大學,一學期就要二萬八千多元，生薑收成又不好，那時就開始負債了，後來我和德福分得的土地和三合院也不是賣掉的，那時因爲負債，當時的農會總幹事太太也是我的老師，邀我加入她起的互助會,但交了幾期後就無力再交了,會錢一直滾，到後來,後來老師就把我這塊地連我弟弟的都估走了,沒有估多少錢,就這樣祖產就沒了,很長的時間，我一直很內疚無法去面對我的兄長們，因爲我最大的敗筆就是事情發生後都沒有找兄長們商量，那時想說自己的事情要自己扛，沒有理由找兄長來幫忙，就因爲自已的偏差想法與理財無能，沒幾年就把父兄辛苦開墾出來的產業、父母親辛苦積攢留給他們兄弟二人的土地過給了他人，沒有想辦法好好保護，就連大家一起住那麼久的三合院也不見了,整個家就像被刨掉根一樣，最慚愧的是連弟弟的產業也都一起失去了。

照片二十三：宋肇源先生騎馬之英姿。宋信源先生提供。

德有口中對他幫助最多的肇源，在家族眾堂兄弟心中有如父親般崇高的地位，外型溫文 儒雅，尤其很會讀書、寫得一手好字更爲兄弟所津津樂道，肇源在民國五年出生，是家中的長子，家族對這個長子寄很高的期待，所以一直栽培讀書，期盼能出人頭地，在屏東讀到高等科，在日治時代的台灣人裡算很高的學歷了，一生經歷家族從殷富到質典田產遷移他鄉的過程，舖陳出肇源嶇崎多變的人生。

宋家長孫宋興文回憶與父親的相處，指著筆者所坐的位置說那就是其父肇源最常坐著看報紙的地方：

小時候總覺得父親最愛看報紙，每一坐下來，總要找個報紙來看，他常講在這樣一個落後的後山，知識的缺乏與文明的隔閡是要特別在意的，到了晚上，點個燈，就坐在我們小孩子的旁邊，就著那盞燈看著報紙陪我們唸書，但我們可不能打瞌睡，否則媽媽手中的針線一放下，棍子就舉起來了，雖然我是男生，人家常說客家男人不做田事，都是不實在的，你看我們宋家的幾個男人，包括我爸爸和五個叔叔，那個不是從小做到老，我小時候放學回家也要沃菜、拔菜，所以一到晚上就難免會打瞌睡，是會被敲頭的。

照片二十四 肇源結婚照，郭愛珍翻拍自肇源紀念光碟 97/9/10

以前從這裡走到街上三民國小上學，照理要走三十分到四十分，因為我爸媽管得很嚴，放學如果太晚回家，竹掃把一抽可是打得很嚴重的，那時男孩子放學後總有很多可玩的，有時會和同伴去溪裡游水、抓蝦，我父母很厲害，回家後不動聲色，趁你不注

意狼狼用指甲往手擘上一扣，就漏陷啦，只要在河裡游過水，經過日頭一烤，泥巴和鹽分會讓你的手臂出現一道白線，其實教養小孩大部份是我媽媽在主導，教我們讀書也是我媽的責任，因為我爸脾氣很好，總是在旁笑著負責監督。

父親為人老實、敦厚，不善和人爭長道短，他在 24 歲時結婚，這個因緣是我爸到新港後在杉原株式會社當會計，我外公是當時農會的總幹事，兩家的長輩都認識，後來就結為親家婚後也曾在農會當過公務課的主任，不過還是因為我爸實在太老實，那時的地方士坤，有的很壓霸，會為了私人的利益而有不合理要求，與肇源梗直的個性不合，後來就不做了，丫公就說家裡有那麼大的一片土地要經營，而且身為長子更應該要回來帶著弟妹一起拓墾農場的事才對，至此以後肇源就完全把心力投注在自己的農場土地上，回到柑仔園，那時我爸在會社有學到種柑的技術，所以回來農場做事，以後就帶著弟妹成長，栽培弟妹不遺餘力，一直到分家、過世。

照片二十五　肇源全家福，郭愛珍翻拍自肇源紀念光碟 97/9/10

我爸他們兄弟的感情很好，我家就是他們兄弟聚會的地方，他們四個人的園子是互相交錯、相隣的，經常工作告一段落，四個兄弟就在這張椅子排排坐，以前也沒手機，但就是我爸一出現，兄弟就會一個一個走著走著就聚到我家來，四個人排成一排坐著天南地北，我爸在兄弟間地位很高，對兄弟的照顧更是沒有私心，而且對自己的家庭是全心全力的付出，我父親去世，他們兄弟哭得比我們當兒子的還慘。

照片二十六 經常排排坐著聊天的四兄弟，郭愛珍翻拍自肇源紀念光碟 97/9/10

明燕是宋濬源的最小女兒，她回憶大伯父：

肇源大伯，當時是因為車禍，腳受傷之後，身體就開始不好，所以就將其送到台北兒那裡，後來在台北過世，當時會把他送到台北不是因為這裡沒人照顧他，而是他很很喜歡在成功自己的家裡，但是他看到園子就會想做，雖然在園子裡做事對老人家來講很好，但他會做太多而不自 覺，所以還是送到台北和兒子一起，後來在台北過世。

安開的三兒子正源，回憶肇源：

我們這個大家族就大伯父那一房的兄弟最和，也最讓我們欽佩，大伯父與我那個大堂哥肇源都是很溫和不與人爭長道短的人，所以雖然有六個兄弟，到台東辛苦的開墾不是很簡單的，但從來沒聽說過兄弟有何爭執，連大聲吵都沒聽過，完全是因為我這個大堂哥為人無私又厚待兄弟，那時大堂哥在屏東幫人家做帳房, 當時屏東萬丹林家賣塩行, 日治時代塩行是有錢有勢的人家，是政府指定才有權利賣的, 相當於以前現在的專賣局一樣，因為很信任肇源, 所以派肇源去坊寮當掌帳房的工作，主人很放心把帳交給老實的肇源，當時肇源已經二十歲了，不但要賺錢養全家，身邊還帶著差九歲的信源，栽培他在坊寮讀書，後來也帶著信源搭船到台東去了；他若沒過世，雖然年紀很大身體不是很好，但他的記性很好，問什麼就可以答什麼，可惜……。

正源繼續提到大伯父番古在台灣光復後曾經返回屏東老家贖地一事，當時番古念念不忘家鄉土地，對他而言一個農人把土地賣了是一件非常不得已的事情，所以在台東開墾後積累的第一筆錢就是回來把祖產贖回來，沒想到：

大伯父番古在到新港之前，拿了三分地借了一仟元到成功發展，光復後曾經拿二萬元回到屏東老家打算要把三分地贖回來，沒想到親戚不肯，親戚表示相隔一、二十年幣值已不是二十倍可以換得的了，當時番古很生氣，大手一揮說：「地，不要了，就給你了！」，後來大伯父就拿那二萬去買自己的棺木木材（檜木近一萬元，牛車、腳踏車，風鼓，和做丫公(貴華)的風水，一次把二萬塊都用光，……那樣的手筆，讓大家談論了好長一段時間，因為那時在成功的優質土地一坪才一百多元，那兩萬元如果當時拿來買地，現在的宋家又會是什麼樣的情景？

番古先生自 60 歲起因子孫勤奮便不必操持農事遂留起鬍子，外表最大的特徵爲留著一綹美髯，成爲他的「註冊商標」。由於宋番古先生的好人緣，所以自 61 歲起，每逢歲數尾端爲「一」時，便有家人及朋友爲他辦理生日壽宴，當時在柑仔山上三合院前廣大的桯院席開二十餘桌、桌子和椅子都是附近鄰居商借來的，左鄰右舍也都主動前來幫忙，熱鬧景象成爲柑仔山每一年的年度大事。如此的習慣在番古過世後延續到番古公的長子肇源身上，每逢肇源生日，家中不論大小都會當成一件家族大事，從各地趕回來爲肇源慶生，所以肇源的生日隧成爲清明節以外家族聚會的重要日子。

宋番古先生於 83 歲時過世，當時不管是麒麟山或是柑仔山的人都自動前來送葬，在地方上蔚爲美談。

柑仔山的前身在日本時代是「杉源株式會社」，土地放領後現在是「富榮農場」，在當時的交通是很不方便，在無力買牛車代步時，得完全依靠雙腳上山下山行走，種植的工具與肥料都在新港買，當時的交通都完全依靠是人力挑擔，分家之後宋家兄弟和太太一大早就得挑著擔子到山下賣菜，後背背著小孩，肩頭擔菜，回來時肩頭的擔子也不輕鬆，一邊放小孩，一頭放菜和米，還沒分家時家裡有牛車，大家以牛車代步，若一趟路要到台東進貨，到了民國 34 年日本戰敗投降爲止，台東境內路段已全部完成通車，往北到花蓮公路班車僅通至靜浦村，港口至新社間未曾通車，新社以北依舊爲海岸天然道。自新港住南至台東街，中途則設有加只來(今嘉平)、(今豐田)、都歷、東河、隆昌、興昌、都蘭、加路蘭、卑南溪等十個停靠站，而且剛開始一天二班車，後來慢慢加開到一天五班車，當是是新港與台東沿途居民及貨物往來交通最重要的管道，但道路屬於泥土或碎石路面而且狹小多彎道，一趟下來搖搖晃晃得要四到五個多鐘頭，花費大約二塊左右的車錢，戰後因油料缺乏，民國 35 年即由公路局接收，對外的陸路交通以整修日治時代的「台東馬太鞍道」所完成的省道台 11 線「花東海岸公路」爲主，之後而成爲台灣沿海交通的大動脈[47]。

清領之後官方和後山之間有較多的接觸，康熙三十四年(西元一六九五年)之後前後山之間的交通也有南、北兩條水路以及其他的陸路，由北而南有沈光文所語的：「船隻惟候夏月風靜,用小船沿海墘而行,一日至山朝社（山貂社,）三日至蛤仔難(宜蘭)三日至哆囉螳(立霧溪口)三日至直腳宣(花蓮市)」,南路則從安平出發,「沿海邊而行至沙馬磯頭,水道十二更又向東轉行山背,當用南風，,迴蟒卒,老佛,大紫,高肅,馬間,卑南覓山,水道更,復至薄辦社,水道三更,沿海背向直至崇爻之石門港口,水道九更,另有沿著恒春半島的海岸線進入後山的通路:「瑯嶠山後行一日至貓丹,又二日過丹哩溪口至老佛,又一日至大烏萬社,又三日過加仔難社朝貓離社,至卑覓社」,雖有陸路,都只是人行步道,山路崎嶇難行,加上行經常有原住民出草,所以陸路鮮少有人行走,大多數人都靠船隻往來前後山之間。

新港道路指日治時代興建的「台東馬太鞍道」是台 11 線花東海岸公路的前身的一部份，早期本地對外聯絡,往來物資與旅客都得靠挑夫搬運，原來的海岸道路乃順自然地形,沿海邊或山腳，上下溪底的羊腸小徑,爲了物資與旅客的運送,大正六年(民國六年)(1917)才開始利用沿途居民以義務勞動方式,修築戰後公路局枋寮段於民國 36 年(1947)1 月增開台東到新港,新港到樟原的班車之後,花東海岸公路的路權即由原來的新港客運(日治時代的新港自動車商會)交由公路局接管,公路局的客運即成爲成功鎮居民對外交通的重要工具,此後一直到民國五十九年和民國 60 年分別成立「興東客運公司」及「安榮客運公司」之後,台 11 線省道路權仍歸公路局所有,新成立的二家民營客運公司只能行駛省道支線等偏遠的路線。

在客家人的社會關係裡頭，客家人非常注重親戚關係，且其關係往往盤根錯結，成爲社會構成的重要根據，因爲如此也反應出通婚領域的侷限，這樣的侷限不僅造

[47] 成功鎮誌地理篇　交通 p209~210

成族群規模的弱勢最重要因爲地理位置的偏僻，也讓客家族群在社會經濟上以農業爲主而且社會流動的不頻繁，尤其在日治時代那樣一個族群對立的年代裡，宋興文是宋家長孫，在大家族長大的他，對親族關係有很深的感觸：

我們客家人的凝聚力是很強的，但在某些情況下，姻親確實佔有很特殊的地位，分家後的兄弟往往會因各自得到姻親的支持而以對抗其的兄弟，像我們家，分家之後，會因為外公的關係而嘗試新的生意與工作，對我們不無影響，而且新形成的家庭與其姻親之間的關係會較原來的家庭更親密，這是很難避免的情形，尤其當長輩凋零後，若我們這一輩，再因為工作關係，台灣東西分隔兩地，不要兩代，新一代子嗣的婚姻所建立的親戚關係，將取代我們舊有的親戚關係了。在我父親還沒過世之前，我們家兄弟姐妹只要一家有事全族會到齊，而且每年會安排家族聚會，後來因為各自成家，家庭單位越來越多，也因為工作的關係，分佈在台灣的各各角落，甚至世界的各個角落，有時無法參與，也會電話通知，但最讓人擔憂的是我們子孫使用族語的情形，因為環境的變遷，族群的通婚，稀釋了我們族群凝聚的力量，我們家族裡因為婚姻的原因，家族成員已經徹底的種族融合了，有原住民、河洛人、外省人都有，這也讓我們下一代講客族語言的子孫越來越少，也越來越不容易教導，因為他們在家裡甚至到了學校之後都沒有可以讓她們使用的機會和平台，和父母之間、同學和同學之間都是國語交談，而且說實在的老師也不講，因為溝通真的不方便，越是這樣找理由，流失就越嚴重。

信源口述：

我第二代兄弟只有德有和德福不住在成功，一個住台中一個住屏東，因為伊兩個的地已經賣掉了, 雖然不住在這裡, 但我們兄弟還是很親，每有家族的大事, 或婚喪喜慶, 大家都會到齊, 尤其是每一年掃墓的時候都會回到宋家祭祠，宋家祠堂是在四、五年前做好的，把所有祖先的骨灰都放在這裡, 大概九十三年重建的，又修理過，目前安排有九十九個位置，, 將以後世代子孫的位置都安排進來了。

經過幾次的造訪，宋正源表示，宋家實際上是子龍和子鰲最清楚，因爲他們曾費心編修 過祖譜，所以宋家的遷徒經過，叔叔(子鰲)很熱心有記載宋家來台祖，這一本簡譜的文章是崇康寫的序，這本家譜能做成主要也是子龍大力幫忙，他有一本小冊子述明來台祖的經過，當時宋正源就是根據那本冊子，開始追查紀錄，可惜子龍也是這幾年過世，那時我載著他一家一家去拜訪，可以說這一本祖譜是子龍和正源一步一腳印一起努力而成，由正源載著子龍一個家族一個家族去詢問、去拜訪而得，正源追流溯源到長治的古厝，那是一棟非常漂亮很有紀念價值的古厝，很可惜前陣子也在子孫的要求下處份掉了，因爲後嗣太多人，產業也稀釋得沒有多少可以分，最後但還是分掉了。

正源表示，這本祖譜的文章是重康寫的序，想到長治來秀家族的古厝在子孫的要求下處理分掉了，讓正源想到本家三房萬龍承繼的古厝裡如果能好好保存，應該有很多的古董，包括舊時的碗筷用具，尤其是屋樑彫花原木，沒想到流浪漢入內遭到破壞，一些珍貴舊時代器皿已被一掃而空，不禁感嘆噓唏不已。

六、　移民者的信仰---伯公廟

台灣人對於土地公的信仰最爲崇敬，尤其是對離鄉背井的客家移民而言，不論原鄉源於何處，心靈上都需要信仰的慰藉，客家人稱土地公爲「伯公」民間以其造福鄉里，德澤百姓而稱其爲「福德正神」，所以有田頭田尾土地公的觀念，原則上是以一塊木牌當作香位，寫上「福德正神」或「福德」字樣，不少客家農家會自行供奉田頭伯公，所以在鄉間田野經常可以看到大小不一的伯公廟。

在宋家產業尚未莫落之前，位於現在屏東林森路與民和路交叉附近，有一座外型像墳墓式客家的土地公廟，石碑上刻著是在昭和五年（民國十九年），據宋正源講那是祖母邱氏太夫人和番古伯父（番古）挑石塊和水泥以雙手親手合力做起來的，圓塚水泥後面依傍著好大的一棵榕樹，旁邊還做了好幾張水泥椅子，以供祭祠者休息之用，後面還有一條水溝流過，那時這裡整片都是田地，據後世子孫表示當時這裡是宋氏太夫人邱氏每天早上都會去灑掃的地方，据三子萬龍小女兒淑琴描述：小時候我媽媽和我講，你丫媽，每天早上都會燒一鍋茶放在那個地方給過路的人喝，因爲那個地方當時都沒有房子，你丫媽要讓經過的人口渴時都可以有茶喝。

經入到廟內訪談到目前這間土地公廟的祝持傅漏報先生，他證實這圓頂塚形的土地公廟已經八十年了，一直到目前爲止，上面的水泥和石碑都未曾更換或整修過，尤其更特別的是後面的那一棵年齡更大的榕樹，地上的根盤根錯節，經過了那麼長的歲月都不曾將水泥圓頂撐裂，實屬奇蹟，原本供人休息的水泥椅還在，因爲經過多年雨水、泥土的沖刷，地形的轉變，水泥椅漸漸被泥土淹埋，所以徵得土地公的同意，就地淹埋，爲避免不知情百姓在上踐踏對神明不敬，就將神桌挪置其上，之後就早晚馨香至今。

照片二十七屏東番古與其母手創圓塚形土地公廟郭愛珍攝 97/10/30。

照片二十八 屏東圓塚形土地公廟外觀

塚型土地公廟的石碑是一塊珍貴的唐山石，石碑上刻著『南興庄福德正神香位』紅字，台灣光復後，附近移來了很多外省人在此搭屋居住，當時的本地人爲避免與唐山客起衝突，就漸漸不再來這裡祭祠了，祝持傳老先生想說光復後當時物質非常缺乏，怎麼這一塊珍貴的唐山石埤沒有被挖走，猜測可能原因是有了這一批外省客的保

護，讓這塊類似圓塚形的土地公廟得以留存到現在，提到與這間廟的因緣，廟祝傳先生表示大概是民國六十幾年時，土地公托夢給當時住在後面的傳生先，希望他能來主持這間廟，當時傳先生在豐田里還有一工作，他表示等這裡處理好就會過去，但還沒過去之前每天會來這裡燒上三柱香，傳先生笑談表示可能較有土地公的緣，所以二十幾年了這間廟都是他在照顧。

無獨有偶的番古自麒麟山將產業移到「柑仔山」，兄弟聚莊以後，也親自以石頭蓋了一座「伯公廟」，以做爲全村的守護神，對拓墾較困難的沿山地區或是移民初期的客家人而言，「伯公廟」是客家人一種強烈的精神需求與依靠，當客家人到新地區移墾面對來自各方面的壓力和不順遂時，自然會祈求神明的幫助，宋番古即爲家庄親手以石頭圍廟，後來民國七十幾年宋家和地方幾戶人家感念「伯公」對子弟的的庇佑，大家合資再整修改建爲目前的樣貌，沒想到也偶有香客特地到此焚香祝拜。

照片二十九 成功柑仔山入口的土地公廟，郭愛珍攝 97/10/10

七、 回首來時路

成功鎮位於海岸山脈中央偏南的東側，南距台東市約 50 公里，北距花蓮市約 100 公里，對外交通受到地形及位置阻隔與限制，不管前往花蓮或台東路途都很遙遠，而且附近的新港山一帶又是海岸山脈地勢最高的地段，所以不僅南北交通不便，往西通往縱谷、及往東由海上與外界聯絡都不方便，後山漫漫長路，在親朋友伴的招喚下千辛萬苦爲追求夢與理想而來，然而……這裡真的是最後的落腳之處嗎？

當我把心中的問題提出詢問宋家第二代宋信源時，他的眼光很自然的掃向身後的柑仔山，層層山巒，一片綠意，而信源臉上卻閃出一抹不經意的黯然，淡淡的說：

我可以確定我們這一代的根是在這片山上、這片土地上，可以說我的一生都在這裡了，十一歲來到這裡，在這裡成家、立業，多少的歲月，多少的血淚，不在這裡，我還能到那裡？所以在這裡我也建了「宋家宗祠」，我也建了「伯公廟」，我希望我留在這裡，但我的子孫……我真的不確定……，清明節回來祭祖時，我發現他們像客人一樣，宴席散了，人也就走了，他們有他們自己的家。

成功鎮走過後山初闢的繁華，如今在漁業蕭條下，鎮內已不復往日榮景。然而，其在歷史中所扮演的角色與深厚的文教氣息，卻是街口轉角隨處可見。在成功鎮裡，是沒

有所謂「族群的對立」的。客籍人士除了客語之外，也多能操一口流利的閩南語，從阿美族人口中也流泄出字正腔圓的河洛話，正因爲語言上的「不隔」，所以形成了一個「族群融合」的善良聚落。

濬源口述：

小一輩的在這裡（成功）已不好生活,他們國中之後必需到外縣市求學，現在的學校教育科目非常多元，小孩子所學學科在本地無法發展，所以只好向外發展,我的孩子都在西部工作了，等同於都已經分家了,各自管理自己的收入和生活，逢年過節時再全家回來看看我們，我們這一代兄弟還非常親，家族的婚喪喜慶往來非常的頻繁，因為家族大，而且都有往來很親密，所以我一年的紅白禮金就將近十萬元，除了孩子會給一些生活費之外,自己也還在種植生產，也不能單靠小孩，現在小孩子在外求生不易丫……

原鄉……在番古家族第二代、第三代、第四代曾幾何時已成爲一個偶而想起的記憶，宋番古先生在蠻荒時代來到後山，帶領子女辛勤地打造屬於自己的新天地，這支「以客爲家」的族群，在新港找到了適合的地方落地生根，企圖將「新港」開闢成子孫心中的新「原鄉」，由於孩子們的勤奮，也隨著個別家庭之經濟條件的不同發展，目前留在新港守著柑仔山的還是七十年前宋番古帶來的孩子----信源、茂源、濬源；長子肇源於民國九十六年去世，當筆者循著宋家族人遷移的腳步一步一步往前探詢時，深切的發現可以引述歷史的宋家耆老，亦多已屆耄耋之齡，如宋家信源、茂源、濬源，四房宋正源、宋家三房宋淑琴，宋德有目前年齡都已介於七十歲與八十五歲之間，目前尚能自己行動，耳目功能也還清楚，但發現再往下一代探訪的親族鴻溝漸深，和上一代的記憶與感情很難接軌，在溝通上殊爲艱難。而宋番古先生之長子宋肇源先生，去年八月以九十一高齡辭世，令人益發感到地方文史工作的記錄，必需及早進行，以能親炙長者，使文史記錄更爲真切。

這一份客族遷移的研究過程，我在九月二十一日第一次接觸宋家成員進行現場採錄，三位七、八十歲的老人由宋濬源的小女兒明燕帶領和訪者進行訪談，三位老人家瞬時之間打開記憶大門，由屏東到台東，從平原到高山，這樣的一個流徒的過程與歲月，讓七十年來辛苦的、有趣的、不平的記憶，一一傾泄而下，看著他們思緒一下深沈，一下興奮的跌進回憶的旋渦，談到開心的得意的，眉開眼笑，談到辛苦的心酸的，搖頭嘆息..... 這是一份很辛苦又很有意思的研究工作，我對客家很陌生，但開心有這個機會讓我進入這個研究領域，從研究訪談中及資料搜集中，不但獲得珍貴的知識，也因此與宋家結成好友，特別感謝一路陪伴我屏東市、成功鎮來回奔波的好友林耀雄先生，在採錄過程中以相機記錄下可貴的鏡頭，更感謝引領我進入研究領域的東大華語學系系主任 許秀霞 教授。

照片三十 打開塵封已久的古厝大門，林耀雄攝 97/10/30。

因爲研究的需要，筆者一家一家拜訪，而且將這一家提供的故事向另一家陳述，因爲共同故事被聯結而讓已經好久沒有細細聊天的的親人再一次的凝聚起來；有一次，我爲了能一探宋家將近百年的古厝，一連跑屏東跑了三趟，當正源好不容易聯絡上了三房堂妹後又因爲天色太晚，古厝裡沒有電而約好明天一早再來，正源也爲了不知多久沒有再進入的古厝，興奮得把要去車站接女兒回娘家的事都暫時按下，一心只記掛著：多久了！不知鑰匙還打不打得開？不知屋裡現在怎樣了？一連串的問題寫在兄妹二人焦急的臉上，當門一打開的煞那，所有的人往上看著屋頂傾泄而下的陽光，同聲嘆息，只見淑琴一手揪著胸口、眼眶泛著淚光大嘆：「心痛丫！」，筆者看著零亂沒有覆蓋安置的家俱、還擱在桌上的安全帽，心想萬龍的子女離開時，應該沒想到會離開那麼久吧！

照片三十一 進入古厝大家看著破損的屋頂 林耀雄 攝 97/10/30

不管是在屏東老家或是成功新家訪談時，幕幕都讓我感動不已，宋氏家族雖然分隔西東，但再高再遠的層山峻嶺都無法阻隔他們血濃於水的親情；由台東成功遷回屏東的宋德有，談起因爲自己年輕不善經營而失去父兄辛苦奮鬥而來的祖產時，內心因愧對兄長而在談話過程中頻頻拭淚，相對住在新港的兄長，對失去土地而遠走他鄉求生的小弟沒有一絲責怪，給予的是體諒與同情，每當筆者訪談告一段落要告辭時，再次回頭揮手，看到的是兄弟依然促膝侃侃而談，不捨離去。

這次的研究拉近了親族的距離，也讓年輕一代有機會以不同的眼光重新檢視自己的家族與處境，期盼他們回首來時路的同時也看到一條未來的美麗康莊大道。

第六章　閩客融合的見證人：王河盛先生

王河盛先生，民國十八年生，高等科畢業，閩南籍人士，妻爲屏東縣內埔鄉客籍人士。王河盛先生擔任成功鎮公職逾四十九年，從鎮公所、戶政事務所職員、主管，迄成功鎮鎮公所秘書任內退休，熱心參與地方事務，致力於當地文史資料的蒐集、記錄與著述，被譽爲「成功鎮活字典」。迄今已個別或合著有《台東縣史人物篇》、《成功鎮志：政事篇》、《成功鎮志：歷史篇》＜成功鎮原住民族譜＞＜臺東縣成功鎮軼聞＞、＜新港建港滄桑＞＜成廣澳史話＞等專著、文章；並經常受邀擔任各項講座、導覽等活動，是當地最受敬重的耆老。

由王河盛先生鼎力協助完成的《成功鎮志》，共分成「地理篇」、「歷史篇」、「經濟篇」、「政事篇」和「阿美族篇」以及「社會文化篇」六本專著，對成功鎮的文史保存，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王先生行事嚴謹，凡所經手之資料必工整謄寫、編寫目錄，是以四、五十年前的資料仍然保存完好，分類清晰，是進行成功鎮文史資料調查最重要的人物。王先生公職任內熱心服務鎮民，對待他人不分族群，退休後除了潛心文史研究外，不減服務熱誠，深受鎮民愛戴，是一位族群融合的最佳楷模及見證人。

圖一：王河盛先生（右）出示所保存資料，接受訪談。筆者拍攝，96/11/03。

一、　對不同族群互動之演變及看法

王秘書自稱是半個客家人，與妻結緣，便與客家族群結下密不可分的親緣關係。由於他歷經兩時代的變遷，擁有關懷人文的特殊胸襟、以及長期研究地方文史的興趣，因此，對不同族群的互動，自然有深刻的了解。

據王河盛觀察，閩南與客家族群在成功鎮地區，很少見過有何紛爭，擔任秘書期間，歷經三任的鎮長，也都是客家人。較早時期，客家族群與閩南族群遷入的人數大約各占一半，但到民國四十年以後，綠島人大量移民過來成功，所以到後來，閩南人較多。閩南族群中較多有錢人，而客家族群中較少很富有的，但是總資產額算起來，是客家人較多，客家人較勤儉、會儲蓄。

客家人較團結，雖然沒有聚居同村莊，但是平日較會互相照顧，感情較好，而且不只限於親族關係才互助，而是客家人與客家人，同族群的人都很互相，族群的凝聚力較好，而閩南族群較沒有這樣的觀念。

在成功鎮客家人的文筆較好，較突出、優秀，也較會讀書。像宋安邦、宋子鰲父子倆，漢學造詣頗深，精通漢語文學，是當地有名的文學家。成功鎮上的選舉，是不分族群的，不會計較候選人是客族還是閩南族，非常融合，不像有些鄉鎮，連買賣東西的對象，都有族群之差別，而且選舉時也常見閩、客族間的大車拼，但是在成功地區就沒有這樣因不同族群而起紛爭的現象。

光復後，外省人來，較驕傲，有的跟隨軍隊來的、或任職公務人員來的也有，國語比較會講，但其他的常識或法律常識，不如在地漢人，王河盛任職期間，部屬就有幾位外省籍科員，姿態較高，若有同仁講到幾句日語，那些外省籍科員就會一直罵。其中，有一位是憲兵排長出身的，脾氣壞極了，很難相處，之後王河盛去當鎮公所秘書，離開民政單位，他跟當時的主任不合，就被強逼退休了，但後來還是很思念舊長官王河盛。還有一位外省籍科員，後來調到台東市當秘書、民政課長，當時王河盛也認爲他不太好相處，但是，事隔多年了，最近卻會時常想到王河盛，常打電話來敘舊。

王河盛與外省籍人士相處，沒有族群的隔閡與差別，因爲他的母親也是在大陸出生才抱過來的，親姊夫也是外省籍，是日治時期的華僑，1895 年以後來的。王河盛的大女兒也是嫁外省籍，太太的三個姊妹也都嫁外省籍，是光復後才來的，這些外省籍親友與王河盛相處，很少有嫌隙，反而他們外省跟外省相處在一起才會口角，跟王河盛相處卻不會。現在也有許多第二代第三代外省小孩，也都和王河盛成爲很親近的朋友。

剛光復初期，那時較高高在上的外省籍，認爲在地人生活習慣與日人相近，他們同日人戰爭時吃足苦頭，所以很排斥日本在台文化。當時有許多是海防老兵退伍下來，較不會與人互動，現在老了還健在的，卻都已改變得很好相處了，所以，現今族群間的相處較無距離。

談到原住民，王河盛由於工作關係常和原住民有較多的相處與觀察，對原住民有相當深入的了解，常爲原住民抱不平，有人認爲原住民甚麼都不如漢人，但王河盛看法不同，原住民很善良，重情義富人情味。他們不分彼此，非常敬老尊賢，這是在漢人社會看不見的東西。雖然原住民較弱勢，但也有許多優點。

談起成功鎮歷史，就是一部原住民與漢人的交流史。王河盛對原住民有一份特別的關懷，在本篇描述他文史工作者特質中的第十二項有較詳盡的敘述。

二、　橫跨兩時代、話說歷史更迭

王河盛十六歲以前是身處日治時期的，他認爲日治時代較專制，執法較嚴格，但話說回來，日治時代也有「走後門」賄賂的，常會有人送東西給警察人員，酒家也會與這些「管區仔」交涉，過年過節送東西，警察較不會找麻煩，較會給予方便。日治時代的

警察權責很大，有的做壞事，警察說不辦就不辦，會辦的就一定會嚴辦，大家都怕警察。

王河盛回憶印象中的小時候，只知生活較艱苦，當時在戰爭，一切以戰爭爲主，東西用配給的，例如：米、布、豬肉….等等，百姓要用的必需品都用配給的，沒有私有的，人民很窮生活不便 。日治時代後期來台的日本人素質較好，在日本要考試合格的才能來台灣，所以水準較高，較能帶動現代化。但日本人比較照顧日本人，較通融他們自己人。被日本統治，當時大部分的人也是接受，無可奈何的接受，成功鎮此地較安定。

光復後，王河盛當時才十六歲，年紀輕，國民政府派人來接收，在鄉下資訊不發達，整個台灣的事情較不知道，在偏僻的台東比較安靜、較沒有壞的事件。

民國三十五、三十六年間，那段時期，剛停戰，日人剛走，政治不安定，社會無人管，很亂，呈現無政府狀態，社會秩序很差，流氓常聚集鬧事、賭博風氣盛行，當時酒家這裡有八間，社會風氣不好，後來，民國三十八年，國民政府遷台，實施戒嚴後，社會治安才漸漸好轉。一段時間，這裡有戲班來這兒作戲，戲班裡有流氓，吸收年輕人加入團體，本地很優秀的年輕人，被帶去喝酒，與戲班裡女孩一起玩，後來，有的就離開家庭，跟著戲班跑掉了，那些年輕人很聰明、很優秀，很可惜。王河盛以前一些很好的朋友，後來變流氓，深感惋惜。他回憶說：「當初，朋友也有邀約，也曾好奇跟去看看，後來自己覺得不妥，就不敢再參加了。」

那時的人較有良心，做生意有一定的利潤，較不會拿危害健康的東西來賺錢，不能吃的也不會賣；現在黑心食物很多，投機取巧的多，有錢賺就好。所以，比較起來，當時社會風氣壞，但是人心善良。

以前小孩上下學互動較好，可培養感情，路途再遙遠也都用走路上學的；現在小孩連近距離上學也用摩托車載，坐車用擠的，搶好位子。今昔之比，差異極大。

日治時期，法治觀念較好，但也有小偷，較少而已，當時在警察課服務，也是有小偷，強姦也有，而賭博最多。若被警察捉到，一定先痛打一頓再送法院，刑責較重。不同的是：當時小偷被抓，看到警察很怕，甚麼都從實招供，小偷都自招了，根本不用蒐集證據，警察好當；但現在卻截然不同，小偷比警察還壞，警察不好當。

這些是時代變遷產生的不同現象，值得深思探討。

三、　王河盛生平事蹟

在文史界，談起成功鎮，每個人都會想到王河盛秘書，舉凡原住民、閩南、客家、外省，甚至日本人的文史資料，王秘書均能詳細解說，走訪他家，總有聽不完的成功故事。

由於他的努力奉獻，深受外界盛讚，列舉如下：

深耕台東縣東海岸逾半世紀，對成功鎮近百年的歷史瞭若指掌，是成功鎮史活字

典、文史工作者，所以文史專家、學者不僅肯定他的貢獻，更盛讚他有如一個豐富的寶庫，是地方文史的活字典。

長期在地方服務，深刻瞭解基層人民的心聲。在成功鎮，走在街頭巷尾，鎮上小孩口中「叔公」「舅公」叫聲不斷，平日古道熱腸、關愛鎮民，是民族融合的實踐家、見證者。

鎮公所秘書誠如「師爺」的角色，在地方上通常由鎮長的親信，或是德高望重的耆老擔任，他勝任愉快，地方上的大小事務，他都如數家珍。

經常擔任地方文史實踏解說，美麗的風景據點，經過王秘書講解，添入文史的潤飾，更增添耐人尋味的豐富色彩。

至今仍退而不休，繼續爲先人立傳，爲阿美族編寫族譜，甚至還爲族中老人辦理生活津貼，可說是一位古道熱腸又關愛鄉土文化的耆老。積極蒐集撰寫「成功鎮名人傳及部落史」前鎮長侯武成讚譽他是：「比阿美族更了解阿美族的漢人」。

王河盛爲成功鎮留下史料紀錄，將散亂的歷史軌跡拼湊出全貌，讓後輩們重拾老前輩們披荊斬棘的步步腳印，功不可沒。

將邁入八十歲高齡的王河盛，於九十七年度，會同地方上有志一同的文史工作者，積極向縣府社會處申請籌組「台東縣成功鎮愛鄉文化推展協會」，主要是期望栽培年輕人，讓文史工作傳承下去。他表示，自己年事已高，協會成立之後，將會把畢生蒐集的文史資料48，傳承給有心人士，讓文史延綿不絕。

這樣一位胸襟寬闊、難得的地方文史學家，令人由衷敬佩。其特殊的文史工作者特質，值得探究效法。以下就其個人生平、家族史、文史貢獻、造福地方、個人特質、特殊事蹟等等，詳加敘述。

[48] 王河盛將平日蒐集的文史資料、地方新聞、文藝活動、人物介紹….等等，剪報及照片，分門別類，資料夾琳瑯滿目，關懷成功鎮大大小小之事。

圖二：王河盛先生平日勤於蒐集文史，剪報及照片均分門別類。彭歲玲拍攝，97/11/19。

四、　王河盛個人生平

1、生平概述

王河盛生於昭和四年(1929)十一月二十三日，基隆人，六歲即隨著家人從北部基隆搬遷到偏遠的台東縣東海岸成功鎮，十歲定居下來，日治時期，新港公學校高等科畢業後，擔任新港郡警察課直轄「保甲書記」，相當於現今的戶籍員及里幹事，開始當公務人員，主辦戶籍等業務，時年十五歲。而後台灣光復，因戶籍業務移交而轉至成功鎮公所服務，期間曾擔任戶籍員、戶籍幹事、戶籍課長等職，民國五十八年戶政改制，於是改任成功鎮戶政事務所秘書。民國六十二年經宋賢英鎮長延攬，出任鎮公所秘書至八十三年退休爲止，任職鎮公所秘書時間長達二十一年之久，任內共襄助三位鎮長主政成功鎮鎮務，著有成效，爲人稱道。

生性聰敏，記憶過人，在鎮公所秘書任內，參與編寫原住民族譜，憑著多年戶政專長及經驗與記憶，耗費十餘年時間，依據戶籍資料，經整理及查對等長期工作後，終告完成東海岸原住民族譜（全鎮阿美族部落的族譜），替全鎮十多個阿美族部落族人姓氏逐一建檔，使本鎮原住民各氏親族關係分明。由於此一族譜資料相當完整可貴，因而得到上級政府嘉許，也因對於原住民輔導工作努力負責，故於民國七十三年、七十七年兩度獲得臺灣省推行山地行政績優人員表揚。

退休前的十幾天，王河盛生了一場大病，歷經一場空前磨難之苦，胰臟潰爛像塊朽壞黑豬肝，一連兩次大手術，硬是削掉大半，腦海好似連帶也給掏空，癡呆健忘。原本被醫生預估存活率只有 30%，頂多活六年，但王河盛與病魔拔河勝利，如今自己笑稱已多活好幾年了。

從鬼門關走一圈，讓他深刻體認生命的意義，更珍惜早年一手建立的阿美族族譜檔案。大病初癒又參與原住民族譜後續計畫，撰寫部落史、人物傳等等，拖著病後殘弱身

軀，深入各部落探訪查證，生命的強韌性彰顯無疑，令人折服。

他並大量查證及研讀成功鎮史料，撰寫許多成功鎮文史紀錄。之後，鎮長侯武成借重他的長才，聘他擔任鎮志編輯委員會副總編輯，與國立中興大學歷史系教授王良行共同爲成功鎮編撰鎮史。王河盛認爲有了鎮志等於有了歷史，成功鎮的文化將從此生根。

王河盛熱心服務，尤其退休後除了擔任本鎮鎮志副總編輯及臺東縣史撰稿人的工作外，亦擔任公教人員退休協會成功鎮中心主任、臺東社教館附設老人大學成功鎮學習中心日語指導老師等職務，並且時常擔任文史課程的講師，又更顯得他退而不休，服務鄉梓的熱誠。

過去長期服務地方公家機關，即使退休後亦積極關懷地方文史，可以說不僅是一位關懷鄉土文化不可多得的長者，更是東海岸地方文史的活字典，實謂成功之寶。

2、求學經歷

六歲昭和十年（民國 24 年）跟著父母親來成功，剛來是住在海邊，會來到偏遠地區，是因爲父親原本在基隆做事，教人「殺魚」，說得好聽點，就是魚獲上岸拍賣後，替漁商處理魚的解剖與裝箱的工作。當時，新港漁港建於 1932 年，日本政府爲了促進漁業發展，從日本內地招募漁業移民到本地從事漁業。漁獲甚豐，必須處理後裝箱冷藏，利用海運銷往基隆，本地由於欠缺熟練處理漁獲之人，漁商就相中父親，由於父親的工作關係，於是舉家遷移此地。十歲時，父母搬到成功市區做小生意，殺魚工作由大哥繼承，現在大哥的小孩也繼續繼承，姊姊小孩也在做，這是漁港地區特有的行業。

當時此地中心國小是六年制（現在的三民國小，民國前七年成立）當時較偏僻的國小只有四年級，五、六年級一定要到市區來讀，六年畢業以後，這個地方有高等科（只有兩年制），民國二十八年起到民國三十四年只召六期，只有五期的人畢業。當時新港區（東河到長濱）只有一班高等科，不是想念就能念，一定要有學校推薦，優秀的學生才能到新港來就讀高等科。

王河盛就讀國小時，成績名列前茅，小學畢業後，順利就讀高等科，是當時此地第四期畢業的高材生。

3、從小工友到鎮公所秘書的任職經歷

當時高等科第一期第二期畢業時，日本在打仗，年輕老師都去當兵去了，第一期第二期畢業生都去當代課老師。而王河盛是第四期畢業，在他畢業當時，市區國小沒有教師缺，只鄉下有缺，但交通不便，而且在打仗，若到鄉下服務，出門太遠有危險性，況且鄉下學校也選當地孩子當老師，因此，那時他沒機會當老師。

之後，學校介紹王河盛去庄役場（現鎮公所）當工友，他看見同班同學在當老師，自己卻在當工友，心很酸，但後來也慶幸，這不是禍而是福；因爲，後來台灣光復了，先前受日本教育的，注音符號怎麼學都學不好，國語發音根本無法標準，所以那些日治

時代留下來的教員都是提早退休，有的更是不適任早早離開學校，反而王河盛平步青雲，一直任職公務人員，做到六十五歲屆齡才退休。

擔任工友的王河盛，後來得知有個職務，新港郡警察課直轄保甲聯合會有書記的工作（就是現在的里幹事），出缺招考，就去應徵，當時十五歲而已，就正式開始當公務人員，主辦戶籍等業務。但到了十六歲那年，台灣光復，保甲制度取消，所以，民國三十四年年底就失業了。

很幸運的，戶籍的工作，日治時代是警察負責的，三十五年二月戶籍的工作移給民政單位鄉鎮公所，那時警察派了兩個人過去鎮公所辦理戶籍業務，一個是日本警察，一個是原住民雇員，當時人手不夠，鎮長就想到王河盛，所以二月一日他就去接辦戶籍工作，恢復了公務人員工作。

這段期間，日本警察不到兩個月就遣送回家了，後來辦理戶籍的主管，經常換人，對戶籍外行，工作都是王河盛在做，所以三十六年八月他就當上了課長職務，王秘書謙稱，當時戶籍工作沒有人才，算運氣好，才會在短期間內就升官了。

五十六年戶政改制，鎮公所戶籍課改成戶政事務所，本來是鎮長兼任戶政事務所主任，戶籍課長（王河盛）是第一副主任，而警察副分局長兼任第二副主任。五十八年戶政事務所獨立，當時警察副分局長派任「主任」，而王河盛派任「秘書」，外行人管理內行人，感覺多有不順。

到了六十二年，經宋賢英鎮長延攬，才改任鎮公所秘書，工作是輔弼鎮長佐理地方事務。當秘書後，爲了增進中文能力，就經常看中央日報、讀者文摘，注意別人好的文章，能夠值得參考的王河盛就趕緊記起來，學習別人文句的優美。之後在寫工作報告、施政報告就可以參考別人好的文句。因爲要常寫提案、鎮長施政報告、鎮公所成果報告等等，鎮公所對外的報告，秘書都要執筆，所以王秘書的中文都是靠自學而長進的，不禁令人豎起拇指來稱讚。

當時台東縣內鄉鎮公所秘書很少本省籍秘書，都是外省籍秘書，因爲他們文筆比較好。而本省籍秘書，當時，據知似乎全縣就只有鹿野鄉秘書是第一位，王河盛是第二位本省籍的秘書。以前的秘書要黨部同意才能報，王河盛經鄭烈協助後，才正式就任成爲成功鎮公所秘書。大部分的秘書都是跟著鄉鎮長同進退，過去的秘書屬公務員，假設鎮長不用原來的祕書，縣政府會安排，改派其他同等職務的工作，而現在的鄉鎮公所秘書是機要職，隨鄉鎮長進退，沒有公務員資格也可以做。而王河盛歷經三任鎮長，從六十二年起擔任鎮公所秘書直到八十三年退休，任職秘書長達二十一年之久，並且成爲台東縣任期最久的鄉鎮公所秘書。

4、職務經歷

王河盛是一位在地文史工作者，日治時期曾任保甲書記，光復後曾任鎮公所戶籍員、戶籍幹事、戶籍課長、戶政事務所秘書、鎮公所秘書等職務多年（1944~1994）。

秘書卸任退休後，從事文史工作外，民國八十三年至九十三年擔任台東縣公教退休人員協會成功鎮聯絡中心主任（現任會員代表）、國立台東社教館附設老人大學日語指導老師任教八年、講解地方文史之授課講師及導覽解說員。

因熟諳地方掌故及人物，受聘爲成功鎮志副總編輯，專責編撰鎮志，與王良行、蕭明治合撰成功鎮志之政事篇及歷史篇，亦撰寫成功鎮名人錄、原住民族譜，及成功鎮文史相關論文多篇。

5、勤勉自學: 讀報練寫作

平時靠著讀報、看別人的精彩文章來充實自己，提升寫作程度，擔任成功鎮誌編輯委員會的副總主持人，自謙只有小學畢業，但他的功力早已超越社會大學的範疇，提筆撰寫也都不成問題。

女兒王芬玉也說:「爸爸從來沒讀過中文書，記得讀幼稚園時爲了念故事給我們聽，自己邊學邊教我們。以前受教育時讀的是「日文」，而日後的「中文」完全靠自己學；他看到優美詞句就記下來，逼著自己去投稿，那時候常於報刊投稿，賺稿費。他也常會打電話問子女，他想寫某一段話該用甚麼成語，寫作很仔細，一個一個字慢慢去斟酌，所用文詞不重華麗，而是貼切實在的描述。」[49]

王河盛勤勉好學的精神，令人佩服。

6、專長

王河盛曾於日治時期，在新港郡警察課任職時，向一位日警柔道高手學習，因而學得一身好功夫，之後在本縣教授柔道多年，現爲柔道六段，國家級裁判，多次在本縣或全國柔道比賽中，擔任裁判、審判委員籍及裁判長，對柔道活動之推展具有貢獻，也可謂公務員文武雙全的模範。

王河盛擁有柔道六段實力國家級裁判長，九十三年八月台東縣體育柔道委員會與日本天理甲賀柔道會簽訂盟約，雙方致贈紀念碑外，日本柔道會長也致贈紅白兩色的柔道帶[50]給七十多歲的六段高手王河盛，以示敬意。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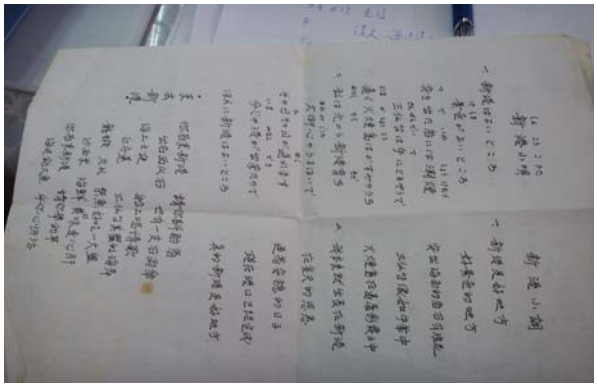
[49] 講述者王芬玉是王河盛的第三個女兒，採訪紀錄彭歲玲。

[50] 柔道帶的段數區分：白色代表爲上段，黑色代表爲初段至五段，紅白色代表爲六段至八段，紅色代表爲九段至十段。

圖三：王河盛先生（右）大女兒王芬英（左）愛好柔道。王河盛提供，94/2/11。

王河盛認爲學習柔道，除了運動健身外，從中也讓他領悟一些處事原則及人生道理，因爲一個招式動作要重複練習多遍，才能上場應戰，練習柔道可訓練耐心，柔道的精神，也讓他日後做事較不會半途而廢。另外王河盛還當過棒球教練，運動方面頗有造詣。

王河盛因受日本教育，並讀到高等科畢業，日文能力極佳，常被邀請擔任日文翻譯，擔任社教館老人大學日語班指導老師八年，現在沒教了，還是有很多學員會來找他翻譯。太太也是他的忠實學員之一，太太說：「他教學員唱很多日語歌曲，並且幫忙翻譯成中文，講解歌詞含意，日文歌經他翻譯瞭解意思後，唱起來特別有感覺，歌曲注入情感，就特別好聽，如「新港小調」中日文對照，唱起來很有意思。另外，他也將「來去台東」改成「來去新港」的，已成爲許多成功鎮民愛唱的鄉土歌謠了。」



圖四：王河盛先生親筆手寫中日文對照的歌詞。 彭歲玲拍攝，97/9/7。

五、 家族中重要人物

1、王河盛的父親

王河盛先生尊翁王金土(1893-1969)，清光緒 19 年(1893)2 月 29 日出生於台北縣樹林鎮，祖籍福建省安溪縣，先祖於鄭成功時代來台，其父王溪從事草蓆行商，據傳是一位個性溫和，篤實與世無爭，深得鄰里欽敬的好好先生。王金土自幼好動，個性剛直，14

歲時，因與大哥爭執，固持己見，不肯讓步，遭母親責罵，因而負氣出走。其後游走台北，基隆一帶，從事過木工、鐵公、泥工、礦工、汽、火車捆工、出海捕魚等工作。其在基隆市場從事魚販的二哥，眼見其工作不定，便引薦其到魚市場幫人殺魚，因其個性剛直，工作認真負責，不投機取巧，以及有足夠的體力在漁獲量多時，仍能應付爭取時間，適當處理講求保持新鮮的工作。因此老板安心把外銷日本的高價魚類的解剖、裝箱、冷藏的工作交由他負責，漸漸在魚市場內受到魚商的青睞，爭相僱用。[51]

昭和 7 年(1932)新港漁港完工，開港當初，本地未及時籌設製冰廠，以致漁業上最需要的冰塊，未能供應，影響漁獲保鮮。而且交通不便，當時台東大橋仍未建橋，本地往台東之道路只能直通富岡，車至富岡必須用人工搬運過卑南大溪，因此運費昂貴，如遇雨天，則無法過溪，漁民只得含淚將漁獲賤賣做鹹魚，眼見本地漁業的困境，日人於是加緊籌設製冰廠。

昭和 10 年(1935)，漁民們期待已久的製冰廠完工後，漁獲終於可以冰藏，利用海運銷往基隆。但是由於新港欠缺處理漁獲的熟練工人，運銷的情形不順利。本地魚商就往漁業先進之地基隆物色人才。

王金土因而被本地魚商相中而聘僱。昭和 10 年(1935)，王金土舉家遷來新港，嗣後不辱使命，漁獲運銷工作完全改觀，爲本地漁業帶來生機。轉移他處的日本漁業移民亦聞風重回新港，使得日人之漁業移民計劃得以持續，其人數在光復時約八十二戶，其中兩戶爲朝鮮籍。

第二次大戰期間，日本大量征兵。不少日本漁業移民被征調，而發生人手不足的情形，於是日人就開始僱用本地漢人及阿美族上船工作，逐漸培養本地漁業之人才。日本戰敗後，日籍漁業移民全遭遣返，幸好有這一批漁業人才，使本地漁業不致於中斷。

王金土由於常久在冰冷多濕的環境工作，健康受到影響，便辭去工作，經營雜貨店。先生性情淡泊、治家有方，民國 58 年 8 月 29 日逝世，享年 77 歲。王金土雖非政經風雲之士，但其在本地漁業因運銷發生問題，漁業移民外流，漁業前途岌岌可危之際，及時出現扭轉乾坤，使日本漁業移民回流，並持續引進移民，帶動本地漁業發展，對今日成功欣欣向榮的漁業，可謂是貢獻良多的關鍵人士。

德配何阿合女士爲一賢慧的傳統女性，相夫教子，敦親睦鄰，熱心助人，鄉里讚譽有加，民國 59 年膺選爲模範母親。長子王火生承其衣缽在本地魚市場工作多年，生前就一副古道熱腸的性格，曾參與地方義消工作，擔任本鎮義消分隊長十餘年，出錢出力犧牲奉獻。對於本地貧苦的鄉親，慷慨解囊不遺餘力，熱心參與地方公益，頗爲社會人士讚譽。長孫王坤輝現仍繼承祖業，在魚市場從事魚販及魚類加工業。

2、王河盛的母親

何阿合女士（1901~1974）生於明治三十五年(1901)三月二十日。

[51]孟祥瀚、王河盛撰修《成功鎮志–歷史篇》，（台東縣：成功鎮公所），頁 243

母親的親生父親是中醫，生一男三女，生父的朋友姓何也是中醫，只生一個兒子，母親是二女兒，後來約六歲時，當了何醫生的養女。「養父」爲別人擔保，別人做生意失敗倒閉，被連累，財產都被拍賣精光，生活很苦，養父過逝後，養母曾將母親送回給生母，但當時母親哭鬧，不願離開養母，遂與養母相依爲命。養母的親生兒子和媳婦很不孝順，也對母親極苛薄，有時要夾個菜，被瞪眼，不敢夾菜。逼得母親和養母一起離開家裡，起初，就像個乞丐似的，曾經在魚市場撿人家丟棄的魚頭，怕被人譏笑，快速用報紙包起帶回家煮來吃。甚至窮到，當時在基隆有運輸貨物的外國輪船，靠岸時，船上有餿水，餿水裡有吃剩的飯，她們去撈，撈起來時有酸味，就拿去曬，曬乾後煮成稀飯吃，非常可憐。

母親十二、三歲時，就到柴魚工廠做女工，有了微薄津貼，母女倆生活才得以好過些。十九歲時，遇見父親，父親當時在基隆水產市場做工作，與母親工作的加工廠近水樓台，兩人情投意合「相意愛」，母親表示要連同相依爲命的「養母」一起帶過去，才願意嫁給父親，當時父親說沒關係，一口就答應了。結婚後，兩母女生活才過得較好些。母親極孝順，一直照顧養母到老。

父親是個較外向好客之人，喜歡賭博，花錢較無節制。母親不同，生了老三王河盛後，就辭去工作，改成幫人洗衣，她總是一點一滴的將錢儲蓄起來。記憶中，她將累積的錢拿去換了一張拾圓的紙鈔，當時拾圓紙鈔算是不得了的大錢，那時的人也不懂得要寄放銀行，於是就把紙鈔縫在棉被裡，被王河盛見著，母親交代絕不可以告訴父親她偷藏積蓄的事情，母親勤儉持家的美德，支撐家計。

王河盛六歲時，養阿嬤過世，因王河盛從小就跟她睡，當天傍晚養阿嬤過世，隔天早上家人找不到孩子，原來小小王河盛躲進已過世的阿嬤被窩裡，還跟阿嬤睡一起過夜，可見嬤孫仔感情濃厚。阿嬤過世後，當年年底全家就搬遷到台東成功來，倘若阿嬤沒過世，應該不會遷來台東，因爲當時坐船顛坡很勞累，阿嬤年紀大了無法承受。光復之後，有回去幫阿嬤撿骨葬於基隆公墓。但路途遙遠，常常覺得祭拜不方便，事隔五十年，當王河盛五十六歲時，就決定回基隆將阿嬤骨罈遷來台東，遷移當晚，王河盛帶著骨罈借住旅館，裝紙箱用布包裹著，深怕別人嚇到，將她放床頭，也不敢外出離開，深怕被人誤以爲有價值的東西偷拿走就慘了。巧遇颱風暴雨，多住了兩天，路不通，之後是抱著阿嬤搭飛機回台東。阿嬤在世不曾住旅館、坐飛機，過世五十年後，才得以住旅館、坐飛機，很特別。

事後將阿嬤與父母親葬在一起，完成心中的一件大事。也向母親上香拜拜說，現在阿嬤可以跟母親一直聊天到天明，永遠陪伴她了。母親是在王河盛四十九歲時過世的，享年七十四歲。

母親以前過著這麼艱苦的生活，來到成功，省吃儉用存了六十元，當時一個公務員一個月薪水才二十幾元而已，母親用這六十元買了一間雜貨店的「店底」，開始改做生意。有人知道母親節儉有積蓄，就會來跟她借，母親不是隨便借人，是借平時較尊重她、較知己的後輩，母親認爲借錢給他就像在幫助他度過難關一樣，也不是爲了要利息，因

此，從來不打借據，她的意思是：還也好、不還也好；她的觀念是：「他不還我，那就是我前世欠他的；他現在不還我，來世他也要還我。」做子女的看人家不還錢，很著急，辛辛苦苦賺的錢，不還實在可惜。反而母親覺得無所謂。有一個做布行生意的，他違反森林法私自伐木，被抓去關，這個人有跟母親借錢，別人知道了後告訴她，她也不著急，借了就借了，沒關係。

原住民也會找她借，一般都是借一包等收成時還兩包，但母親看原住民生活不好過，總說沒關係，還一包就好了，就算沒還也就算了，不曾對債務人逼迫要債。當時做原住民生意的都很有錢，但她卻不會富有，就是因爲這樣善良的緣故。

父親過世後，雜貨店就換王河盛太太經營。父親在世時不肯讓母親在吃的方面太節儉，當父親不在時，母親極固執，在生活上節儉過度，隔日冷飯也堅持要吃，王河盛怕她身體不好，會將冷飯搶走，她總是說：以前若有這樣的東西可吃，就很好了。不管年紀多大、環境如何變遷，母親節儉的本性依然如此。母親很特別，平日喜歡穿傳統女性的衣褲，王河盛至今還保留著母親以前穿的服飾，懷念母親。

由於生父及養父都是中醫，生父的兒子也是中醫，從小耳濡目染，對草藥頗有研究。當別人有需求，她會告訴人家吃甚麼草藥，帶人家去採、去認識，把她知道的草藥知識傳授給別人。鎮裡有位大嬸，對草藥也很內行，但不同的是，當別人有需求找她時，那位大嬸是自己親自去採，採回來後搗碎給人家，不想給別人學，因爲她想賺紅包，倘若別人都學會了，她就沒紅包錢賺了。母親卻完全不同，她是希望把別人教會了，不需靠她。

母親過世後，有回王河盛太太跟鄰里間有點年紀的歐巴桑聊天時，講到身體怎麼樣，那位歐巴桑就教她採甚麼草藥很好，原來是以前王河盛母親教她的，草藥知識又傳回自己家裡來，很有意思。

母親還有一項優點，王河盛回憶說：「日治時代，有一些單身日本警察，都會到車站等公車，看上頭是否有派人來此地勘查，母親開的雜貨店剛好在車站邊，年輕的日本警察同我們很熟，常常到我們房間睡覺補眠，交代母親公車到時要叫醒他們。有時他們衣服破了，也是請母親幫忙修補；有時吃飯不方便，也會在我們家搭伙一起吃，大家總是阿姆、阿姆的稱呼母親。」對這些離鄉背井到此地工作的年輕人來說，母親成了熟悉且溫暖的依靠，善良的母親也樂意當這些單身漢的「阿姆」。

不只對日本警察如此，光復後，一些被派到這裡當警察的公務人員，或做其他工作的年輕人，也常因爲要等車，和母親聊天認識，由於當時沒有自助餐，外出的單身漢，吃飯不方便，母親都會照顧他們，漢人、外省人都有，連原住民也有，受過母親照顧的這些人，現在也已八十幾歲了，常與王河盛聯繫，很懷念母親。像前關山鎮長許瑞貴的父親許進益，當時也曾有一段時間，常出現在王河盛家吃飯。

有一位日本人名叫龜井良種，家族在日本世代都是當和尚的，日本和尚有兩種，一種是可以吃葷、結婚的，另一種則不行。他父親要他繼承衣缽，但他不想當和尚，所以

來台灣當警察。母親像對待兒子一樣照顧他，他總是阿姆、阿姆的叫，叫到王河盛都吃醋了。事隔許多年，母親已過世很多年，那位日人回來成功鎮，也上香祭拜母親，對母親有許多的追思、懷念。

母親唯一缺點就是太迷信，日治時代如果燒紙錢會被日本警察抓去打，但母親堅持一定要燒，很傷腦筋。當時日人信仰不同，硬要把台灣人皇民化，於是建立神社，將台灣廟裡神像燒毀（當時有的漢人會偷偷把神像藏起來），廟宇則改造作其他用途，並且明令不准燒紙錢，只准點香。日本希望台灣人要跟日人同樣信仰，並叫台灣人穿日服、說日語、改日本名字，徹底實施皇民化運動。

由於母親堅持一定要燒紙錢，因此，她每次拜拜時，王河盛就一定要在門外站衛兵，還好當時服務在警政單位，外面警察幾乎每個都認識，所以母親才沒有被抓去打。

母親的迷信，父親在世時會約束她，比較不敢太超過，但父親過世後，母親唯我獨尊，非常迷信，廟宇神壇人士，曉得母親頗具影響力，母親如果有去，神壇生意別好，因此，常拉攏母親，甚至半夜十二點，也邀約年邁的母親一定要參與，王河盛看母親身體不好、天氣寒冷，勸母親不要前往，迷信的母親非常不高興，曾有一段時間不跟王河盛講話、不拿兒子的錢，母親極不愉快，讓他很擔憂、很難過。

有位長輩（同學的父親）點醒王河盛，若不想清楚對策，將會失去母親，建議應該以毒攻毒，去拉攏神壇之人，不可反對母親。王河盛為了不要失去母親，至此之後，兩夫妻常常跟著母親一起去廟裡參與神壇活動，有一回，腳斷無法站立，母親令王河盛要喝香灰，說若喝完第二天就能站起來了，王河盛為了不違背母親，勉強喝下，結果第二天，還是不能站立，之後，神壇人士又對母親說：「那是因為你兒子心中不信，才會沒有療效。」因此，王河盛又被母親責罵一頓，真慘。

由於王河盛乖乖配合母親陪她去拜拜的做法，之後，才找回了母親的笑容。母親過世後，王河盛就不再參與神壇活動了，可見王河盛為盡孝道的犧牲與配合，令人感佩。

王河盛尚未退休前，參加宗教會議，就曾表示：看原住民的進步，心中頗有感觸，是宗教帶給他們很大的進步，生活的改善、文化思想觀念的改進，都是教會帶給他們的，政府對原住民的輔導也有，但教會比政府做更多，反觀其他宗教似乎就沒甚麼影響與進步。現今社會出家人，出現一些負面現象，有些是重財與利，尼姑開賓士，或要人捐獻大筆金額等等，現在社會不同於以往的樸實善良，時代越進步越令人擔憂。

由於親身的體驗及觀察，王河盛談起自己的宗教觀，認為自己對神是尊重的態度，比較沒有參與正式的宗教組織，唯一很堅持的是對祖先的祭拜，相當重視。

父親抽菸很重，死於肺癌，母親因為吸太多二手菸，也死於肺癌，所以，王河盛非常厭惡人家抽菸。年輕時同儕也曾邀他抽菸，但王河盛不會想抽菸，倒是工作關係，任職期間常常必須喝酒做公關，但退休後為了身體健康，就沒再喝酒了。

王河盛認為：長輩的優點對我們有幫助，但缺點也有幫助，因為我們看了長輩的缺

點後，會去思考，知道那是不好的、就不要學、不要去犯，由於親身兄長的前車之鑑，王河盛喝酒及用錢都會懂得節制，婚後也非常疼老婆，照顧家裡。因此，長輩缺點可以做爲自己的警惕。也曾有人勸王河盛出來競選鎮長，但他考慮到若參與選舉，家族中大大小小的事，都會被拿出來惡意的大作文章，容易抹黑說壞話，非常不好，所以就沒有意願參選。反倒覺得像現在兩位老人家雖過世多年，至今還非常多人懷念他們，感覺很好。可見王河盛的孝心。

3、王河盛的太太

鍾春娥女士，生於昭和十年(1935)二月五日，屏東縣內埔，客家籍人士。一二三年級讀日語，四年級剛光復初期，讀漢文（用客語讀漢文）五年級才讀國語，生一男三女，結婚後在家相夫教子並協助婆婆照顧雜貨店的生意。

她回憶自己的母親，爲了顧小孩、養豬、煮三餐，非常忙碌。當時母親懷孕，母親同她商量，由她照顧妹妹，母親去工作賺錢補貼家用，改天要嫁時，再多一點的嫁妝給她，因此，國小畢業後，沒有繼續讀書，沒多久，母親就過世了，令她非常難過。現今屏東的妹妹對王太太特別尊敬，因爲當初就是爲了她，爲了照顧弟妹，犧牲很多。

由於堂哥當時在屏東內埔鄉公所當課長，王河盛也是課長，經表哥的介紹才互相認識，王太太感念先生對她很好，對自己的家人也都很好，岳父很喜歡王河盛這個女婿，很多事情需要他溝通、協調，對王河盛非常信任。

王太太極佩服老公記憶好，甚麼都記得，頭腦裡的文史資料，如數家珍，好多人來請教他，先生都熱心的提供很多珍貴資料，但是王太太笑說：「不過，家裡東西放哪裡，如果問他，卻常說不知道。」由此可見，夫妻鶼鰈情深，王太太是王河盛的最佳助手、賢內助。[52]

圖五：王河盛先生與愛妻鍾春娥女士。王河盛提供，92/12/16。

[52] 講述者鍾春娥女士，採訪者彭歲玲。

六、　走入文史路的因緣--編寫原住民族譜

說起爲何踏入文史研究，王河盛會將時光拉回到最早編寫原住民族譜的歲月談起。[53]

日據時代，因原住民無文字記載，日本人將其日文片假名音譯做爲其姓氏，讓台灣原住民都有自己的姓氏及名字，而台灣光復初期，中央政府通令將原住民改爲漢姓，在政策趨使下，原住民只好改用與平地人相同的漢名。當年改名字時，多數人並未注意到這件事的重要性，姓氏經常隨意取，有的甚至全權交由戶籍登記人填寫，結果姓氏大亂，有的明明是一家兄弟卻分成好幾個姓的情形，造成許多後遺症。這種情況，隨著時間更迭及原住民遷居各地，影響愈來愈嚴重。親人相見不相識、甚至造成近親通婚的無奈事件發生。

民國七十四年間，花蓮原住民省議員倡議必須儘速編寫原住民族譜，釐正血統，恢復原住民的人倫秩序。省府採用了他的建議，請各鄉鎮市公所承辦人員分期辦理。民國七十五年底，王河盛當時擔任鎮公所秘書，有一天，台灣省科學博物館人類組組長阮昌銳[54]教授告訴他，成功鎮第一期的原住民族譜編寫進度十分落後，王河盛聽了十分吃驚，覺得即使不能名列前茅，也不能排名太後，於是他立刻去瞭解情況。

因爲以前曾擔任戶籍課長多年，對戶政十分熟悉，王秘書親自協助了四天，總算編妥了第一期[55]資料，順利交了差。第二年，他有了經驗，早早就協助承辦人員把進度完成了。第三年他索性去參加阮昌銳教授的講習，回來後自己獨挑大樑做了起來。王秘書自己也沒料想到，這一投入，就做到民國八十二年全部完成爲止。

在這段期間，王河盛協助阮昌銳教授在東海岸進行原住民部落田野調查，對本地阿美族的族系進行追踪，目標是制定一套有源可循的族譜。但一來戶政資料浩如大海，殘缺散失的很多，而且原住民的教育程度不高，對此事也不很關心，鎮公所發了單子要他們填，回收的份數有限，真是困難重重。

他爲了讓工作快些做好，王秘書親自出動，經常利用下班時間至戶政事務所去查資料，由於光復後在戶政事務所的經歷，使他在翻尋陳年舊檔時得到不少便利，而且昔日同僚對這位昔日長官的投入十分感佩，全力幫助他調閱有關資料。

也由於他在日治時代做過保甲書記（相當於幹事及戶籍員），對原住民人頭還算熟，而於是王秘書用最原始的方法，將原住民的戶頭一家一家填起來，老一輩原住民是甚麼

---

[53] 吳當，＜王河盛的文史歲月＞，《更生日報》2003.10.19

[54] 阮教授爲全省建立族譜計畫案主持人（會同省府民政廳溫技士蒞鎮督導）

[55] 第一期（民國七十五年）宜灣部落，第二期（民國七十六年）石雨傘部落，第三期（民國七十七年）小港-美山部落，第四期（民國七十八年）三仙里，第五期（民國七十九年）三民里，第六期（民國八十年）信義、和平里，第七期（民國八十二年）忠仁、忠智里。

輩分、哪個家族的，王秘書憑記憶大膽填入，然後再到部落去求證核對，結果居然不會太差，很多原住民很佩服王秘書比他們自己還清楚呢！

鎮內阿美族族人對王秘書非常信任及熟識，都很願意配合查詢，在他的努力下，鎮內各部落原住民（全鎮 2307 戶）的族譜全部順利完成，與仁愛鄉同獲全省最佳成績，也贏得了原住民的敬重。現在他保有這份成果的原稿，只要有原住民朋友需要，就免費印贈。有人說他比原住民朋友更了解原住民，實在是當之無愧。

民國八十四年阮昌銳教授又告訴他，有一項原住民族譜後續計畫，將原住民的出生、死亡資料重新校正，並撰寫部落位置草圖、部落歷史、重要人物傳、社會文化資料及照片等。這項工作本欲以原住民文史工作者爲主要成員，培養原住民同胞研究自己的文化資料，但負責成功地區的一位牧師遲遲無法著手，於是阮教授委請王秘書接手。

當時王秘書甫於民國八十三年退休，而退休前突然生了一場大病，動過兩次手術身體仍虛弱的他，爲了這項慢慢萌芽的興趣，他義不容辭的答應了，開使纂修「成功鎮原住民族譜」，並且在八個月內完成了這項艱鉅繁瑣的工作。

大病初癒退休後的他，再度與阮昌銳教授合作，一頭栽進文史領域，這一投入，就不曾回頭了。

七、　撰寫成功鎮文史

在這場大病及退休後的文史工作，給了王秘書很大的啓示：文史資料的建立極爲重要，重新拾回的生命，也讓他省視了自己生命的意義，他要將自己畢生接觸、了解的有關成功的各項史料，無私的奉獻給大家。

可是他未接觸過嚴格的文史研究訓練，憑著他的第一手資料當然不足，於是空閒時，他勤走文化中心，並蒐集各種資料。之後，一位日本研究生西村一之，在成功做了多年研究，常常走訪他。民國八十六年，西村一之知道王秘書的興趣與宏願後告訴他，中央圖書館台灣分館有許多成功鎮日治時代的資料，他得到了這個訊息，立刻前往挖寶，影印了許多日治時代的資料。後來他又陸續閱讀了日治時代台灣廳報，聽說「東台灣研究會」有許多文史研究，就又加入「東台灣研究會」，和一群文史工作者成了好朋友。

有了這些史料，王秘書跨出了寫作成功鎮歷史的第一步。他寫＜新港建港滄桑＞＜成功澳史話＞＜《麻荖漏文化節成果專輯》＞＜成功鎮拓展及漁村發展史＞＜成功鎮墾拓及聚落發展＞＜臺東縣成功鎮軼聞＞等作品。

在寫作這些文章時，他發現以前在戶政事務所及鎮公所的行政經歷，都成了他最好的第一手資料。對於覺得不足之處，他也常回服務單位查閱資料，大家對這位昔日的主管退而不休，而且有志爲成功留下歷史的精神都深感佩服，無不全力協助。王秘書回憶說「最感動的是，到各地去查核資料時，許多老朋友都立刻放下工作，陪我聊天，提供

我各項資料，那份熱情令人難忘。」這是王秘書平日爲人謙和、熱誠、樂於助人的最好回饋。

由於王秘書深入田野調查的文史研究方式，他發現：有許多史料仍留在民間，尤其他近年來研究各種專題，常在聊天中了解事情的真相，或是釐清了部分模糊甚至錯誤的史料。由於文史工作帶給他心靈如許的安慰，王秘書做得愈來愈有興趣。他的名氣也愈來愈響亮，凡是有關成功鎮的研究，無論學者或年輕人，都會來拜訪他、請教他。而他也都毫無保留的提供，爲的是讓成功的史料更完整，這份情懷令人敬佩。

八、　編纂成功鎮志

由於王河盛退休後潛心研究史料，也成爲各界諮詢的對象，他深感應有一套完整的成功鎮志，爲地方留下歷史。他向當時的鎮長侯武成提出這個構想，深獲認同。於是擬定計畫申請，很快就獲得上級審核通過，於是展開了爲鎮志而努力的忙碌歲月。

爲了讓成功鎮在歷史上留名，在鎮長侯武成及鎮公所研考葉麗琴積極奔走下，民國八十八年開始成立監修委員會，推動堪稱成功鎮空前文化創舉的鎮志編纂，鎮長侯武成特別推崇鎮公所前秘書王河盛對於成功鎮歷史文化及人物的蒐集不遺餘力，因此鎮誌的編寫，就由王河盛擔任編輯委員會的副總主持人，並聘請中興大學歷史系教授王良行擔任總主持人。

成功鎮志編輯委員包括專門研究東台灣阿美族的中央研究院副研究員黃宣衛博士、中興大學歷史系副教授孟祥瀚博士、台東師院社教系主任李玉芬博士、中興大學歷史系研究所碩士陳修平、蕭明治、葉瓊英等。

在籌辦過程中，鎮公所前秘書王河盛雖然年事已高，但是記憶力超強，娓娓訴說成功鎮歷年滄桑史；雖然因病纏身，但他卻竭盡所能，提供平日研究及蒐集之相關資料。特蒐集地方鄉賢人事資料，推薦十餘人之多，不分漢族或阿美族群。並介紹幾位對部落歷史知之甚詳，卻即將凋零的老人家，認爲這些老人家要儘快去拜訪，否則恐怕來不及。

八十九年一月十四日在辦理地方耆老口述歷史座談準備會議中，召集鎮內八個里里長，由王河盛先「講古」給里長們聽，請里長們回去之後分別提出五到七位耆老名單，於下次口述歷史座談會時前來講古，鎮公所將全程錄音，讓老一輩人所經歷的種種化爲鎮誌上充實內容，留給後代子孫體會的種種歷史故事。王河盛先「講古」從日治時代的種種一路講述到近代，由於發生地點都是大家熟悉的地點，幾乎每個人都聽得十分入迷，還不斷追問後續發展。

編輯委員會爲留下早期珍貴史事，八十九年一月二十三日正式舉辦地方耆老口述歷史座談會，邀集了八個里各部落耆老四十多人口述歷史，受邀者年紀至少在六十五歲以上，這些耆老其中有漢人也有原住民，齊聚一起「講古」，因此他們夾雜著華語、台語、日文及阿美族話，娓娓道出已經塵封多年的往事，清晰訴說當年地方鄉賢事略。原住民的耆老大部分都用阿美族母語或穿插日語來表達，由王河盛擔任口譯，耆老們訴說日治

時代部落生活點滴及許多禁忌，也談到橫跨兩時代差異的心得，編輯委員與耆老面對面溝通，直接感受他們的內心世界，一窺當時的原始風貌，這些史料題材，是鎮志編撰的最佳依據。

在辦理推薦地方耆老口述歷史中，口述歷史側重在文獻上沒記載，但確實對地方有貢獻的人物。王河盛表示，由於阿美族人沒有文字記載，許多史料都只靠口訴，因此在蒐集上有不少困難，但是現在不做，以後就來不及，下一代不認識自己的歷史很可惜。

王河盛回憶起撰寫鎮志的日子，感覺十分忙碌，也十分充實快樂。他擔任成功鎮志副總編輯，同時也負責自己所擅長的政事篇及歷史篇，這時他常年到各地蒐集的照片、紀錄的資料都派上用場。至於其他各篇，他雖然不負責主撰，但也隨時提供各種資料，協助完成。

王河盛主編的政事篇，率先在九十年七月完成，九十一年七月完成阿美族篇，九十二年二月完成地理篇，接著歷史、經濟、社會文化篇分別於 12 月及九十三年 2 月間陸續完成，這些鄉鎮沿革、先人披荊斬棘、以啓山林的種種故事，就在王河盛等文史專家的努力下，得以延綿流傳。

王河盛說：編撰及寫作雖然花了很多心血，但卻並不覺得累，因爲能爲成功鎮留下這些史料，有一種特殊的成就感，想起來就很快樂；可見他對文史的傳承充滿使命感。連教授們對王河盛在地方文史典故蒐集的用心及熱誠，都非常佩服不已，成功鎮志編纂工作在他的協助下，可說是事半功倍。

九、　一心為地方做事

王河盛認爲在基層服務，大小事均須用心處理，小事攸關鎮民生計，大事則會影響長遠的發展。因此，退休前，在任職鎮公所秘書期間，總是處處爲地方爭取建設，造福鄉里，爲鎮民謀求福利。而退休後，除了戮力於文史的研究傳承外，更絲毫不減爲地方、爲他人的服務熱誠。

＜任職鎮公所秘書期間＞

1、爭取設立水產試驗所

對成功有一份特殊的感情，就拿漁港前的水產試驗所來說吧！民國六十三年要選擇地點設立時，花蓮跟成功在爭，王河盛心想成功空有黑潮、夏季冷水潮流經的天然好漁場，但漁民一年捕魚的日子卻只有四個月，有時蘇澳及高雄漁民到成功附近捕魚，結果他們抓得到的魚，成功漁民卻不一定捕得到，這都是本地人捕撈技術及工具落後的緣故，王河盛決心爭取水試所在本地設立。

爭取過程十分有趣，花蓮派出了議會的議長，而成功只有派王河盛（自己謙稱只是個小秘書），在會上，王秘書跟水試所的所長大談「魚經」，不知道是對魚的了解很深，

還是表現的誠意感動了他，最後水試所台東分所就落腳在成功了。

水試所來了之後，果然幫了漁民大忙。後來，漁民們冬天補冬天的魚，夏天有夏天的漁具，而且無論白天、晚上，全天候都能捕魚，對整個海洋生態，也有更進一步的了解。

2、**造堤防**

鎮上瑣碎小事，也常需要協助溝通、解決。王河盛記憶很深的一件事是：三仙里內的三仙社區因爲地勢較低，民國六十四年夏天在颱風時風浪巨大、海水倒灌，民屋損壞十幾戶（幸好是白天發生，無人傷亡）上級的意思本來是要這些居民遷居他地；遷居固然可以解決住的問題，但他們都是靠海吃飯的漁民，遷到別處怎麼辦？後來王秘書堅持要造堤防，後來堤防造好了，水也不淹了，漁民又有魚可捕。

3、**檢舉越區採礦問題**

民國八十年，提出有關業者在成功鎮山區採礦問題，引起台東縣議會議長李忠憲高度重視，在會議中提出指責有外縣市特權人士在成功鎮採礦的不當，當時，縣府立即組成專案小組調查取締，經過照相、蒐證才把暗渡陳倉的礦區業者採礦權取消，關愛鄉土的王河盛特別擔憂採礦業者不但破壞自然景觀，甚至將地方好不容易才爭取興建的產業道路壓壞，水源也汙染了，後患無窮。

王秘書退休後，採礦問題依然陸續發生，但他總還是高度呼籲，希望有關單位重視這個問題，避免美麗家鄉遭受破壞。

＜退休後＞

1、**協助文史家做田野調查**

爲成功鎮志阿美族篇的編撰，王河盛協助做田野調查，他發現成功鎮是台東卑南阿美與花蓮海岸阿美的匯集地，早年阿美族人從大港口往南遷移，移居到成功鎮做爲分界，分佈於成功以北的阿美族人被稱爲海岸阿美，以南則是卑南阿美。他說，他們的穿著不同，卑南阿美的顏色以深色系爲主，海岸阿美則是鮮豔色彩，但兩個族群的人會在成功地區做交流。

他調查發現發生於民國元年的麻荖漏事件，就是海岸沿線各部落大團結，奮勇抵抗日人的勇敢史詩，值得留傳稱頌。

2、擔任戶口普查的尖兵

自民國四十五年政府開始實施戶口普查迄今，接著五十五年、六十九年、七十九年，王河盛均參與戶口普查，即使退休後，八十九年第五度的普查工作也不缺席。在第一、二屆時擔任普查所副主任兼輔導員，第三、四屆時擔任普查所指導員，第五屆時擔任普查員。辦理普查期間認真盡職，每屆都有受獎，其中在辦理第二屆時拿到銀質獎章，深

感榮耀。

他說，早年戶口普查和現今背景大不相同，由於以前交通不發達，會有交通管制或實施門禁，供普查員到住戶家中查訪，仔細清點人數；現在民主風氣放寬限制，白天前往查訪還不見得找得到受查對象，甚至有民眾不明白為何要接受普查，有的還會反問，查那麼清楚，將來是不是要加稅啊？王河盛已有歲數，還投入辛苦的普查工作，真是難得。

從訪查經驗中，王河盛會關心受訪鎮民有關家庭及經濟背景話題，深刻體會基層心聲，對台灣近來經濟產業及人口結構急遽轉變的全貌，得以充分體察。

3、擔任解說員

九十年四月台東社教館附設老人大學學員，與成功鎮社區老人學院學員在東海岸進行生態教育之旅，由王河盛解說成功鎮文史及風情，讓學員有深刻體認。王河盛為學員講解白守蓮、三仙台等地名由來、新港及小港的區別，以及後來更名為成功的地方文史。

九十一年四月台東老人社區大學的長輩學生兩百五十位到東海岸做學習之旅，參觀成功水生館，由王河盛擔任解說老師，老學員們參觀過程極感興趣，充滿學習與快樂。

台東縣公教退休人員協會共七十六人，在該協會理事長帶領下，進行東海岸知性之旅，參訪水族生態展示館、三仙台及八仙洞等風景據點，沿途均由王河盛擔任隨行義工解說員，熟悉東海岸文史典故的王河盛，詳述東海岸各據點的特色。

4、**擔任講師**

九十年十月台東縣成功區九十學年度國中小學新任原住民地區教師職前研習，讓教師們多認識原住民的文化和教育的政策。王河盛特別以「部落文化之旅」，將成功鎮過去「馬荖漏」的舊蹟以及地理及開發的過程，向教師們做歷史回顧。

九十一年九月成功鎮和平國小舉辦鄉土文史座談會，邀請王河盛到校專題演講，講述重點有成功鎮開發史、阿美族抗日事件等。

5、**協助培訓社區義工種仔**

九十一年七月為推動成功鎮歷史建築及再利用種仔培訓計畫，成功鎮公所結合博愛、忠孝等社區發展協會及新港基督教長老教會，舉辦社區義工種仔訓練營，王河盛主講「成功鎮墾拓及聚落發展」並帶領學員戶外探訪，了解歷史建築源由及地方傳說。

學員們未參加訓練營之前，對成功鎮印象大多口耳相傳，參與後，實地踏勘歷史建築，有助於了解成功鎮發展發跡的文史背景，王河盛深入而精彩的解說，令全體學員們印象深刻，尤其深入地方導覽解說，開啓學員們願意當社區解說員的興趣。

6、帶領學員深入社區

文建會委託台東縣鎮公所舉辦「歷史建築與再利用教育宣導種仔培訓營」，巡迴社區辦理歷史建築之美等推廣教育，邀請王河盛等文史專家經驗傳承，率學員瞭解地方歷史，影響社區居民對於建築保存的共識，爲成功鎮、甚至是東海岸歷史發展留下見證。

王河盛等文史專家率學員進行戶外建築及歷史地點參訪，從成功氣象站、東河舊橋、石雨傘、小港媽祖廟等鎮內重要地點，訴說自己小時候親眼所見及耆老訴說的點滴。

王河盛說，爲讓新港地區子地瞭解歷史，除了傾全力協助編撰成功鎮志，而帶領更多年輕朋友認識故鄉大小事，也是延續地方發展的重要關鍵，他覺得這是非常必須要做的事。

社區義工種仔培訓營歷經三天紮實的研習課程，最後選出五名優秀的社區種仔義工，於同年九月份，在王河盛帶領下，深入社區、部落演講，遇有原住民場次還特地請人同步翻譯，連七、八十歲阿美族原住民老奶奶都來聆聽，內容生動精彩。文史傳承工作就這樣往下延續。

7、**協助培訓鯨豚保育解說員訓練**

台東縣新港區漁會辦理鯨豚保育解說員訓練，讓漁民及民眾對鯨豚保育有正確認識，研習課程由中華鯨豚保育協會推薦保育人士擔綱，並聘請王河盛主講東海岸地方文史。

8、提供老照片訴說歷史

九十一年台東縣成功警分局在整理舊檔案時，意外發現部分日據時代照片，於是向地方耆老王河盛查詢歷史典故，王河盛協助提供許多日據時代照片，讓該分局完成所有歷史照片蒐集。泛黃的照片不僅勾起思古幽情，更詳實記載東海岸的治安歷史，王河盛說，蒐集老照片紀錄歷史極有意義。

圖六：王河盛蒐集的老照片中詳細記載了歷史典故。
彭歲玲拍攝，97/11/19。

9、**擔任社區老人大學日語班老師**

八十九年成功鎮加入教育部推動的「學習型社區行動方案」計畫，結合東海岸三鄉

鎮社教資源，促進地方文化發展多采多姿，於是成立「再造新港新願景—社區人文學院」設於成功鎮社教工作站，將致力於推動社區讀書會及發行社區報，擴大地方民眾學習及參與，並促進原住民、漢人族群融合，建立終身學習的書香社會。王河盛大力支持並擔任講師。

王河盛擔任日語班講師，他在台上上課，他的老伴鍾春娥在台下當學生，精神可佩。社區銀髮族學員專心投入學習課程，班上不乏多對夫妻檔，學員年紀最大及最小的相差六十五歲，個個學習興致高昂，求學精神令人敬佩。老師上課課前蒐集資料完備，並與學生互動，提高學習效率，深受學生們的肯定。

王河盛的太太表示，只要鎮民有需求，都會來找他翻譯，他是最佳翻譯官。

圖七：王河盛親筆手寫日語歌詞翻譯。

彭歲玲拍攝，97/9/7。

10、**協助阿美族後裔尋根**

原住民阿美族群「莎莉蕕」家族後裔，爲追本溯源組成莎莉蕕宗親會籌備會，得知前鎮公所秘書王河盛已著手整理阿美族人族譜多年，特別向其請求協助。王河盛對自己因年輕時從事戶政工作所紀錄之阿美族譜對莎莉蕕家族之重整頗有助益深表高興，並主動提供多達數十頁的整理心得給籌備會。此一族譜，對散居花東地區、乃至於旅居外地的族人認親絕對有幫助。

11、**協助不識字的阿美族人申辦補助**

從鎮公所退休的王河盛秘書，儘管已經從工作崗位上退下來，但是來找他的人依然不減，尤其對原住民的關懷照顧，他非但替阿美族原住民建立族譜，協助孤苦不識字的族人辦理各項補助及生活津貼手續，甚至於十幾位族人還放心地把印章交由他代管，全權委託他處理，他說：退休前辦公室桌內一直有十幾個印章要他按月辦理，沒料到退休後還是有一些老族人放心交給他辦，可見原住民對他的信任。

12、**協助日本博士生探訪東海岸史料**

日本筑波大學博士班學生西村之一，爲了瞭解日本和台灣漢人及原住民漁業發展淵源，赴成功鎮蒐集相關史料，在此後山漁港小鎮，結識王河盛，他熱心協助替他蒐集有

關東海岸原住民、漢人漁業發展史料，並說明，成功漁港初期是由日人闢建，後來才由漢人、原住民接替建設，當初漁業技術承襲日本人經驗，後來台灣漁民才加以改良，在王河盛解說下，讓日博生備感興趣，亦充分感受到東海岸民眾的熱情，更在王河盛引介下，認識許多漁民和原住民長老，讓他對台灣原住民人文及台灣東部漁業技術有進一步瞭解。

13、**帶領日籍長者成功懷舊**

一批日本關西、九州的長者，回到兒時待過的成功鎮，日籍長者在王河盛協助下，獲得父親在日據時代擔任新港支廳長的照片，令他感動的頻頻道謝。

十、　文史工作者的特質

1、使命感

王河盛自認爲只是在第一線，最基層的公務員，在鎮公所基層單位，人少、事繁，但每次只要想起是在爲家鄉—不是土生、但是土長的家鄉做事，就一點怨氣也沒有了。

不僅對成功鎮近百年的歷史瞭若指掌，撰寫成功鎮史、名人列傳及部落史，而且還爲鎮裡的阿美族原住民編寫族譜，王河盛說，這些工作現在不做，以後就來不及，將來他死了，這些珍貴的典故資料，將永遠淹沒，下一代不認識自己的歷史很可惜。他說：能爲成功留下這些史料，有一種特殊的成就感！

早年大家常不知道自己生長地方故事，也不知道故鄉的發展演進史，更不知如何啓口向外人介紹自己的故鄉，因此，王河盛認爲該爲後代子孫留下一些文化遺產！

2、肩負歷史人文的傳承、關懷鄉土

率學員進行戶外建築及歷史地點參訪，讓年輕朋友了解東海岸發展的軌跡，並肩負地方歷史、人文的傳承，這是關懷鄉土的具體表現。讓地方人都能知道故鄉的大小事，真心愛台灣。

3、嚴謹、不能錯、不馬虎

王河盛是修成功鎮志的靈魂人物，也是幕後協助完成的最大功臣。在編撰期間，他上山下海執行田野調查，還頻頻上台北找中央圖書館台灣分館調閱資料，蛛絲馬跡都不肯漏，他說「撰寫鎮志，最大的瓶頸在於史料蒐集和查證功夫，尤其是照片的蒐集，彌足珍貴」王河盛手邊保有兩百多張老照片，有的是自己的收藏，有的是家鄉好友提供，有的則是向外人買來的。他指出「幾年前，原住民朋友很願意分享給文史研究者，現在都不肯了！因爲過去很多研究員借了不還，壞紀錄太多，害了往後的有心人，在史料蒐集上困難重重。」他查證史料的嚴謹、不馬虎，是文史研究者的最佳典範。

4、不拖延，做事提早完成

九十年二月，王河盛憑著印象、竭盡心力向各方蒐集舊史料、老照片，再加上各單位熱心提供資料，使得原訂於九十一年二月出版的台東縣成功鎮志政事篇，提早一半時間完成定稿。

當時年紀已七十二歲的王河盛說，鎮志編撰不僅要蒐集正式史料，也要探訪稗官野史，就因他年輕時喜歡聽老人家說故事、聊天，所以他對日據時代官廳資料仍有印象，因此成功鎮誌政事篇才能快速定稿。

5、**認真熱忱感動後輩**

台東縣政府旅遊局遊憩課員葉麗琴，九十三年獲選模範公務員，她表示：在地文史工作者愛鄉愛土，都好認真、好執著！就是因爲接觸到這麼多疼惜台灣鄉土的前輩，深受感動，因此，讓她愛上了台東這個第二故鄉。

她表示自己和觀光推展工作結下不解之緣，是因爲當時曾經跟隨秘書王河盛編寫成功鎮文宣，走訪在地景點、收集文物，受到王河盛熱愛鄉土、認真保存在地文化的精神感動。之後，她轉往縣府服務，亦秉持這樣的精神，到各地實察、積極認真的爲鄉土奔走，一步一腳印的感受在地風情、並整理出最正確的資訊，讓更多人認識台東之美。

6、**積極**

成功鎮長宋文英任內，就非常感謝老秘書王河盛，隨時給他的協助指導，甚至只爲了一紙公文，而整理出很多重要且相關的法令來，讓他深入了解政務，積極快速的處事原則讓人足以信任。

在新舊任鎮長交接時，通常秘書任用人選最受注意，但王河盛始終都是最佳人選，不會因爲新任鎮長的人情壓力、或因政壇黨派選舉恩怨所影響，政壇人士認爲，續用王河盛秘書，是明智決擇，致使各項地方建設，不致因鎮長易人，導致青黃不接。

7、認真、默默耕耘

王河盛是一位堅持完工、如期完工的好楷模。九十二年文化局長林永發得悉王河盛默默爲阿美族編寫族譜，專程探訪，肯定他是一位關愛鄉土文化、不可多得的長者。對資料蒐集相當用心，成功鎮剪報及新舊照片資料很多，積極用心的蒐集地方文史，足爲後輩效法的楷模。

圖八：王河盛勤於蒐集成功鎮地方新聞剪報。彭歲玲拍攝，97/11/19。

8、分享

王河盛對成功鎮的歷史，瞭若指掌，他分享成功鎮開發史，毫無保留，他說「我能帶給大家喜悅，自己也喜悅」。由於他日語能力踏實，閱歷又豐富，無人能出其右，「活字典」的封號不脛而走。日本人越洋來討教，台灣歷史學者向他請益，就連大學生繳期末報告，也央著要王爺爺幫大忙，台灣史學術研究領域中，他也幫了好多有心人圓了博士美夢。編撰的原住民族譜，王河盛每一戶都送給他們一份自己的族譜，讓他們參考傳承。

9、熱心助人

民國九十一年曾經有一位七十多歲日本婦人松井千鶴子，專程來台，尋訪她父親早年在新港庄（成功鎮舊稱）的事跡，在遍訪不著之際，在鎮上巧遇王河盛並說明來意。記憶力驚人的王河盛，先到成功鎮戶政事務所借調檔案，確認松井父親的年代與身分後，再返回家中查閱他所建立的文史檔案，順利找到相關史料和老照片。

通日語的王河盛仔細述說松井父親的陳年往事，原來她父親早年在新港庄擔任區長（相當於鎮長），當年他對建港有很大的貢獻。松井獲悉父親當年往事，不禁感動得熱淚盈眶。

10、記憶力超好

他們在玉里開會做研究討論時，年輕人都是用電腦打的，王秘書是用手寫的，很多學術界人士，他們說還是老公務員比較牢靠，做得比較好。

現在戶政事務所都電腦化，以前沒有電腦化的時候，幾乎天天有人上門詢問，電腦化後也有找不到資料的，以前女生冠夫姓、改姓改名，電腦就找不出來，我就記得他們的名字，比電腦還厲害。例如兩三年前有一個因爲繼承問題，找不到三男（夭折），不能辦繼承，因爲電腦化作業在輸入時也有漏打的，也有裝訂錯的，王秘書一個一個去翻，核對出生年月日，後來就找到了，看他高興王秘書也高興，他們開玩笑說：幸好王秘書沒走，還活得好好的。

11、惜情、實在、重情義

珍惜兄弟情，爸爸結拜兄弟來玩，或親戚堂姐妹們來訪，都會翻拍照片給他們，王秘書非常惜情，很會保留東西，讓東西存有歷史價值。對待他人，不是因為有錢有勢才攀交情，反而有錢的不敢去，是個重情義的人。

有的公務員退休沒有人要理他，鎮內阿美族族人對王秘書非常信任及熟識，原住民都喜歡和他聊天，老照片肯拿出來分享。部落踏訪時，嚇壞很多人，原住民嚇一跳，因為傳聞王秘書過世了，後來覺得老長官還在真好，有事還可經常請王秘書幫忙。

王河盛常懷念及尊敬日治時期的老師，她回去日本也在教書，但老師說唯獨當初在成功教過的這些老學生還會記得關心她，令老師覺得很欣慰。還有一位最疼愛王河盛的日籍老師過世後，他也曾到日本去點香拜拜，他和當時教他的日籍老師都保持聯絡，極重情義。

12、關懷弱勢原住民

王河盛有許多知心的原住民朋友，過去由於工作關係常和原住民有較多的相處與觀察，對原住民有深入的了解，對原住民有一份如同親族的親切感。

也因為了解過去許多原住民曾被漢人歧視、吃過虧，因此常為原住民抱不平，對原住民有一份特別的關懷。

那時生活不方便，漢人來時帶來一些生活必需品，較現代化，像火柴、種子、鍋子，原住民對漢人很好印象，因為對他們來說是帶來方便。漢人牟取暴利，一支針、一盒火柴就換一包米，漢人帶來種子、耕種方法，他們覺得向漢人學，覺得有受惠，但漢人受惠較大，因為有暴利，利潤很高，但原住民還是願意，雖然很吃虧，但他們覺得方便就好了。

不曾衝突過，原住民很善良，不會去懷疑甚麼，認為你是朋友，就信用你，就算被占便宜，他也願意，而且不會去理會另外開更好條件的人，不會因為更有利而去換別人，非常信任，重情義富人情味。

有人認為原住民各方面較差，較原始，例如迷信：很多忌諱，他們最討厭打噴嚏，例如竹筏拉好準備要出海捕魚，漢人故意捉弄，打個噴嚏，他們就認為百事不利，就回頭不出海了。以前較落伍、生活習慣較不衛生，生活條件不好，跟不上漢人，衣服較髒、不洗澡、家庭裡衛生較不好，但他們有很多優點，社會秩序相當好，對長輩的尊重、部落的規矩相當守法。古早時候，無政府管理，每個部落就像一個自治國一樣，所以定下來的規矩，大家都會去遵守，較不會反抗。現在的年輕人，看不起老人家沒有受教育，以前沒有學校，甚麼都向老人學，所以很尊重老人、很聽話，百依百順的服從。

阿美族還有年齡分級制度，小時後親眼看見，豐年祭時，部落裡的長老（一個部落約五、六個長老），看了不順眼，生氣就一人拿一根棍子，打次一級的中老，中老打初

老，初老打壯丁，壯丁打青年，青年打少年，打到少年時打上百下了，被打大家沒話講，非常服從。祭典時，長老都坐在那邊吃，年輕人打點一切事務。現在是反過來，都是老的在做，年輕的在納涼。這就是時代變遷最明顯的不同。

有人認爲它們就是愛喝酒的一族，阿美族以前沒種水稻，都種小米，七月收成時，若豐收，會將要吃的東西份量留下來，剩的才釀酒；若收成不好，就沒酒可喝了，因爲市面上沒人在賣酒。喝酒在祭典時是神聖很有意義的，拜祖靈或慶典時才可以盡情喝，平日沒得喝酒醉。會喝醉是後來日本人及漢人來之後，才釀酒賣給他們，尤其日本人來此地，他們需要低廉的勞力，就拿錢請他們工作，原住民有了錢，就喜歡買酒喝。但天主教較沒禁酒，真耶穌教是完全禁酒，完全禁檳榔，完全戒菸，成功鎮三民里有三分之二是信耶穌教，有的人戒菸一輩子都戒不掉，但當時四、五十歲的人說戒就戒，菸、酒、檳榔三樣都戒，非常了不起。

他們有優點，是母系社會，男生要嫁到女生家，相較於漢人，漢人被入贅是沒面子的，但當時的原住民被入贅才是有面子的，若女生中意哪個男生，她會主動示好，要到男方家舂米、煮飯、幫忙做事，住在男方家學習溝通等等事情。有位原住民耆老得意洋洋回憶說，年輕時候的他很搶手，同時有五個女孩喜歡上他，爭相搶著去他家煮飯，這麼多女生怎麼辦？他說幾天就淘汰一個，幾天就淘汰一個，最後挑選上的太太，，他就跟這著她去女方家，並且經族長許可後才結婚，不是很隨便的。如果沒有女生追，還沒結婚的男生，平時晚上吃飽後，就得到聚會所，現在的活動中心，要在那邊睡。若部落有事情，都必須去做義務勞動，被人差遣。若被人挑選入贅，就不用過被人差遣的單身日子了。有的人到三十歲還必須在聚會所睡，那就很可憐。

男生被入贅後，他們的房子都是長方形，男生進出不可從大門，只可從小門進出，睡覺都是通鋪，沒隔間，睡一整排，男生如果被嫌偷懶則會被休掉，女方會把男生帶來的東西放在小門旁邊，等男生從外面回來看見了，鼻子摸著就轉頭離開了，都不會吵架。王河盛辦戶口多年，每次辦離婚案件，漢人總是怒目相視不甘願，而原住民不會，反而笑著辦手續，非常樂觀。有時不是夫妻不和，而是女生長輩不喜歡，而被迫離婚。在女方家，男生不能管自己親生小孩，但男生可回到自己家，可以管姊妹生的小孩。財產只有女生可繼承，男生若生病，要回自己家裡醫治，過世也是回自己家埋葬，若太太過世也得回自己家，男生家一定有義務養回到家的男人，要照顧他到老，不會餓死。不像現在，連自己父母都不養。阿美族語言有阿嬤的稱呼，就沒有阿公的稱呼，因爲早先不曾與阿公住一起。

但公共事務的外務都是男生承擔，如部落的統治，頭目都男的。之後，基督教認爲這樣的婚姻制度不理想，應改成跟漢人一樣的娶妻較好。因爲男生到方家，很容易離婚，男生較不會忍耐，有時一個家庭換好幾個爸爸，是很平常的事。

有人認爲原住民甚麼都不如漢人，但王河盛看法不同，以前負責戶口調查時，親自到部落調查，晚上都住在頭目家，和他們一起睡、一起吃飯，差點娶了原住民女孩當老婆，媽媽不同意這樣的婚事。王河盛二十五歲才娶妻，那時的人約二十歲就幾乎都結婚

成家了。由於相處較密切，發覺其實他們的長老們是很具有智慧的，做人做事講誠信，不會騙人，不耍心機，約定的事情一定都很守信用，很樂意幫助人家，不像現在的原住民年輕人，好的沒學，都學壞的，跟以前是截然不同，所以覺得自己被原住民同化一樣、覺得他們很親近。當時頭目四、五十歲，和王河盛年紀差距很大，他們視他如小孩般照顧，到後來還被許多年輕一輩的原住民誤以爲自己是親族的阿美族同胞呢！自己視長老們像可學習的前輩，過去是日本教育知識較高的長老，做公務人員的，光復以後，因爲華語語言講不好，都幾乎辭去公務員回家，很可惜。可以跟他們學習的地方很多，尤其是開始做文史工作以後，民國八十三年退休後，發現成功鎮很多文史沒人整理，因此，再度回去部落裡找老朋友，跟他們聊天，做田野調查，大家都很高興，工作放下協助做部落史研究。

多年來，和原住民一起生活過，發現他們有許多優點，常替他們感到不平，過去常發生漢人與原住民，以物易物時，當時漢人有句話說：「番仔若會穿褲，咱人就走沒路。」倘若他們會「開化」，漢人就騙不到他們，無法生存，沒地方躲了。

當時原住民穀倉裡的儲存的穀子，就是財產，如果繳稅金….等等，要用到錢，就會拿穀子去賣生意人，換錢來使用。光復後一段時間，連連颱風，沒有收成，又乾旱，穀倉裡沒穀子了，沒有得吃，只好向漢人賒借，借一包要還兩包，又還不起時，就變四包、八包，有時漢人米商怕原住民不還，田裡稻子還沒熟黃，就趁早去差人去收割抵帳，說幾斤就幾斤，也不過磅，跟商店賒東西，計多少就多少，常常吃虧。有些漢人有時會在秤砣上加鉛，偷取斤兩，也曾聽說有米商，原住民不曉得還帳時拿回借據，又被漢人擺一道需清還第二次。還有的印章曾被代書拿去蓋借據，送到法院，後來還不起去自殺的也有。

日治時期，建新港經費不足，日本人也是叫原住民超過工時的廉價勞工，每天延長做十二小時，給很少的工錢，晚上點夜燈工作，日人叫他們做工作要用跑的，暑熱時期，跑不動，監工的日人叫來罰站一整排，用扁擔打腳，當時的原住民是沒穿褲子的（只圍布到膝蓋），痛到跪下去，王河盛親眼見到，事隔六十多年，責打聲猶在耳邊，很沒人道。若做得快，日人會把他們叫來排一列，一人賞兩支菸，很可憐。開成功鎮所有道路及維護，也都是原住民義務勞動，一直到民國四十年，才由公路局去管理道路維修，漢人只管享用，都是原住民勞動。

直到太平洋戰爭，漢人才有加入義務勞動，不太公道。日人將原住民當苦力、沒當人看，王河盛從小看原住民被欺負，親眼看見並曾深入了解，不像一般平地人，很看輕原住民，因爲原住民不重衛生習慣，也沒廁所，到海邊去上，用竹片擦屁股，生活條件不好，人們只看見原住民壞的部分，好的優點沒看見。

原住民他們不曾相告，當時成功鎮只有三個國小，忠孝國小（位於小港）民國前八年完成的，建校六年以後才有五、六年級，三民國小民國前七年才完成，建校二十六年以後才有五、六年級，所以當時五、六年級要走到小港才有得讀，這邊的人要讀也要走到小港去讀，都歷國小民國元年建的，只有四年級，到光復前四年時才有五、六年級，

當時他們也同樣走很遠的路來讀書，原住民要上學前都先到聚會所集合，大的帶小的上學，放學也一樣。部落裡從小就學會大的照顧小的，小的會尊敬大的，所以長大後，很少有磨擦，感情很好，自然不會動不動就相告。

原住民他們很尊重長輩，王河盛六歲就來，親眼看見年輕的原住民看見年紀大的長輩（雖不是自己家的老人），從山上撿柴回來，或從田裡回來拿著東西，年輕的會趕緊幫忙拿並送到他家去，不分彼此，非常敬老尊賢，這是在漢人社會看不見的東西。

十一、 擔任歲月的見證人，訴說成功歷史

王秘書一談起成功鎮，就有說不完的的歷史，他就像一位歲月的見證人，聽他口述歷史，比看歷史書籍還精彩。以下做些摘要，將對成功鎮有所了解。

新港漁港，日治時代日本人本來想把成功鎮興建爲大商港，但爾後因日本考量經濟及政治因素，一度停工才轉變爲漁港，否則台東的繁榮區域將往北移動。

民國二十四年剛到成功，此地沒有電、自來水沒接通，街上只有牛車，人們住草房、走石子路，生活十分荒涼。後來成功慢慢建設起來，人們生活條件改變了，像住家，就由草房、板房、瓦房到樓房，現在臨海的原住民，還流行蓋別墅。人民注重住的改善，實在是生活有需要，因爲我們東邊就是太平洋，颱風來時，一點屏障都沒有，改善生活就從能擋風避雨開始，也是很自然的事。

多年來，東部雖然逐漸開發，但感覺中，進步還是很緩慢的。以交通來說，海岸公路舖柏油是一段一段做的，從台東舖到成功，居然舖了十年。人家稱東部爲「後山」藏在山後的偏遠之區，並非沒有道理。

成功就是一個人情濃郁的小鎮，他一半以上的居民，是從花蓮「大港口」及台東馬蘭遷來的阿美族山胞。除了日據時代及光復後幾年間，有比較多平地人來此開墾，使成功人口增加外，近二十年來，它的人口一直維持在二萬人上下。民國四十年至五十年代期間，綠島有不少住民過來並買地置產，這使成功鎮地價不斷上漲，可以預見，他們將是成功的新住民。

王河盛說成功氣象局成立前，曾發生原住民與清軍戰爭，因遭軍艦砲擊，阿美族部落遷移至現今三民里，而舊部落則已被海侵蝕沒入海中。東海岸阿美族是清軍攻擊主要目標，也使得許多戰役在台東地區發生，漢人才得以到此偏遠地區落居。

王河盛說，「成廣澳」是漢人移墾至東部海岸歷史的開端，經日本統治後，在現今的成功鎮市區另闢「新港」，成廣澳於光復後才改稱小港。

王河盛說，成功鎮約從清朝道光年間開發，阿美族最早抵達，漢人約晚三十年才到成功鎮，當時無論火柴、針、衣服或蔬菜種仔，都帶給原住民社會文明的震撼，原住民的「番社」和漢人的「庄頭」也因此開始交流，經濟則多爲以物易物。

早期原住民仍處於鑽木取火階段，上山打獵須帶火種，家中燃起火來，會不分晝夜接力以木柴延續火苗，直到漢人帶來火柴，才解決早期鑽木取火的窘境，當時一盒火柴可換一袋稻穀，可見多麼珍貴。除了火柴，漢人要求以一斗米換一根針，原住民當時相當懷疑，認爲一根針「那麼小」，怎麼能換一斗白米「那麼多」？漢人則拿出鐵棒，強調一根細針是從一塊鐵棒磨成，原住民才願意接受交易。

王河盛在撰寫鎮志「歷史篇」的資料時，發現鎮內八個里仍有「副里長」的編制，而且信義里轄內就有三個副里長，感到相當驚奇和興趣，因此展開全面性調查。他指出，民國三十五年，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成立之後，頒行「台灣省各縣市村里長選舉辦法」，在當年和三十七年曾辦舉過兩次副里長選舉，三十九年實施普選之後，副里長走入歷史。

經過了三十二年，在民國七十一年的村里長選舉中，成功鎮信義里使首次由漢人出任阿美族村的里長，由於轄區涵括小馬、都歷和豐田等三個部落，轄內又有很多阿美族人，他於是透過鄰長們同意，各部落推選一個「委託里長」，後來改稱爲「副里長」。後來其他里也都仿效實施副里長制度，造成全鎮八個里有十個副里長的特殊制度。

王河盛說，副里長在偏僻的鄉下也相當威風，而且爭取的人也大有人在，記得他在擔任秘書時，有一位副里長在新任里長就職後，一直央求他向新里長說情，讓他繼續擔任副里長，類似的情形不勝枚舉。

成功鎮一半的人口是阿美族人，副里長制度主要是協同里長服務同族群的里民，工作項目包括有代言廣播、發通知單、翻譯、協同舉辦活動、各項文書處理、各項糾紛協調等，有的還會直接北上向原民會主委陳建年攀交情，爭取建設經費。副里長們說，他們服務的項目有如太平洋中的生物，千奇百怪，服務的熱忱有如太平洋的水，源源不絕。

台東縣成功鎮是原住民與漢人融和混居的山城，語言的隔閡差異衍生出副里長的制度，這是成功鎮爲了服務原住民族群下的產物，相當特別。

王河盛爲鎮民做老照片導覽，其中漁港闢建吸引眾多鎮民興趣。他指出，日治時期，在地方人士積極爭取下，新港漁港於一九二九年六月一日開工，到了同年七月十五日，日本政府因財政緊縮，突然下令停工，直到一九三〇年五月復工。當年開挖港口工程艱鉅，由於沒有大型機具可用，全靠原住民徒手開挖，然後才用台車運送泥土，一直挖至深及腰部高度，才由高雄調派挖泥船「馬公號」及泥沙搬運船「旗山丸」繼續進行，過程備嘗艱辛，令人無法想像。

漁港闢建至一九三二年才完工，港內泊地五萬四千平方公尺共徵調原住民達四十二萬人次，斥資八十餘萬日圓。眾多參與築港的阿美族人，事後回憶那段艱辛日子，簡直不堪回首。當時爲了節省施工經費，要求原住民日夜趕工，一天需做一天半的工作進度才可休息，不然得摸黑做下去。若扣除三餐費用及工具費，實際一天所得不足零點五日圓，成功鎮民聽了王河盛訴說原住民早年開拓新港建港的滄桑史，莫不爲之動容。

王河盛接受縣文化局委託調查鎮內的歷史建築，發現成功警分局前的警報台是目前

東海岸僅存的一座，他見證了日治時代、國共爭戰的防空歷史。王河盛指出，警報台在日治時期只是一座鐘台，作爲火警、防空警示之用，後來太平洋戰爭爆發，聯軍時常來空襲，當地民眾反映鐘聲太小聲、聽不到，當時物資又十分缺乏，日軍特地去找來一枚聯軍的未爆彈，取出火藥，充當警示鐘，效果還不錯。後來，國共內戰，警報台也肩負起防空的任務。一九六四年五月才改建成目前的塔樓。警報台柱面寫著「以備無患」、「居安思危」在文史中頗具意義。王河盛認爲寶貝古文物，刻不容緩，應用心維護及保存。

十二、 演講、著作及特殊事蹟

以下羅列歷年來，王河盛先生在地方文史的演講及著作。

種類	時　　間	摘　　要
演講	2000.03.23	成功鎮公所地方生態文化研習會，演講「簡介成功鎮」
	2000.04.02	成功鎮公所地方生態文化研習會，演講「成功鎮歷史人物」
	2000.04.12	成功鎮公所地方生態文化研習會，演講「如何建立族譜」
	2000.05.28	臺東社教館附設老人大學戶外教學活動「成功文史巡禮」解說員
	2000.11.--	新港國中　演講「成功鎮開發史」
	2000.12.10	臺東縣地方文化節漁民體會營，講課「新港漁港建港史」
	2000.12.11	臺東縣地方文化節話我家鄉，專題演講「成廣澳史話」
	2001.04.27	臺東社教館附設老人大學戶外教學活動，解說「成功文史及風情」
	2001.05.19	社教機構終身學習節「成功鎮文史巡禮」解說員
	2001.07.17	新港區漁會解說員訓練，講課「東海岸文史」
	2001.10.15	成功區九十學年度國民中小學新任原住民地區教師職前研習會，講演「部落文化之旅」
	2001.11.--	臺東縣政府「東海岸文史巡禮」擔任解說員（文化局）
	2002.06.29	成功鎮歷史建築種籽培訓研習會，演講「成功鎮墾拓及聚落發展」
	2002.07.01	成功鎮歷史建築種籽培訓研習會，解說「戶外建築參訪」
	2002.09.18	成功鎮和平國小鄉土文化研習及終身學習，演講「成功鎮開發史」
	2002.10.02	臺東南島社區大學水域休閒課程，講課「成功鎮拓展與漁村發展」
	2002.11.19	臺東南島社區大學社會人文課程，講課「成功地區(原、漢族)文史」
	2002.10.18	成功鎮歷史建築藝術巡禮，擔任解說員
	2004.09.18	成功鎮農會四健會解說員訓練，演講「成功鎮墾拓史及發展簡介」

	2004.09.19	成功鎮農會四健會解說員訓練，演講「成功鎮文史巡禮」
	2004.09.27	成功商水高職，演講「成功鎮歷史與史泰南神父貢獻事蹟」
	2004.10.--	成功商水教職員研習會，演講「成功鎮拓展開發史」
	2004.11.04	觀光局東管處解說志工訓練，演講「成功鎮拓展暨漁業文化」
	2005.03--	成功商水教職員「成功鎮文史巡禮」擔任解說員
	2005.10.19	三民國小百年校慶，演講「建校百年回顧本地百年教育」
	2005.11.--	忠孝國小百年校慶，演講「忠孝國小沿革及回顧本地百年教育」
	2006.10.--	臺東縣政府　觀光旅遊解說志工訓練，演講「成功鎮拓展開發史」
	2006.10.29	臺東縣政府「文化景觀維護保存推廣活動」擔任「成廣澳地區文化景觀實例解說」
	2008.08.14	成功鎮「97 年地方文化館計劃」觀光導覽人才培訓，演講「成功鎮文史」
	2008.08.16	成功鎮「97 年地方文化館計劃」觀光導覽人才培訓，演講「原住民文物館及漁港發展史」
	2008.08.23	成功鎮「97 年地方文化館計劃」觀光導覽人才培訓，演講「成功鎮人文、歷史建築、觀光景點、實地踏勘解說」
	2008.10.04	臺東縣政府「97 年度漁業資源志工培訓」，演講「三仙社區奇聞軼事」
	2008.10.05	臺東縣政府「97 年度漁業資源志工培訓」，演講「新港澳港建港史」實地解說
著作	專　著	成功鎮原住民族譜
		成功鎮歷史人物
		成功鎮名人錄
		成功鎮原住民部落史
		與李玉芬等合撰「台東縣史 － 人物篇」
		與王良行、蕭明治合撰「成功鎮志 － 政事篇」
		與孟祥翰合撰「成功鎮志 － 歷史篇」
	期　刊	（新港建港滄桑），（台東文獻）復刊第六期
		（成廣澳史話）
		（成功鎮拓展及漁村發展史）
		（成功鎮墾拓及聚落發展）
	2006/10	（台東縣成功鎮軼聞 一），（台東文獻）12 期
	2007/10	（台東縣成功鎮軼聞 二），（台東文獻）13 期
	2008/10	（台東縣成功鎮軼聞 三），（台東文獻）14 期
	2007.03.18	2007 年日本滋賀縣長濱市【水環境 in 長濱】展覽成果集翻譯日文及寫日語文章--介紹長濱鄉沿革與現狀

校對審查	2007.7.17	95 年度麻荖漏文化資產環境保全發展規劃及活化【期中報告】聘爲諮詢委員、校正及提供意見。
	2004/2005.12.23	台東市史叢刊規劃編纂計劃【結案報告書】，提供資料、校對、審查/成功港口
提供資料	2007.12.10	台東縣客家先賢耆舊錄　行政院客家委員會任採訪、提供客屬名人傳。
		台灣美術地方發展史全集　文建會 編 （台東地區美術史）　提供資料
		台東麻荖漏文化節成果專輯 寫＜新港建港滄桑＞　並提供資料
		《台東麻荖漏紀實》提供資料
		曾經於國立成功商水　月刊　每月提供成功鎮文史一篇
		台東縣公教退休人員協會通訊　期刊 常常義務投稿 成功鎮文史
		在社教館 社教志工園地 寫感言文章
		成功山海戀　吳當編著 寫文章—成功鎮是好所在　、並提供資料

王河盛先生在地方文史的其他特殊事蹟。

種類	時　　間	事　　蹟　　摘　　要
	2003.05.20	台東縣歷史建築清查 台東縣政府文化局特約研究員
	2007.08.26	台東縣 94 年度文化資產普查　台東縣政府文化局 特約研究員
獎狀	2002.12.15	台東社教館　獎狀 辦理推展東區社會教育熱心負責，功效卓著。
感謝狀	2007.9.5	鹿野鄉公所　感謝狀 爲鹿野鄉志（94 至 95 年）2 年時間，參與積極、無私的提供珍貴史料
感謝狀	2007.03.18	王河盛君於 2007 年日本滋賀縣長濱市辦理【水環境 in 長濱】展覽成果集（與日本滋賀縣長濱市生態池交流活動）提供台東縣長濱鄉文史資料並協助文稿翻譯
文化保存獎		97 年縣府推薦參與國史館、台灣文獻館 第三屆傑出台灣文獻獎，「文化保存獎」
促成者		向縣府社會處 申請籌組「台東縣成功鎮愛鄉文化推展協會」即將成立期望栽培年輕人，讓文史工作傳承下去。

＜**附錄一**＞

在《台東縣客家先賢耆舊錄》書中，王河盛任採訪、提供客屬名人傳。

列舉如下：

1、宋安邦　書香門第、政治世家，爲人嚴謹，治家甚嚴，當年地方上公認他爲漢學造詣博雅之士，是有名的文學家。

2、宋子鰲　前新港區漁會理事長，爲宋安邦之子，精通漢語文學，文筆精妙，是文學家。

3、宋賢英　前成功鎮長，爲宋子鰲之長子，從政多年，戮力於地方建設。

4、吳石麟　成功鎮首任民選鎮長，二二八時期的受難者，對地方貢獻良多，高風亮節，備受推崇與感念。

5、林福安　前成功鎮長、爲地方上有名的書法家，熱誠服務，貢獻鄉里。

6、溫泰坤　廣恆發展創辦人，經商有成，是當時台東廳有名的大地主。

7、宋文英　前成功鎮長，爲宋子鰲之子，曾獲績優鄉鎮長，服務鄉梓，貢獻良多。

第七章　其它

一、　在時代變遷中掘起的山頂頭家–鍾國煇

鍾國煇的父親鍾宏上（1917-2004），原籍屏東縣，大正 6 年（民國 6 年）8 月 30 日出生，於台灣遞信講習所畢業後，就任於屏東郵局所屬支局，因在職期間所管理之帳款，發生帳目不相符之情形，爲賠償不足之款項，於是鍾宏上變賣家產及田地，經賠償該支局帳款短缺之部份後，即從該支局離職。因爲當時鍾宏上姐夫李福星已在成功鎮公所內任職，鎮公所也正好有職位出缺，於是便邀請鍾宏上遷居成功並於成功鎮公所任職，獲知消息後，鍾宏上便帶著第二任妻子鍾林新蘭及其子女於民國 41 年間遷居台東。當時成功鎮道路工程已竣工，往返交通已十分便利，加上於日治時期已建成的新港漁港，均爲成功地區吸引新移民的主要誘因。

圖一：民國五十二年間，鍾宏上（右下一）與家人於成功鎮公所職員宿舍前之和影。鍾國煇（右後二）。資料來源：鍾家榮提供。

另外，始於 1933 年（昭和 8 年）起日本人漁業移民事業，將新港漁港作爲捕魚的重要據點，便開始實施一個爲期 5 年的移民計劃，根據 1938 年（昭和 13 年）的戶籍統計資料顯示，當時成功鎮的人口爲 8169，日人總人口數爲 598，其中漁業移民移居者達 70 戶之多，因而形成了一個移民村，日本政府並於移民村內設置「新港漁業指導事務所」，以做爲官方與移民間接觸的場所，至今當地百姓仍稱新港漁港北面的聚落爲「移民村」。而光復後的日本移民戶數統計資料爲 82 戶。

在 1930 年前成功地區的漁業還停留在傳統的拖網捕魚及投網捕魚爲主，捕魚的活動對成功地區的居民而言，並不是將所捕獲的魚類透過物流帶來利益的「漁業」，所以當時的住民（台灣的漢人及原住民）並沒有積極的利用當地的漁業資源，來獲取經濟利益。而在日本政府的移民政策及新港漁港竣工後，日人整頓了當地漁業的基礎設施結構，同時也因爲移民事業引進了日本漁業較先進的捕魚知識與技術。

以專門從事冬季鏢旗魚方式而開始的成功地區漁業，隨著擴充漁港，進行地區的都市計劃建設後，不僅吸引了因移民事業而來的日本漁民，原本以基隆和蘇澳爲根據地的漁民，也因爲龐大的漁業經濟利益而移居至成功地區，當時成功地區主要從事漁業工作的人口，要以恆春人和綠島人爲大宗，他們主要都是爲了參與捕魚工作，因而定居在成功地區，根據戶籍資料顯示，於民國 35 年起成功地區戶籍統計資料始見綠島移民戶，當時記載的綠島新移民戶口數爲 16 戶。

圖二：鍾國煇於成功鎮沿海海濱捕撈魚苗之留影，上圖中其右手所持物為捕撈魚苗之漁具。資料來源：鍾家榮提供。

在遷居成功地區後，鍾宏上於成功鎮公所內擔任戶籍員乙職，遷居初期居住於鎮公所職員宿舍內（今中山東路靠近台電之小雜貨店），因遷居初期家中經濟狀況並不寬裕，在適應新環境後，鍾宏上便開始於成功沿海地區捕撈魚苗貼補家用，而其長子鍾國煇、次子鍾國光、參子鍾國清也曾協助父親捕撈魚苗，捕撈區域以現今新港漁港堤防附近的礫灘爲主，據鍾國清回憶，民國 50 年間每尾魚苗售價約在 1 到 2 毛錢，價錢好的時候可以賣到 6 毛錢，一次的漁撈最多可捕獲約 100 尾左右的魚苗，當時一條玉米的售價約在 2 毛錢左右，所以一次的漁撈活動對家中經濟有很大的幫助，當時成功鎮地區有不少人在收購魚苗，收購之人先將魚苗飼養於水池中，待收購至一定數量後，再將收購之魚苗轉賣給養殖場，而成功地區捕獲的魚苗以供應西部養殖業所需之虱目魚魚苗爲主。虱目魚魚苗的捕撈作業的時間在每年 3 月中旬到 6 月，一個月之中，初一、十五前後的大潮期間漁獲較好，8-11 日及 22-25 日之小潮期間較差，每日滿潮時及剛開始漲潮或剛開始退潮的時刻較好。

成功鎮魚苗捕撈漁業歷史非常悠久，其中針對虱目魚魚苗這一項的統計資料，可追溯至大正 9 年（1920）該年台東廳捕獲約 36 萬尾，只佔全台（3,475 萬尾）的 1%。但在昭和 5 年（1930）後期，成功地區魚苗捕獲量大幅成長至 903 萬尾，供應了全台虱目魚需求量的 22.5%（4,000 萬尾），這顯示了成功地區在當時已成爲台灣虱目魚魚苗的重要供應區。

鍾國煇在初學魚苗捕撈作業時，因不熟悉當地水域，而被大浪拖移至外海，情況危急，所幸被當地楊姓居民發現救回岸邊，過程有驚無險。日後，當鍾國煇事業有成之際，楊先生想要購買新宅，卻因爲積蓄不足而猶豫不決時，鍾國煇爲報答當年的這份恩情，以無息措貸的方式，完成了楊先生購宅的心願。

民國 57 年鍾宏上自鎮公所退休後，曾於成功鎮三民里北平街上經營雜貨店生意，晚年與其三子鍾國清同住。民國 93 年（2004）鍾宏上過世於成功鎮。

圖三：鍾國煇於成功鎮公所任職時，攝於鎮公所門口。資料來源：鍾家榮提供。

鍾國煇（1940-1994），民國 29 年 7 月 15 日出生於屏東縣萬巒鄉五溝村，於 12 歲（民國 41 年）時，隨父親鍾上宏遷居台東，就學期間，因當時鍾家生活較爲貧苦，所以鍾國煇在玉里初中就讀一年後，便因家中無法繼續供應其就學所需之學費而輟學。輟學後，便進入成功鎮公所擔任臨時員，其工作項目爲戶籍謄本抄錄員，也因爲這樣的工作性質，使鍾國煇必須深入成功鎮各里轄區登錄戶籍資料，無形中也拓展了他爾後事業的通路與人脈。因爲當時成功鎮的人口結構以阿美族人居多，約佔總人口數 60%（8558 人），而原住民因日治時期的皇民化運動，多半能以日語溝通，也因爲工作上的需求，鍾國煇漸漸學會了阿美族語，於鎮公所期間的工作歷練，無形中也奠定了鍾國煇日後的事業基礎。

圖四：鍾國煇於海軍陸戰隊，擔任教育班長時之留影。資料來源：鍾家榮提供。

入伍後，鍾國煇進入海軍陸戰隊士官學校受訓，而海軍士官學校的受訓經歷也成爲他在退伍後，錄取爲鎮公所正式公務人員的重要關鍵，因爲當時鎮公所市場管理員開缺，且管理員必須具有初中學歷，而鍾國煇士校的受訓經歷便被視爲等同初中學歷，並讓他在退伍後順利的進入鎮公所任職市場管理員。

圖五：民國 54 年 11 月 2 日，鍾國煇迎娶位於屏東縣內埔鄉龍泉村的邱月雲女士。資料來源：鍾家榮提供。

民國 57 年，因爲鎮公所同事林賜昌的建議，於是在成功鎮豐田地區，承租了林賜昌的房子，經營起雜貨店的生意並遷居至豐田，因爲當時鍾國煇適逢退伍新婚不久，所剩積蓄不多，在與妻子商量後，變賣了妻子的嫁妝一輛摩托車，當成經營雜貨店的本錢。此時鍾國煇仍於鎮公所內任職，除鎮公所擔任之公職及家營事業外，鍾國煇爲貼補家用，另於新港漁港標購漁貨販賣，並兼職萬家香醬油外送服務員之工作。在日後遷居成功鎮中華路時，另外經營起小說漫畫書出租店的生意，並委由妻子管理。

在鎮公所任職期間，因職務所需，鍾國煇便開始研習土地代書的作業流程，因當時民眾不熟悉遺產轉移之作業，因此鍾國煇便協助民眾執筆土地代書的工作，後來遭到原鎮公所離職員工劉英祥向鎮長檢舉，指責公職人員不應該私下從事土地代書之作業，鍾國煇因此於民國 64 年間向鎮公所提出辭呈。離職後，便自行創業成立「鍾代書事務所」，當時適逢台灣經濟起飛，各項都市計劃及交通工程發包動工，因爲當時具有學歷能從事土地代書的人並不多，加上鍾國煇本身亦參與土地投資的事業，因此讓他迅速累積了可觀的財富。

民國 60 至 70 年代正值成功鎮漁業產值與人口數的高峰期，許多成功地區的富人紛紛投入以捕獵旗魚爲主漁船事業，鍾國煇便開始與當地漁民尤正雄合作，經營起漁船漁業的工作。在全盛時期，鍾國煇在成功地區共投資了 20 餘艘的作業漁船，是成功地區投資最多漁船數的山頂頭家。當時台東縣政府曾以限額公開登記的方式，推展娛樂觀光漁船，且名額只有二名，於是便用抽籤的方式決定，鍾國煇幸運的抽中一個名額，便投資了新港漁港第一艘，以觀光目的爲主的海釣船，並以妻子邱月雲女士之姓名，爲此船

命名爲「月雲號」。

圖六：成功鎮新港漁港舊照。資料來源：鍾家榮提供。

鍾國煇除經營本身事業外，亦曾擔任二屆新港區漁會常務監事及一屆理事長、第 9 屆成功國際獅子會會長、台東縣選舉委員會監察小組委員等職。在成功漁業逐漸趨於沒落之際，鍾國煇靠著本身不動產投資的專業知識及人脈，於民國 70 年間開始涉足營造事業，除承包政府工程外，後期主要以私人土地上的住宅承建工程爲主。

鍾國煇雖在成功地區擁有富豐的人脈及經濟實力，但不同於其它在成功鎮興起的望族，在厚實地方人脈或擁有相當財富之後，均積極投入參選地方公職人員的選舉活動；鍾國煇本身雖然不曾加入民意代表或公職人員選舉，卻是各參選派系急於尋求合作的對象，期間曾任前台東縣縣長鄭烈、前台東縣議會議長李忠憲等人競選服務處總幹事，可見鍾國煇在成功鎮地區，不管在政治及經濟上均深具影響力。但於民國 83 年（1994），鍾國煇不幸發生墜海意外，與世長辭，享年 54 歲。

鍾國煇爲人樂善好施，於擔任獅子會會長期間，曾舉辦多項慈善活動，遇地方居民經濟上遭遇困難時，均能康凱解囊，協助居民渡過難關，廣受地方好評。鍾國煇育有一子二女，長子鍾國榮曾任新港國中教師、成功鎮公所里幹事、總務等職，長女鍾麗君爲新港國中教師，二女鍾慧君爲音樂教師，尤其以幼兒音樂啓蒙教育爲主，並致力於推動地方藝文表演，曾舉辦多項音樂活動及畫展。

二、　宋欽明先生－碾米廠到米店

一個陽光不甚充足的上午，來到成功鎮上一間不起眼的米店，復古的擺設，米是最普遍的裝潢，沒有華麗的店面，顧客三三兩兩，卻陸陸續續，每位都好像老朋友一般，熱烈寒喧，老闆娘道地的嗓音，開心的招呼，偶而，低沉響亮的呼喊，來自木板隔間裏，小餐桌旁，沒錯，就是我們今天的主人翁，米店老闆宋欽明先生。

表明身分及來意，老闆娘親切招待，宋先生悠悠道出，那塵封已久的過往，我在古老的米店，讓時光緩緩倒回。

約莫是八十年幾前，大概是民國十餘年左右，宋先生的父親宋阿傳先生（苗栗縣南庄鄉客家人）與母親宋連招女士（苗栗縣頭份鎮客家人），爲了家計，從苗栗南庄出發，繞過半個台灣，來到花蓮縣開墾荒地，幾經輾轉，一度落腳花蓮縣鳳林鎮，宋欽明先生在此出生，當時民國二十年左右，尚在日據時代，宋欽明先生排行最小，前有大哥宋欽興先生，二哥宋欽玉先生，三哥宋欽榮先生。

宋欽明先生在花蓮縣鳳林鎮出生後，隨著父親宋阿傳先生，因爲工作關係，四處遷居，在山線以台東縣池上鄉向南向北遷居，之後，遷到海線，曾經居住台東縣長濱鄉寧埔村、長濱村，最後遷到成功鎮，之後雖有遷居，仍以成功鎮爲範圍，時間大約在民國三十年前後。

在成功鎮定居之後，宋欽明先生在成功鎮三民國民學校就讀，接受了八年的日本教育，由於受教育後期，進入二次世界中晚期，經常有空襲警報，國民學校教育時常中斷，所以才受日本教育達八年之久。

在躲空襲警報期間，鑒於成功鎮（當時稱新港）有港口，往往成爲空襲的重點區域，當時成功鎮居民大多舉家遷居，遷到海岸山脈山下，用以躲避空襲。更由於二次世界大戰後期，日本政府徵調台籍軍伕，遠赴南洋，但大多成了砲灰，戰死他鄉，所以許多當地居民躲到山上，逃避日本政府徵兵。

宋欽明先生一家也不例外，舉家遷居海岸山脈山腳下麒麟部落，一直到民國三十六年台灣光復之後，才有機會回成功鎮內看看之前居住的舊家，當時成功鎮，可以說是滿目瘡痍、百廢待舉，所有以往的努力，都必須重新來過。告別了日據時代，緊接著而來進入國民政府時代。

民國三十八年的二二八事件，當時宋欽明先生十七歲，對於這個事件的記憶，並不清晰，直覺中，情勢好像很緊張，但是在台東地區，並不如西部地區嚴重，也沒有其他軍民的衝突，應該十分和平。

大約在民國四十年左右，從事農耕工作，大部分土地都在麒麟部落，耕種以水田爲主，多種稻米，也種植些水果如柑橘、柚子、及柿子，大約將近十甲地，早期開墾荒地耕種，十分辛苦，土地崎嶇不平，土壤夾雜石礫，整地種植接需要人工，或者以耕牛協助，極爲耗費體力，機械化耕作已經是幾十年後的事了。

在這一段較長的時間裡，居住在麒麟部落，那裡距離成功鎮有一段路程，步行要將近一個小時，是個靠近海岸山脈的小村莊，當時的人口還算蠻多的，大概有兩個鄰，約略三十幾戶人家，算一算，將近兩三百人居住。

這裡的居民多是躲空襲警報時，由成功鎮遷居而來，當時還是一片蠻荒，辛辛苦苦到這裡開墾，都是爲了求生存。所以居民大多以務農爲業，種田或種植果樹，要不然就偶而上山打獵加菜。宋欽明先生後來搬離開麒麟部落，但是，他二哥宋欽玉先生則選擇留在麒麟部落，一直到現在。

之前提到自己的幾位哥哥，大家的發展都不太一樣，大哥宋欽梁先生到外地發展，二哥宋欽玉先生則留在成功鎮麒麟部落，管理家中的土地，目前還經常下田下果園巡視巡視，三哥宋欽榮先生曾經當過牛販，買賣牛隻，就是所謂的牛墟，類似趕集的市集，以前的農耕社會，定期會有這樣的市集舉行，除了牛隻的買賣，還有許多農業相關工具

的販售，或者是農產品的販賣，現在都已經消失了，大改只剩下高雄縣岡山鎮的簍筐會，不過聽說都變質了。

三哥宋欽榮先生也在成功鎮開過旅社，在以前，成功鎮交通不方便，旅遊業並不發達，旅社的客源大多是路過成功鎮的生意人或返鄉人，畢竟要從外地回長濱或者經由海線往花蓮的，成功鎮都是中繼站。現在交通發達，成功鎮已經沒什麼旅社在開業了。

民國四、五十年代，台東的發展有限，印象中，從成功到台東市，搭公路局的客運車，至少要三個小時，而且，中途在東河鄉興昌村還要休息，休息時間大概十分鐘，因爲當時客運車是燒材燒炭的，屬於蒸汽式客運車，休息的當時順便補充客運車所需的水及燃料，所以當時東鄉興昌村，由於是中繼站，人來人往還算熱鬧，也開了些小吃店。

講到開店，宋欽明先生現在的米店，大概在民國五十幾年開張，當時自己的田地大多僱農種植，產量還算不錯，所以就自己開設碾米廠，當時的碾米廠需要大型機具，之後還需要工廠登記，要開一間碾米廠不是那麼容易。

當時成功鎮鼎盛時期，碾米廠間開米店的，就有十幾家，經營起來算是不容易。還好，稻穀來源充足，光自己的土地就足夠，再加上親戚朋友，來源不缺。而顧客群也漸漸穩定，所以開到現在也四十幾年了，還是有許多老顧客捧場，做做小生意，打發打發時間。

在成功鎮開店也超過四十年，宋欽明先生印象中，在成功鎮內的幾個族群，客家、閩南、及原住民間，都能夠和睦相處，做生意以和爲貴，對於各個族群一是同仁，沒有任何大小眼，生意才能做長久。

這裡的原住民以阿美族爲主，他們最熱鬧的是一年一度的豐年祭，印象中，以前和他們去山上時，他們會把石頭燒紅，放入鍋子內，烹調食物，很快就熟了，在野地或溪邊，這種就地取材的方法，非常實用。經常，從溪流裡捕撈的魚蝦，沿路所採摘的野菜，在經過這樣特殊的處理，變成一道道美味的食物，吃來可口充飢，又有十分刺激的視覺效果，非常特別。

米店的工作也做了四十年，看著同行十幾家米店碾米廠一家一家收了起來，感覺時代不一樣了，現在也不用作碾米的服務了，碾米的器材老早都當廢鐵賣掉，當初的工廠登記證也不知道放到哪裡。

碾米廠已經是個黃昏工業，在時代的趨勢之下越來越沒有生存空間，也漸漸必須轉型才行，所以，許多碾米廠本來就會兼著賣米，收掉碾米業務，單純賣米開米店的有，大部分都轉行從事其他生意。

現在米的來源比較不一定，在鼓勵休耕之後，成功鎮本地產的米逐年減少，大多數的米都自台東市運來，而台東市的米，有的來自關山鎮或池上鄉，更遠的有富里鄉的。現代的人，種田的越來越少，沒辦法，種田辛苦，現代人吃不了苦啦！

現在米店的生意越來越難做，靠的就是那些老客戶，慶幸的是，這裡沒有像家樂福大賣場的競爭，至少還可以維持店面。年紀也有了，這家米店讓夫婦倆有事情做，打發打發時間也不錯。

也沒有小孩願意接下這間米店，他們有他們自己的事業在忙，三個兒子，老大公東高工畢業在成功鎮公所工作，老二花蓮高中畢業在外地工作，老三讀完台灣大學研究所

後出國去工作，每個人各有自己的一片天空。

客家人在成功鎮其實並不是最大的族群，而像宋欽明先生來自苗栗的北部客家人更是稀少，各家族群語言難免有所差異，宋欽明先生是講海陸腔，不過，在來到成功鎮爲了討生活，再加上開店做生意的溝通必要，還是以國語及閩南語爲主要溝通語言，多會幾種語言是不錯的。

根據宋欽明先生的記憶，成功鎮的地名沒記得很多，只知道麒麟部落是原住民阿美族的話翻譯過來的，成功鎮其實有許多地名是由當地原住民阿美族語翻譯來的。

訪談接近尾聲，時間也接近中午，看這宋欽明先生七八十歲年齡，手邊的米酒，一碗接過一碗，在訪談之中從未停過，而臉色則逐漸紅潤，無怪乎，老闆娘說，趁著他還清醒，才可以問到事情。彷彿在空氣中，也布滿著微醺的氛圍，慢慢得在古色古香中陶醉起來。

在宋欽明夫婦倆盛情的邀約下，愉快的留下來享用中餐，咀嚼著剛剛經歷過豐富的人生，格外的滋味甜美，也在互道有空來走走的語句中告別，離開這充滿人情味的米店。

圖七：宋欽明先生，朱慧貞攝。

三、　張海星－只有曾經艱難才能更珍惜所有

花了一些時間，在有點陌生的城鎮，找尋了一會兒，一間因爲道路拓寬而稍作整建的房子，看得出來屋齡多了，卻不失當年的堅固，最主要，屋裡有著熱情的長者，溫馨了這陌生的城鎮。

張海星先生夫婦，熱情的迎接，彷彿像遇見老友一般，細數著當年的種種，與今昔的不同。

民國二十三年張海星先生在屏東縣內埔鄉出生，當時還是日據時代。幼年的記憶不多，只記得自己小時候，因爲舅舅一家沒有兒子，所以從小過繼給舅舅當子嗣，因而改姓謝，一直到懂事之後才又改回來姓張。

張海星先生屏東縣內埔鄉客家人，家族原居住在內埔鄉內埔村，母親是興南村客家人，父親張連丙先生在民國二、三十年左右，舉家從屏東縣搬遷到台東縣成功鎮來，爲了謀生的緣故，才有如此大規模的搬遷。

這次家族搬遷，張海星先生並沒有跟上，因爲過繼給舅舅的關係，一直到十八歲，民國四十一年左右，才到有機會到台東縣成功鎮找自己親生父母親。但是，並沒有留在

成功鎮，而是選擇回屏東。

過沒多久便開始服兵役，那是民國四十五年前後。真正到成功鎮來定居，大約是民國四十七年的時候，而來成功鎮的最大原因是依親，而且，打算在此工作。在那之前，對成功鎮的印象是一個雨量豐沛的城鎮，三天有兩天在下雨，可能之前來成功鎮都是冬天的關係，東北季風首當其衝，下雨機會較大。

來到成功鎮，靠自己的勞力工作，最主要以水泥工爲主，在兼做其他零工，雖然辛苦不過還算穩定。而自己也到適婚年齡，在成功鎮定下這門親事，就是現在互相扶持的牽手。

張太太民國二十四年在成功鎮出生，有著半個客家人血統，父親是台北人，母親是屏東縣萬巒鄉的客家人，家中親戚有許多都在台北，所以現在也常到台北繁華的都市走走，但總是不太習慣那裡的生活。

在小孩相繼出生，生活的艱苦，才剛要開始，靠張海星先生微薄的薪水，扶養二子三女，事件非常不容易的是。所以張太太也必須外出工作，而能一邊兼顧小孩的工作有限，大多是一些農事。

張海星夫婦在這段期間，有時到處幫農，還幫人補鼎補鍋，用以填補當水泥工的空閒時間。儲蓄一些之後，用貸款買下兩分地水田，從事農耕，而水泥工漸漸成了副業。

當時貸款買田，而用稻貨繳交貸款，經濟十分困難，農忙之餘，就到附近海岸山脈上，提別人擔薑。薑的種植非常耗損地力，大多種在山坡之上，出入極爲不便，通常種過薑的土地，會有將近十年到八年的時間不能再種，因此只會越種越偏遠，種植過程不需太多照顧，採收卻是件非常耗費人力的事。

還有，幫忙柑橘柚子圓的工作，尤其是噴藥、除草、剪枝、及採收，四處幫農。或者上山採拾籐類植物，到山下交貨，大多是作家具的原料。最常做的事是在田裡或溪流中，撿拾田螺抓鱔魚，到市場零賣，這類小工，這五個小孩都必須一起幫忙才行。

那一段艱辛的日子，小孩一起跟著吃苦，卻都沒有任何怨言，乖巧的協助，每到學校下課放學，就是他們上工的時間，要不然就是在家中做家事，他們的童年不像現在的小孩那麼幸福，但是，他們曾經辛苦過，比起沒吃過苦的小孩，會懂得更珍惜現有的生活。

五個小孩，有的在公家機關工作，有的有一技之長，各有自己的一片天空，雖然大多在外地工作，但是，作父母的都知道，他們一定能好好堅守自己的工作崗位，爲自己，爲家庭努力付出。

在張海星先生改回本姓，也對自己的家族有所歸屬，父親張連炳先生有四位兒子，分別是張添星先生、張辛星先生、張海星先生、及張星坤先生，是屬於「星」字輩，目前除了張海星先生定居在成功鎮，其他四位兄弟都到外地了。

其中張添星先生曾居住在成功鎮及東河鄉等地方，也曾經活躍在政壇，當選過東河鄉鄉長，政績頗爲顯赫。之後，爲了遠離政壇的紛紛擾擾，便搬到台東市居住，淡出政壇，過著退休的生活。

在成功鎮，居民組成族群多而雜，然而，卻還蠻好相處，有一中身份較爲特殊，就是綠島人。因爲成功鎮舊稱新港，有一個頗具規模的港口，進出以漁船爲主，魚貨量在

冬季以旗魚爲大宗，各個季節有不同的魚種，成功鎮一度十分繁華，所以吸引綠島地區居民搭著漁船，來到成功鎮謀生，所以有綠島人的族群。

這裡的原住民族群以阿美族爲大部分，而原住民族有著樂觀的天性，非常容易相處，除了言語溝通難免有障礙以外，可以交到很要好的朋友。

客家族群在這裡以南部客家人爲主，也有參雜一些中北部客家鄉親，但畢竟是少數，而南北不客家人的腔調不同，嚴重的詞語甚至完全聽不懂，張海星先生所講的客語，則是廣東省梅縣口音，新生代的小孩對客家話的熟悉程度已經很弱了。

台東地區畢竟是後山，開發時間比較晚，開發程度比較有限，所以比較容易保留原始風貌。但是在交通的部分，就真的不敢恭維了。想當年，剛從屏東縣內埔鄉到台東，必須先到屏東市搭公路局客運車，到台東市一趟路至少五個小時以上，甚至車班比較晚發車，還得在楓港過夜。

當時台東市到成功鎮，是崎嶇的石子路，搭乘公路局客運車必須搭上三個小時，在東河鄉興昌村，有一小段的休息時間，足以讓乘客透透氣，補充車輛上的必需品。交通之不便，可想而知。

隨著車輛的進步，道路的拓寬及截彎取直，讓行車速度加快，城鄉差距縮短。再者，南迴鐵路在民國八十年通車，東部與西部的差距更小。如果偶而想回屏東故鄉看看，就不再是遙不可及的夢想了。

成功鎮的地名，大部分是以阿美族語翻譯而來，所以瞭解的並不多，而現在居住的三民里，在以前被稱爲蕃社，因爲這裡居住的原住民較多的關係吧！

張海星夫婦現在居住的房子，是四十年前（約民國五十七年左右）重新翻修，原本居住的房子是平房，而且是以夯土爲牆的土埆厝，經不起常來光顧的颱風，以張海星先生當時的一技之長，包辦了所有房屋的翻修，由於當時建材運用非常實在，到現今，只是舊了一些，卻依然非常堅固。這樣堅固的房子，在這裡再住上數十年都沒問題，也感嘆現在建築的不紮實，才會經不起風雨地震的肆虐。

張海星先生來到成功鎮，也居住了快半個世紀，以往對這裡多雨的印象，似乎不在。而東海岸，多颱風的路過是無庸置疑的，這裡的長輩都戲稱，台東是颱風的巢穴。除了颱風多以外，地震也十分頻繁，真是個氣候多樣的地方。

並沒有多久的時間，讓這個陌生的城鎮，在張海星夫婦愉快的言談下，漸漸熟悉了起來，冰涼的冷漠，變得溫熱，那是他們對這個地方感情的昇華，健兒感染了我們周遭的每一個人，這就是親愛這塊土地的力量。

四、　郭雲東－從船東到五金行老闆

來到郭雲東先生的家，宛如進入物理實驗室，而這其實是他的工作室，桌上牆上放滿許多工具，許多成品半成品堆放著，隔壁才是店面，以販售魚具兼賣五金，而工作之餘，含飴弄孫非常愉快。

在這個設在騎樓的工作室，便是與郭雲東先生的第一次接觸，仔細一問原來都是些船上的用具，有些還是自己製作的呢！這也揭開了郭雲東先生，多年以來記憶的寶盒，一起回到過去。

民國二十九年八月二十九日，郭雲東先生在成功鎮出生，然而，故鄉事在屏東縣內埔鄉，是位南部的客家人，這得再往上追溯，父親郭秀昆先生，大該在民國十幾年時，爲了協助住在台東縣成功鎮的姑丈宋子鰲先生工作，千里迢迢搬遷而來。

當時宋子鰲先生經營碾米廠，頗有規模而欠缺人手，也提供親戚就業機會，父親郭秀昆先生便在成功鎮定居下來，並且與成功鎮小港母親郭李鳳英女士結婚，而母親也是屏東縣的客家人，可以說是有緣千里來相會。

郭雲東先生有一位哥哥郭應東先生，兩位弟弟分別是郭滿東先生及郭慶東先生，哥哥出社會後便到台北發展，也在台北定居，郭滿東先生任職成功地政事務所，郭慶東先生則爲自由業，另外姊妹共三人，各有其歸宿。

父親郭秀昆先生在姑丈的碾米廠工作十幾年後，在民國四十幾年開始開設五金行做生意，生意穩定後開始整船，所謂「整船」就是購買船隻當船東，雇用船長及船員出海捕魚，捕回來的魚貨，拆帳分給船長、船員、及船東。

於是購買兩艘船，分別是吃水量十九噸及十八噸，算是中型漁船，用來以標旗魚爲主，在當時除了標旗魚以外，另在近海進行魚撈作業，收入還算平穩，而五金行則繼續經營，並且以販售修理船用五金爲要，更兼賣釣具。郭雲東先生在民國五十一年當兵退伍，也在家中幫忙，協助相關船務。接著與同是成功鎮的謝秀英女士結婚，而謝秀英女士則有一半的客家籍血統，而子女也在成功鎮成長，各有所成。

整船的工作越來越難經營，倒不是魚貨量減少，而是越來越少人願意從事漁業，漁工及船員日漸難找，就在整船二十幾年後，十分不捨的停業，停業之後，原本的五金行改以販售釣具爲主，而船用五金及相關器材的維修，則成爲自己茶餘飯後的興趣及消遣，大多數是爲老朋友老顧客服務了。

家族整船工作告一段落，改以務農爲業，而郭雲東先生也跟著協助務農，民國五十年到八十年父親郭秀昆以務農爲主要工作，並朝山區發展，剛開始幾年以種植椰子、檳榔、及橫山高接梨爲主，其中以高接梨栽種最爲辛苦，一旦遇到這裡經常肆虐的颱風，一年的心血就會白費，所以種植的時間不長，數量也不多。

民國六十幾年在山區買地，陸陸續續將近四甲地，大多數種植相思樹，相思樹用來燒炭，到成功鎮內販售或銷往外地，而這些土地都在柑仔山附近，靠近溪流，這樣灌溉比較便利。

家族來到成功鎮也已經超過八十幾年，也許不見得有多少成就，但至少安居樂業。現在居住的房子是二十幾年前改建，一間爲店面，一間爲住家，空間利用十分充足，工作之餘便帶帶孫子，生活十分愜意。

成功鎮早期交通十分不便，濱海公路很窄，而且都是石子路，有公路局的客運車載運旅客，如果是自行騎機車，就必須要有隨時會摔車的心理準備，早期的機車非常耐用，都是向野狼一二五一樣的打檔車，也比較耐摔，成功鎮到台東是，摔個一、兩次是家常便飯。

東海岸這幾個鄉鎮都有古地名，成功鎮之前稱新港，更早之前稱成廣澳，是以這裡的港口的關係命名；長濱鄉早期稱爲「加走灣」,「加走」是閩南語跳蚤的意思，是因爲地形的關係命名；成功鎮與東河鄉交界處現名叫都歷，以前稱爲「小馬」，相對於東河

鄉東河村則古稱「大馬」，應該是兩聚落間有條溪稱爲馬武窟溪，所以聚落大者稱「大馬」即東河鄉東河村，聚落小者爲「小馬」即成功鎮都歷部落。

望著郭雲東先生手上把玩的儀器，聽著過往的歷史，好奇的問起這個儀器的用途，原來是個變壓器，用來電暈剛捕撈上來的較大型魚類，以防亂跳又跳回海裡。看似簡單的用具，確有如此的用途，不得不佩服，郭雲東先生的巧手，以及對這片海洋的熱愛。

圖八：郭雲東先生，朱慧貞攝。

五、　曾士華－堅正的公僕，永遠的鎮長

唯一一次不必千里迢迢遠赴成功鎮，就近在咫尺的台東市。一位曾經叱咤成功鎮政壇曾經在成功鎮眾望所歸，曾經那樣守本分無私的奉獻，曾經有那麼多曾經，而現在一切炫爛終歸於平靜，偶而在茶餘飯後淡淡回想起，這一個中午，和曾士華先生一起溫馨回顧。

曾士華先生，是屏東縣內埔鄉福田村客家人士，民國二十三年二月五日出生於故鄉，民國二十六年時才三歲，尚在襁褓之中，便隨著父母親搬遷到台東鎮（現在台東市）。

當時之所以遠離故鄉，是在故鄉耕作不順遂之故，舉家來到台東鎮（現在台東市），父親在卑南鄉一家專門蒐集魚藤提煉麻醉魚類藥物的公司，擔任經理得以謀生。當時仍是日據時代，生活情況仍屬困難，能有穩定工作已是不易。

民國三十六年，父親離開公司經理職位，改到成功農業會社（即現在成功鎮農會）任職，當時曾士華先生才九歲，就讀國民學校三年級，也是日據時代末期，第二次世界大戰就要終了，而空襲警報日漸頻繁，於是舉家自成功鎮內遷到現在的忠仁里麒麟部落，躲空襲警報，因爲成功鎮有座港口，常是美國軍機轟炸的重點目標之一。

過不多久，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台灣脫離日本的殖民地統治，回歸國民政府接管，而不及兩年，國民政府撤守大陸，播遷到台灣。民國三十九年小學畢業，所唸的小學是三民國小，是距離成功鎮最近的小學。

民國三十年代的成功鎮，只有三所國民小學，除了三民國小以外，還有忠孝國小及信義國小，就學環境有限，就學人口亦有限，並非人人皆能受到完整的教育，加上時局動盪不安，求學是當時遙不可及的夢想。

曾士華先生何等有幸，國小就學成績十分優異，在那個沒有國民義務教育的年代，初中是必須經由考試才能就學，曾士華先生以優秀的成績考入花蓮農校初中部，即是初農，三年之後再因五育均優直升高中部，即是高農，六年的時間皆是住在學生宿舍，在

不延遲就學時程的情形下完成學業。

六年的農校生涯十分令曾士華先生回味，因爲在偏遠的成功鎭地區，當時能夠考上初中再進高中職，只有曾士華先生一人，也是家族在成功鎭的驕傲。然而，在那個生活緊縮的年代，讀書仍是家庭中的一大負擔。

印象很深刻的一件事，是在農校住宿就讀，每個月必須仰賴家中寄伙食費到學校，才能在宿舍餐廳用餐。有次伙食費還未寄到，卻已經餓三天了，只好同幾個一樣情形的同學，偷拔甘蔗吃，用以充饑，不巧被地主所捉，交由學校處理；校長得知事情始末，不但不予責難處罰，反而還請餐廳供應餐點，但約法三章不再犯同樣過錯。到如今想到這位校長，仍是感恩點點滴滴在心頭，永難忘懷。

求學六年，因爲交通十分不便，加上車費也是筆開銷，所以每學期只能回家一次，民國三十、四十年代，一直到五十、六十年代，東部地區的交通，帶給當地居民或外來人口非常嚴重的障礙，以下就舉幾個例子，便可深深感受。

以台東市到成功鎭的台九線省道來說，當時是只有六公尺寬的石子路，蜿蜒曲折，路途遙遠，早期運輸由公路局爲唯一，而且是燒炭的客運車，成功鎭到台東市必須在東河鄉興昌村停留十分鐘，加水加炭，才能繼續前進，所以成功鎭到台東市必須花三個小時才會到。相較於現在，自行開車只要四十分鐘就可到達，簡直是天壤之別。

另外，在以往南部與東部的聯絡道路是南迴公路，當時從高雄或屏東往台東，必須在屏東縣楓港過夜，隔日再進入南迴公路往台東出發。在那個時候從楓港到台東市要花六小時左右，交通不便，難以想像。

農校畢業之後，參加農業就業考試，考上之後分發至秀林鄉，即太魯閣附近，民國五十年代的太魯閣並非如現在一般的觀光景點，而且中橫公路並未開始興建，可以想像其偏遠的情形，所以曾士華先生在報到之後，便回到成功鎭，不去任職。

回到成功鎭也算光榮，畢竟在這裡有如此的學歷之人，微乎其微，在服完空軍兵役兩年六個月之後，在成功鎭找工作，其實在小學畢業未上農校之前，就曾經在成功鎭公所擔任工友，將近兩年半左右。

有此學經歷，很快的在台灣省新港農田水利會，找到技工職位，大概任職六個月後升任農業技術士，協助排解相關的水利糾紛，農業社會中，給水系統十分重要，攸關一季作物的收成，所以這類的糾紛排解極爲重要，而且必須公正得令人心服口服。

新港農田水利會，之後更名爲成功農田水利會，掌管長濱鄉、成功鎭、東河鄉三鄉鎭的農田水利事務，曾士華先生在成功農田水利會十幾年間，仲裁許多農田水利糾紛，建立了極高的公信力及威望，也爲未來政治之路奠定非常穩固的基礎。

民國六十二年受到國民黨黨部提名，爲成功鎭鎭長候選人，與宋賢英先生競選，由於種種因素，以二百三十票之差落選，畢竟首次參與政治活動，而能以些微的差距落敗則與有榮焉。

四年之後，民國六十六年底，在國民黨提名中順利當選成功鎭鎭長。辭去成功水利會的工作，由一種服務對象及事務，轉換成爲整個成功鎭鎭民服務，而事務更爲繁雜，這種角色的轉換，也是心境的轉換，而自己的責任更加重大。

擔任成功鎭長 兩屆，共計八年兩個月，基於選舉法規之規定，民選機關首長（村、

里長以外）連選得連任一次。所以，在民國七十五年三月一日卸任，兩任成功鎮長任內，功績卓越，更在民國六十九年得到特優鄉鎮市長的榮銜，至今已過二十餘年，在成功鎮內有一定年紀的長輩，應該還能記得這一段時期吧！

八年餘成功鎮長任內，政務繁忙，更多的是應酬，尤其在基層的鄉鎮市，許多政務推行，上級長官視察者眾多，另外，鎮內鄉紳或種種業務往來眾多，有鑑於飯局之多，遂由夫人開設「樂海飯店」，以應種種飯局之備。除了，多少分攤家中開支之外，更協助曾士華先生鎮長業務的推動。

在政壇上劃下完美的句點後，並不戀棧，毅然退出，不再過問，而生活仍舊必須渡過，於是，有之前農田水利會職務背景，始再回農田水利會系統任職。

民國七十五年底，到台東農田水利會擔任管理組長，工作地點則是改到台東市，所以，夫人開設的飯店，也只有結束營業。自此之後，往來成功鎮與台東市之間通勤。

經過五年通勤的日子後，便舉家遷居台東市，結束了從民國三十六年到民國八十年共計五十六年在成功鎮居住的日子，已然超過半個世紀，這漫長的時間中，在成功鎮搬遷八次，夫妻的生活、子女的成長、自我的肯定，在成功鎮渡過了。

民國八十五年擔任台東農田水利會總幹事，三年後，民國八十八年七月十五日自任內退休，而退休至今也就要十年，回首這般擔任公職的時間，問心無愧於天於人，並心安理得。

公職生涯創下兩項紀錄，第一是在農田水利會，由最基層的技工職位，做到農田水利會事務官的最高職位總幹事退休；另一則是，在成功鎮公所當過最基層職位工友，也當選過兩任成功鎮鎮長。

如此，完整的行政經歷，的確是絕無僅有，更是所有公職人員的典範，超過四十年的公職生命，爲台東人民付出服務，造福難以量計的同胞，尤其是成功鎮成功地區鄉親。

成功鎮是個迷人的地方，曾士華先生在擔任鎮長任內，人口將近二萬三千餘人，各個族群都有，客家、閩南、榮民、原住民族……等等，以由綠島遷居而來的綠島人較特殊，而且是近三十年才遷到成功鎮來。

在這裡族群豐富，文化層出，卻沒有帶來多大的衝突，即使在光復初期，動亂的年代，二二八事件，並沒有在成功鎮造成影響。反而族群文化讓整個成功鎮的文化更爲光彩璨爛。由成功鎮的地名就可以一窺究竟，成功鎮和平里、嘉平、忠仁里、八邊，都是譯自原住民語而來。

成功鎮著名人士記憶中，有日據時期新港役所首長（即成功鎮公所）馬融通，也是農田水利會水利委員（光復初期），也是當時地方公正人物。

曾士華先生不疾不徐傾訴這般，屬於自己的歷史，從眼中閃著輝煌的光芒，不因時間的久長而暗淡。堅定、慎重的態度，有著政治家以公僕爲己任的風貌。更是所有有心投身公職，或已在任公職的人，所應追隨、實踐的典型。

六、　鍾瓊芳－可敬的生意世家

鍾瓊芳先生民國五年出生，民國九十二年過世，享年八十七歲。所以，就鍾瓊芳先生的長子，鍾錦興先生進行訪問。

訪問的過程頗似三國演義中，三顧茅廬的情形，終於在第三次拜訪的時候，順利訪問完成，在這個麻雀雖小五臟俱全的建材行裡，慢慢勾勒出生意世家的專業形象。透過鍾錦興先生的口述，讓這兩代，在成功鎮的努力奮鬥，慢慢完整呈現。

父親鍾瓊芳先生在屏東縣內埔鄉出生，是道地的客家人。民國二十年前後，當時大該十幾歲，隨著家族搬遷到台東縣成功鎮居住謀生。搬遷的真正原因已經無從探究，約略可以瞭解，當時在屏東生活不易，希望到台東來開墾，成就一番事業，至少還可以開墾出屬於自己的田園。

母親則是屏東縣內埔鄉客家人，同樣是民國五年出生，同樣隨著父親來到成功鎮，在這裡生養三男三女，在艱鉅的年代，過著辛苦的日子，而就在民國六十年過世，那時才五十五歲。

舉家遷居來成功鎮正值日據時代後期，面臨第二次世界大戰末期的密集轟炸，所以許多成功鎮民搬到海岸山脈山下，瀑布附近的小村落躲空襲警報，鍾瓊芳先生家族也不例外，一直到台灣光復後才又搬回鎮上。

鍾瓊芳先生膝下有三男三女，長子即是受訪的鍾錦興先生，次子鍾錦棠先生定居在台北，三子鍾錦松先生則留在成功鎮居住，另有三位女兒，多半離開成功鎮。

鍾錦興先生則在成功鎮出生成長，而娶屏東縣竹田鄉客家女子爲妻，一同定居在成功鎮，爲自己的家庭及家族而努力奮鬥，希望也能在父親鍾瓊芳先生的薰陶下，傳承經營生意的訣竅。

父親鍾瓊芳先生在成功鎮開設雜貨店，同時得到菸酒公賣局的菸酒販售權利，兼賣菸酒，偶而做做小工，貼補家用，一直到民國五十年，開始向農戶收購香茅，提煉香茅油。

在民國五十年代，台灣地區有許多農戶種植香茅，香茅用來提煉香茅油，外銷國外，以日本爲大宗。香茅油的功用如同樟腦油一般，具有驅蚊蟲等效果，味道清香，遠比樟腦來得受歡迎，在成功鎮種植的香茅品質佳，提煉出的香茅油純度高，極受外銷業者的歡迎。

然而好景不長，許多國內業者覺得有利可圖，分別在香茅油中加入其他添加物，用以增加份量，減低成本。幾次被國外收購者驗出退貨，也讓台灣的香茅油信用破產，讓這種農戶的附加產物，盛景不在，於是收購香茅提煉的生意，就在民國五十六年劃下句點。看看現今，香茅的使用好像又漸漸興起，但是，每次試用那些香茅產品，便覺得還是不如當年提煉的香茅油那樣馨香，那樣的純。

在此之後，做過許多生意，販賣肥料、牛隻，收購稻米、玉米、及花等農作物，只要是與農業相關的生意，都曾經嘗試去做，也算是摸索階段，從各種不同的方向進行嘗試，也許或多或少會面臨失敗的挫折，就把這些挫折當作一次次不一樣的挑戰，看看何種生意比較近入狀況。

民國六十二年由於經濟逐漸起飛，看準建築業即將蓬勃發展，於是開始從事建材五金的買賣生意，並且擁有自己的店面，而父親鍾瓊芳先生也在民國五十八年將雜貨店結束，在兒子鍾錦興先生開設的建材五金行幫忙看店。

父親鍾瓊芳先生一直到七十幾歲都還在協助店中事務，似乎閒不下來，八十幾歲時

身體還頗爲硬朗，民國九十二年八十七歲高齡辭世。然而父親在生意往來上的堅持與執著，是後生晚輩所學習的地方。

在鍾錦興先生的記憶中，日據時期到光復初期，南部與東部的交通極爲不便，走路必須走上一星期，是漫長的旅途，客運車的行駛班次也不多，崎嶇難行的道路，更增添行車的困難。

當時還可以走水路，由屏東縣東港鎮的海港搭船，繞過巴士海峽，到成功港口，行船時間大概需要一日夜，然而，而貴的船票，對當時的人而言，是奢侈的享受，一般人遙不可及的夢想，當然，海上情形不穩定，也是令人望之卻步的原因之一。

成功鎮的人口，現在逐年減少，大概在民國五十幾年左右，一直到民國七十年，人口還算蠻多的，民國八十年前後，因爲交通逐漸便利，人口有回流的現象，但是，過沒多久人口數便一直下滑到現在，應該還會持續減少。

成功鎮人口結構複雜，以原住民族阿美族與閩南人居多，客家人亦佔有一定人數，而來自綠島的移民，更是成功鎮較爲特殊的族群。在這裡族群間相處還算和諧，並沒有嚴重的衝突發生。這裡的客家人以南部客家人爲主，北部客家人在在花東縱谷的鄉鎮居多。

成功鎮的物產，仍以稻田爲主要作物，水果則以柑橘類爲主，近幾年的香丁及臍橙更是水果類的大宗。而海岸山脈較高地區，則多種植薑或者直接造林。

成功鎮著名的人物，大概有早期當選過立法委員的許添枝先生，當選過台東縣議員並擔任議長的李龍義先生，此二位是較早期成功鎮的著名政治人物，爲民喉舌的中央及地方民意代表。

成功鎮古地名爲新港，後來爲了與雲林縣新港有所差別，取其閩南與諧音，冠以好計有意義的「成功」之名，行政區上慣用成功鎮之名，而鎮上老一輩的鎮民，還是習慣以新港稱之，而「新港國中」則保有古地名，未予更改。

鍾錦興先生的建材五金行，在訪問的過程中，顧客並不短少，而有可以獨當一面的兒子管理店中大大小小事務，有此可以隱約瞭解，鍾瓊芳先生家族三代，爲了生活在事業上盡心盡力打拼，彷彿看到生生不息的薪火，不燼的相傳到永恆。

圖九：鍾錦興先生，朱慧貞攝。

七、　張順貴議員－為民喉舌的傳奇

爲民服務是身爲民意代表的最大宗旨，無時無刻全天候待命，所以，邀約訪查部分就請議員夫人代勞。

這個午後，打擾了議員夫人休息的時間，侃侃而談起過往的歷史，一位爲國家奉獻，爲家庭付出，爲人民謀福利的勇者形象，輪廓漸漸由模糊而清晰，就在娓娓道來裡，忠實紀錄著。

一九五三年（民國四十二年）在屏東縣竹田鄉南勢村出生，求學告一段落之後投考軍校，陸軍步兵學校正規班二三七期畢業，開始下部隊服役，開始職業軍人的生涯。

民國六十二年，是張議員與成功鎮的初次相遇，是軍旅生涯的起點，離開屏東縣竹田鄉南勢村，這十餘年來生長的地方，告別熟悉的故鄉，離鄉背井，隻身來到成功鎮服役，一個十分陌生的環境，竟是未來安居樂業的第二故鄉。

當年交通不甚便利，由屏東搭公路局走南迴公路往台東，大約需花超過五個小時，中途會在屏東縣楓港稍做停留，南迴公路沿途道路狹窄曲折，路況極爲不佳，而這卻是屏東通往東部唯一的道路，簡陋的公路局車輛，迂迴不已的山路，往往令人卻步，身爲軍人，以服從爲要，不辭艱苦的前往。

到了台東市，再稍做休息，搭上海線的客運車，轉往成功鎮。沿途路況仍不理想，自始自終都是石子路，行車時間超過兩個小時，就算在美麗的太平洋，也敵不過一路的顛簸。估計從屏東故鄉出發，至少要將近一天的時間，才能抵達成功鎮，當時返鄉之路，可說既崎嶇又遙遠。

當時係屬職業軍人，需隨部隊及職務而有所調動，落腳的足跡，遍及東部海岸，上至花蓮，下至台東，軍人保家爲國的使命，克服所有外在環境的困難，一直到民國六十八年才定居成功鎮。

雖然定居成功鎮，但整個家族還留在屏東縣竹田鄉南勢村，父親母親都是竹田鄉客家人，自己更是道地的客家子弟，在軍旅生涯完成終身大事，夫人溫秀金女士原籍是屏東縣高樹鄉正興村，也是客家小姐，不過夫人在成功鎮忠孝里美山出生，是早期遷居成功鎮的客家人。

結婚之後，張議員仍然是職業軍人身份，職務之故，還需四處調動，而夫人小孩就留在成功鎮生活。夫人保有客家人刻苦耐勞的精神，在張議員在外爲家庭打拼同時，夫人留在成功鎮默默爲家庭努力付出，無怨無悔，當一位非常稱職的賢內助。

將近有七年的時間，夫人在新港國中福利社工作，爲了準備學生的早午餐及零食餐點，往往清晨四五點就得開始忙碌，年幼的小孩就放在身邊跟著幫忙。頗具規模的新港國中裡，福利社由夫人一手包辦，小孩下課了，就是來學校幫媽媽的忙，更是夫人的得力助手。

福利社工作之餘，還做些小工貼補家用，而小孩非常乖巧，能體諒父母親的辛勞，不時提父母親分擔家務，讓辛苦持家的夫人寬心，讓在外奔波的張議員安心，就這樣持續到張議員從軍職退休。

民國七十六年張議員自軍中退休，在成功鎮準備開啓事業的第二春，此時的成功

鎮，生活水準日漸提升，隨著大環境的經濟景氣，旅遊人口逐漸增加，張議員看準了汽車租賃的市場，毅然投入經營。開設汽車租賃公司，提供成功鎮地區居民，禮車的出租，外來旅客轎車的出租。

在民國八十年南迴鐵路通車後，東西部往來時間縮短了也方便了，讓城鄉差距相對減小，旅遊業一時鼎盛，台東地區頓時成為台灣的後花園，海外遊客及國內旅客們，所熱中的旅遊景點，歌手沈文程的名曲「來去台東」讓不只是台東是，甚至是成功鎮地標「三仙台」、「石雨傘」，名產「柴魚」，紅極一時。

汽車租賃公司業務蒸蒸日上，最盛時期，公司有十六部車提供出租，人來人往十分熱鬧。在此時，同業開始逐漸增多，可以預見的未來，競爭將會非常激烈，而旅遊人口不見得會一直增加，市場的飽和將會是必然現象，於是決定激流湧退。

民國八十三年便將汽車租賃公司收了起來，一來，為了避免同業競爭的激烈，形成營業的萎縮；二來，在民國七十九年開始從政，關注於為人民的服務之上，毅然決然離開汽車租賃這個區塊。

從政是張議員無心差柳而來，以自己在軍中退役正直的個性，同時，既已落腳成功鎮，這裡就是自己的故鄉，看著成功鎮的發展空間應該是無可限量，所以希望自己能夠為這一片土地有所付出，為這裡的鄉親謀取福利，於此，便開始規劃自己的生涯，從最基層的鎮民代表做起。

鎮民代表直接對鎮民負責，就近監督鎮公所行政，最貼近選民的基層民意代表，民國七十九年參選成功鎮民代表，感謝鄉親的牽成，順利當選，有機會為全體鎮民服務，四年的任期，全心全意努力，這四年的成果就在民國八十三年的成功鎮民代表選舉，用順利高票當選，來證明議員自己的付出。

第二任成功鎮民代表期間，還當選成功鎮民代表會主席，是基層民意代表的榮譽，更沒有辜負選民的支持。而鎮民代表畢竟是基層民意代表，所服務的範圍及力量有限，為了能照顧更多更廣的鄉親，爭取更多更必要的福利，決定投身台東縣縣議員選舉，謀更多人的福利，為更多人服務。

選舉是一條艱辛的路，需要有積極的行動力，與無怨尤的付出。原本鎮民代表選舉只是小選區，縣議員選舉是跨鄉鎮的大選區，成功鎮與鄰近長濱鄉及東河鄉，共同選出二名縣議員，而原住民族另外選舉原住民族議員，整個選民結構產生重大改變。

即使知道將面臨更大挑戰，張議員本著為民服務的初衷，勇於面對挑戰，當然，要付出更多時間心力，在更多的選民身上，同時也結交更多好友，一起為了讓鄉親擁有更美好的未來努力。

兩任鎮民代表任期告一段落，全力為參選縣議員衝刺。民國八十七年一月二十四日台東縣議員選舉結束，以同選區最高票之姿，當選台東縣第十四屆縣議員，這樣的選舉結果，是自己的努力，得到三個鄉鎮鄉親們，最高的肯定。

四年之後，民國九十一年元月，連任第十五屆台東縣議員成功，又是一次為民服務成果政績的表現；八年之後，民國九十四年十二月再度最高票連任第十六屆台東縣議員，政治之路固然辛苦，但是在得到鄉親的肯定，一切的努力都是值得的。

民意代表的最大宗旨在為民服務，雖有穩定的薪俸，但這些薪俸，根本不敷支出，

一個月的喜喪事紅白包都不夠。就因爲如此，夫人爲了當張議員最大的後援部隊，以及最大的精神支柱，不只安頓好家庭，教育好孩子，更有一份不錯的工作，送報業務。

這份工作在原本汽車租賃公司之後，便逐漸接手。在成功鎮內送報工作並不困難，困難的是成功鎮腹地廣大，地形狹長，偏遠地區交通不便，這些才是最大癥結點所在。工作就是努力的克服障礙，送報生的訓練及增加，並且結合偏遠地區聯絡網，更結合郵遞業務的推行，送報業務漸漸得心應手。

經過長久的努力，送報業務慢慢擴張，加入長濱鄉及東河鄉兩個地區，範圍擴大，業務增多，運用既有的工作型態，得以順利接納這麼廣大的地區。其實，其他更偏遠地區的送報業務，多少帶些服務性質，畢竟，光運送投遞的費用，就可能超過報紙的售價。

現在的送報業務，底下有六位送報生，可以說頗具規模了。報紙是資訊性的精神食糧，對於資訊接收不易的偏遠地區，是最大宗的資訊來源。透過送報業務，結交各地好友，與張議員的爲民服務，可以在此相輔相成，而且如虎添翼。

身爲客家人，對於客家美食，更情有獨鍾，張議員也不例外。夫人的拿手客家菜餚，是張議員的動力來源，客家的點心有著迷人的吸引力，夫人做的花生豆腐，已經遠近馳名，每到夏天便成爲清涼爽口又營養的點心，而且入菜或當零食，兩相宜。近年來，已經有許多老顧客定期詢問，也開放宅配服務，或許，未來會成爲地方性特色美食喔！

成功鎮有許多不同的族群，客家人所佔的比例有限，原住民族阿美族人口較多，接著便是閩南人，而閩南人中有有部分是從綠島遷居而來，稱爲「綠島人」。這幾個族群，一直以來，都非常和諧的相處。以選舉的角度來看，雖然原住民族在議員選舉中並非選民，依舊一視同仁爲民服務，而原住民鄉親們，也願意給予無私的支持，令人十分感動，各個族群的和諧共榮，才有今天穩定發展的環境。

成功鎮的交通，成功鎮開發的先天阻礙，當然也爲成功鎮保留了純樸原始的風情。從早期石子路，公路局客運車。到現在國光客運公司、鼎東客運公司、及花蓮客運公司，班次往來台東、成功鎮、及花蓮之間，班次也許不夠充足，但是，也算頗爲方便了。

回顧這三十幾年落腳而深耕成功鎮，在這個充滿人情味的城鎮，早已將心歸屬這裡。張議員兩位掌上明珠，大女兒在台東大學工作，二女兒遠嫁到泰國曼谷定居，各有良好的歸宿，卻總心疼張議員在政治界的辛勞，總是提醒張議員考慮退休享福。

在明年（民國九十八年）十一月將要舉行第十七屆台東縣議員選舉，面對選民的寄託盛情難卻，這條政治路一直堅持清廉正直，也期望能不負所託，至少在這個任期內，盡力做到最好。

漸漸過了午間休息的時間，在夫人詳盡的陳述，看見一位勇者的形象，完整的浮現。堅持自己的理念，不違初衷勇往直前，是成功地區三鄉鎮居民的福祉，功在社稷。在公門中爲人民發聲，監督政府施政，提供落實的建議，一切以創造更美好的未來爲宗旨，這就是成功鎮優秀的客家籍議員，張順貴議員。

圖十：張順貴議員，朱慧貞攝。

第八章　結論

成功鎮走過後山初闢的繁華，如今在漁業蕭條下，鎮內已不復往日榮景。然而，其在歷史中所扮演的角色與深厚的文教氣息，卻是街口轉角隨處可見。受訪的諸多客籍人士中，最引以爲傲的是，在成功鎮裡，是沒有所謂「族群的對立」的。客籍人士除了客語之外，也多能操一口流利的閩南語，正因爲語言上的「不隔」，所以形成了一個「族群融合」的善良聚落。這樣的特色在採訪的過程中，也隨處可見，接受採訪的客家鄉親們，個個笑容可掬，親切地接待我們這些「不速之客」，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而在訪談的過程中，他們對於自己的家族，也總是以讚美、溫和的態度以對，充分展現了人性最溫柔敦厚的善良面，也因此，採訪的過程雖然辛苦，卻是令人備感溫馨的。期許這樣的人文精神，能藉著這一本對成功鎮家族記事的論文，不斷地延續下去。

參考文獻

台東縣政府文化局、台東縣後山文化工作協會編著（2000），《寶桑椰影》（台東縣：台東縣文化局）。

台東縣政府文化局編印（1990），《台東縣八十九年度後山文化研討會論文資料彙編》。

何石松（2001），《客諺一百首》(台北：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李玉芬、吳玉竹、趙仁方、陳國棟、施炳霖、沈淑敏（2003），《成功鎮誌地理篇》，（台東縣：台東縣成功鎮公所）

孟祥瀚 王河盛（2003），《成功鎮誌歷史篇大事紀》，（台東縣：台東縣成功鎮公所）

房學嘉（1996），《客家源流探奧》，(台北：武陵出版有限公司)

松本一男（1996）《客家人的力量》，(台北市：國際村文庫書店)

雨青（1998），《客家人尋根》，（台北：武陵出版社有限公司）

後山文化工作協會（1997），《後山代誌第四輯》（台東縣：台東縣立文化中心）。

後山文化工作群（1996），《加走灣紀事》（台東縣：台東縣立文化中心）。

施添福總編纂、劉益昌編纂（2001），《台東縣史》（台東縣：台東縣政府）。

胡傳，《台東州采訪冊》（台東縣：台東省文獻委員會）。

徐正光 彭欽清 羅肇錦主編（1994），《客家文化研討會論文集》，(臺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

國立台東師範學院編印（1995），《後山風情－台東縣鄉土教材初編》。

張文亮（2006），《台灣不能沒有客家人》，(台北：文經出版社)

黃拓榮主修、羅鼎總纂（1964），《台東縣志》（台東縣：台東縣文獻委員會）。

趙川明研究主持、姜柷山研究（1999），《台東縣藝文資源調查結案報告》（台東縣：台東縣文化中心）。

劉還月（1998），《處處爲家處處家》，(花蓮縣鳳林鎮公所)

劉還月（2000），《台灣的客家人》，(臺北市，常民出版)

劉還月（2000），《台灣客家族群與信仰》，(台北：常民文化)

劉還月（2001），《台灣客家族群史．移墾篇》，(南投：台灣省文獻委員會)

蕭新煌、黃世明（2005），《台灣客家族群史》，(南投：台灣省文獻委員會)

謝重光（1999），《客家源流新探》，(台北：武陵出版社有限公司)

謝重光（1999），《海峽兩岸的客家人》，(台北市：幼獅出版社)

羅香林（1992），《客家研究導論》，(台北：南天書局有限公司)

王河盛（2001）＜新港建港滄桑＞，臺東文獻復刊 6 期。

王河盛（2006）＜臺東縣成功鎮軼聞 1＞，臺東文獻復刊 12 期。

王河盛（2007），＜臺東縣成功鎮軼聞 2＞，臺東文獻復刊 13 期。

黃學堂（2003），＜清代臺東的客家人＞，臺東文獻復刊 10 期。